

音符里的彗星  
——郭美貞傳奇的一生

**A Comet in the Notes**

——Helen Quach

劉敦仁 著



**Helen Quach is a most remarkable young conductor possessing wonderful authority and I expect that she will achieve a great deal of her gifted ability**

--NIKOLAI MALKO--

海伦·郭是最优秀的青年音乐家，她拥有令人赞叹的权威，我期待着她那与生俱来的能力将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

-- 尼古拉·马可 --

**“The excellent musician of brilliant future”**

--CARLO ZECCHI--

具有光明前景的杰出音乐家。

-- 卡洛·切奇 --

**I was not only impressed by her knowledge and Musicianship, but above all by the natural flair she has for conducting which is a very rare gift.**

**All my good wishes to your great talent**

--SIR JOHN • BARBIROLI--

我不仅对她的知识和音乐技巧印象深刻，尤其是她在指挥上挥洒自如的天资，是非常稀有的天分。向你杰出的天份献上我的祝福。

-- 约翰·巴比洛里爵士 --

**her performance as our assistant this season (1967-68) has given u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she will succeed on musical grounds as well. Her rhythmic sense is sharp, her reflexes quick, her address to the orchestra captivating. She seems to be at her best in works of large dimensions (odd for so diminutive a creature), and if there can be such a thing as a Maestra, Miss Quach could well be it.**

-- Leonard·Bernstein --

作為 1967-1968 季節的助理指揮，她的演出給與我們足够的理由相信她在音樂界將會取得成功。她的節奏感清晰，反應快，給交響樂團的指令非常迷人。她似乎在大型作品上更能登峰造極 (對於如此小小的身材來說是絕不尋常的)。

假如真有女指揮一說，郭小姐是當之無愧的。

-- 雷奧納多·伯恩斯坦 --

這幾位世界知名音樂家，在郭美貞初露才華的時候，就給予了最高的評價，由此對她寄以深切而正面的期望，并給予她全力支持和引導。但更重要的是這幾位音樂家，都在自身音樂領域成功的道路上，積極培養扶植青少年的音樂教育，使得音樂得以在社會發展，增進文化水準的普遍提高。郭美貞得益于這幾位老師的不僅僅是音樂上的成就，更為令她銘記的是她繼承了幾位恩師培養青少年音樂教育的遠見。在澳大利亞她成功了，然而在臺灣，這個她一直看成為祖國的地方，給于她的確是失望和遺憾。

## 感 恩

當我在 2013 年 8 月 3 日收到郭美貞弟弟郭建平從澳大利亞發來的電子郵件，告訴我美貞去世的噩耗時，我不敢置信那是真的。雖然在此之前就得悉她從 1994 年已罹患乳腺癌，但她的堅毅信心一直支撐着她在音樂的道路上始終不渝地前行，所以我感覺到，我們還有機會相約在菲律賓重叙友情，豈料這一突如其來的信息，讓我們的約會成了永遠的遺憾。

她的死訊將我的思維一下拉回到 1965 年的時代，那時候我們不約而同地生活在羅馬，正處于雄心壯志的青年時代，在古羅馬歷史文化和現代的藝術熏陶下，對生命的未來充滿了憧憬。尤其是她的音樂天賦，正是在萌芽的時代，祇需要外來的培養和扶植，她的才華必能壯碩地成長。為中華民族音樂史上綻放異彩。

於是我向于斌總主教和時任駐意大利的中華民國大使于竣吉前輩說明我的心意，請求兩位長者能有機會提携美貞。兩位長者沒有絲毫猶疑，即為美貞到臺灣的訪問作出了適當的安排。到達臺灣後，聯合報創辦人王愷吾先生給予了不懈的支持。果不出所料，美貞在臺灣一舉成名，給她自己的音樂事業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原本我自己曾受到兩位長者的提携和栽培，對他們所給予的恩典始終不渝地存有感懷之情。美貞的突然去世，

讓我想起 1965 年 11 月 6 日在羅馬和兩位長者相聚，談論安排美貞赴臺訪問的事宜，那情景至今仍清晰地歷歷在目。

2014 年 3 月 29 日，我夫婦在臺北和輔仁大學傳媒系習賢德教授和音樂系系主任徐玫玲教授談起美貞的音樂成就時，輔仁大學在臺灣復校是在于斌樞機主教的不懈努力下一手促成，所以于斌樞機主教，輔仁大學和美貞就無形中形成一條友情的紐帶。我們除了探討為感懷于斌樞機主教一生栽培後進的仁愛精神，在輔仁大學音樂系設立紀念美貞獎學金之外，我也提出為美貞撰寫傳記的願望。

兩位教授都一致認為，因為我夫婦和美貞有近五十年的友情，對她的一生事迹有較深刻的了解，於是他們極力鼓勵我能挑起撰寫有關她的傳記這份重擔，并盡早完成。

雖然今天我能不負兩位教授的重望而完成了他們的期盼，但以我有限的文學修養是否能將美貞的一生着力反映出來，是我最大的擔憂。不管怎樣，在這裏對習賢德教授和徐玫玲主任所給予的鼓勵，表達我誠摯的感謝。

盡管我在臺北對兩位教授承諾撰寫美貞的傳記。但回到住所後，發現許多面臨的困難無從解決。我手頭毫無有關美貞的記載文字或資料，根本不知從何落筆。而要撰寫她的傳記，至少要先對她的家庭和她的成長有所了解。

美貞弟弟郭奮中和郭建平聯名在八月用她的電子郵件發給我有關她的死訊。而從臺北回來後，距離她弟弟發的郵件時間已經過去了近八個月，不知她弟弟會否仍會保有她的電子郵件地址或者已經給刪除掉。

但爲了能得到有關她家庭的信息，除了求助於她弟弟別無他法，抱着試探的心情，我給她弟弟發了郵件，請他能助我一臂之力。然而我先後發出了三封郵件却如石沉大海。在無計可施的情景下，我突然想起，她弟弟給我發的郵件中，曾告知爲美貞舉行葬禮的殯儀館地址等信息，於是我給殯儀館發了郵件，請他們將我的信息轉給美貞弟弟。

終於盼來了她小弟弟郭建平的回電，原來他因摔傷了腿而住院治療，近日才出院。我終于如大旱見霓雲，從她弟弟那裏得知，美貞去世後所有的遺物分別由他和哥哥郭奮中保管。雖然從我們從居住城市飛往澳大利亞堪培拉需要十五個小事，但爲了能獲得第一手資料，而且妻子和美貞兩人感情深厚情同姊妹，經商討後，我們決定親自去一趟。

2014年3月5日我們抵達堪培拉，她弟弟郭建平親自到機場接我們，把我們先送到下榻酒店。然後一起晚餐，席間談到不少有關美貞的軼事，而且約定次日他來接我們，到他家裏去，看看美貞留下的遺物中是否能找到我需要的資料。

果然天從人願，郭奮中帶我們到一小房間，那裏堆滿了紙箱和已經布滿風霜斑駁的皮箱。裏面存儲的物件雜亂無章，而且許多報章節目單都隨着歲月的流逝而呈現黃色，每一張都需要小心翼翼地翻閱，否則就會成碎片散落。

第一天我就如同勤奮的農民在辛勤耕耘後獲得豐碩成

果般興奮無比，在短短的一上午，我找到美貞在 1967 年獲得的密特羅波洛斯國際青年指揮金獎牌，捧着那塊沉甸甸的獎章，我反復細心地看着金牌上篆刻着的她的名字，那裏面包含着她的心血和努力，而也就是這塊金牌，引領着她邁向國際樂團的舞臺。

在資料中我還找到她在臺灣時政府頒授給她的金質指揮棒，和她獲得臺灣十大杰出女青年的獎狀等珍貴資料，還看到了世界各國對她的大幅報道。1967 年獲得紐約密特羅波洛斯國際青年指揮金獎，美國全國就有近四十家報紙同一天刊登了美聯社發布的新聞，還附配了一幀美貞和著名音樂指揮伯恩斯坦的合照，可謂風頭出盡，也是美貞給中華民族獲得有史以來空前的國際榮耀。

在五天的時間裏所獲得的有關美貞生前資料及圖片，使我為她撰寫傳記的信心大增。為此在這裏要向美貞兩位弟弟郭建平和郭奮中致以深切的感謝。

從美貞的生活資料中，我梳理出她一生所指揮的樂壇及樂曲內容。但為了要進一步獲得她在舞臺上指揮的圖片和節目單等歷史檔案，唯一的途徑就是直接和這些樂團取得聯系。這並不是一項龐大的工程，但需要花大量的時間來進行。而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科技的發展諸如當前的 DVD,CD 等視屏，在當時都付諸闕如，甚至連彩色照片都不存在，更妄論電子郵件等通訊設施。所以首先我要搜尋到需要聯系的世界各大交響樂團的電子郵箱，取得聯系後我才能做後續的工作。

經過耐心的搜尋和聯絡，最終我收到了幾乎所有美貞

指揮過的國際交響樂團的回應，但大多數都沒有留存任何的資料，祇有下面的幾個樂團還保存有一些圖片或資料，彌足珍貴。

菲律賓是美貞一生中去得最多的國家，她先後收到二十多次的邀請，所以和馬尼拉交響樂團建立了如家庭般的親密關係。在這裏要感謝馬尼拉交響樂團的 Ellen Tordesillas 女士，Pablo A.Tariman 先生和 Donna Lina-Flavier 女士，對他們提供的資料表示感謝！

休斯頓交響樂團是美貞最早去指揮的樂團，遺憾的是因當地發生洪水導致交響樂團的資料庫被淹，大部分資料都被浸泡損壞。從幸存的資料中 Jennifer Mire 女士和 Terry Brown 先生找到了一份美貞在指揮樂團時的宣傳資料，在此特地向他們兩位致謝。

紐約愛樂交響樂團是美貞在 1967 年榮獲密特羅波洛斯國際青年指揮金獎後，時任該比賽評審委員會主席，紐約愛樂交響樂團指揮總監伯恩斯坦立即和她簽訂了為期一年的助理指揮合約，美貞就在紐約指揮該交響樂團。深為惋惜的是該團連伯恩斯坦和美貞的合照都沒有存案，但他們還保存有一張美貞在指揮臺上的照片，於是 Susan O'dell 女士, Barbara Haws 女士, 和 Gabryel Smith 女士從資料檔案中找出了這張圖片并發給了我。

爲此特向紐約愛樂交響樂團三位女士表達我的謝意。

需要強調的是，這張圖片也是美貞自己一生中最喜歡的照片，她在獲獎之後，曾從紐約將這照片寄送給我妻子留作紀念。

香港是美貞生活了近兩年的城市，她在那裏擔任交響樂團的總監，在和樂團取得聯繫後，得到的答復也是資料缺乏。但感謝該團 Mimi Mok 女士，給我發來了一張美貞和小提琴手商談樂章的照片。

美貞第一次訪問日本的時候，當地的交響樂團帶着有色眼睛，對她展示了日本大男人主義的本色，讀賣新聞交響樂團的指揮祇為美貞安排指揮該團排練的演奏，但美貞毫不懈怠而很認真地展現了她的指揮才華，終於讓該團指揮刮目相看，而和她簽訂了在日本巡回演出十八場的合同。得到了廣泛的認同。感謝讀賣新聞交響樂團（Yomiuri Nippon Symphony Orchestra）的 Misako Kazuga 女士給我發來一張美貞在日本指揮的英姿，事實上我在美貞的遺物中就已經發現這張照片和其他資料。但為了讀者對美貞這段經歷有更深切的感受，我還是採用了讀賣新聞交響樂團發來的這張照片。

菲律賓在美貞音樂生命中是她感受最深，感情最濃的一塊土地，當馬尼拉交響樂團和我通過電子郵件取得聯繫後，Donna Lina-Flavier 女士不僅給我提供了美貞的指揮圖片，還特地告訴我，要相了解更多美貞在菲律賓的真實生活，就必須聯繫當地華僑界保險業的巨子許文哲（James Coyiuto）先生。同時她給我提供了許先生的電子郵址。於是我向許先生發出了第一封自我介紹的郵件，欣慰的是第二天就接到他的回電，而且很高興給我提供所需資料。從通訊中得知，原來美貞生命中的最後一場音樂會，就是 2008 年 9 月 27 日在菲律賓舉行的音樂會，而許先生夫人

Christin 是當地著名的鋼琴家，在她和美貞合作的那場音樂會中，她擔任了修曼作品的鋼琴獨奏。

他還特地發郵件邀請我夫婦到馬尼拉出席在 7 月 7 日舉行的音樂會，由馬尼拉交響樂團演奏，他夫人擔任鋼琴獨奏。爲了獲得更多有關美貞在當地生活的情況和圖片資料，我和妻子決定前往馬尼拉作實地了解，也出席了許先生夫人的音樂會。

許先生爲人誠懇而悉心，考慮到我們在馬尼拉停留一周期間的安全和方便，他特地從公司裏調配了一輛車和司機，專爲我夫婦使用。許先生在我們抵達的第二天中午，在他辦公大樓裏設宴招待我夫婦，席間我認識了 1968 年促成美貞訪問菲律賓的李惠秀女士，她今年已近八十高齡，但仍然活躍在社團中，還有柯美智女士曾經是許夫人在求學時代的前後同學，講述了許多外人從未曾聽聞過有關美貞的趣事軼聞。同時許先生還親自陪同我去拜訪了當地著名的音樂學院 St.Scholastica's College 的校長，她是一位年以過古稀的修女 Sr.Mary Placid Abejo，她熱心地接待了我，還自己陪同我參觀美貞在她學校曾經指揮演出過的舞臺和劇場。

這位修女長期對菲律賓音樂界作着默默的奉獻，她搜集了很多當地音樂界去世的杰出人物遺留的資料，匯集并整理成文史檔案，陳列在該校的圖書館，作爲有志于音樂的青年學子參考學習。令我不敢相信的是，她收集了近二十套美貞在菲律賓指揮演出音樂會的實況錄音，她收藏有關美貞的資料之多，勝過所有美貞曾經指揮過的世界著名

交響樂團。據她告訴我，這些光盤是一位當地人士捐獻給她的，非常難能可貴。

通過馬尼拉交響樂團，我認識了許先生等新朋友，而且他們無私地協助我提供了相當數量有關美貞在菲律賓的生活資料和圖片。在這裏我一一向他們表達我發自內心的感激之情。

在搜集整理資料的時候，妻子和我們的長子劉念祖，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將許多資料掃描成圖片作為本書的插圖。在這裏也要向他們說一聲謝謝。

2014年9月24日，在臺北輔仁大學音樂系舉行了一場紀念郭美貞頒發獎學金的典禮，輔仁大學傳媒系習賢德教授安排了二年級的學生集體出席作採訪工作，年輕人的盛情可感，在此向每一位與會的同學一并表達謝意。

說真的，如沒有這些可貴朋友和世界各地交響樂團的鼎力相助，無論如何是絕不可能完成這個重大的任務。也因此他們都是這本傳記名正言順的共同作者，如美貞在天之靈有知，也定當會含笑了

## 我为什么写郭美贞?

應該是在 2012 年的秋天，從美貞發給我們的電子郵件中，得知這位和我們有近五十年的知己，從 1994 年就罹患了乳腺癌病癥，但從沒有將她的病情向我們透露過絲毫。就是在這封郵件中才告訴我們，雖然她兩個弟弟都是醫生，但她拒絕接受現代醫療的手術和化療等方法的醫治，却選擇了大自然的醫療方法。在國民黨中央銀行總裁的女兒俞筱璉的細心照顧下，她一直生活在菲律賓巴拉望島群中的一個名叫公主島 (Princess Island) 的海灣裏，通過游泳潛水等活動與大自然接觸，她身居信心認為在天主的庇佑下，她定能戰勝病魔。

當時我和妻子正在商議，如何能從繁忙的工作中安排出時間到菲律賓去探望她，也趁此機會能暢叙別後之情。經過商酌我夫婦決定在半年後，也就是 2013 年的春天去探視她并和她叙舊。這期間我們就通過電子郵件互通音訊，而她得悉我們準備去探視後也極為高興。

就在我們準備預訂機票前往馬尼拉的時候，接到她 2013 年 3 月 9 日發來的電子郵件，她寫道：

從二月三日起我就住進了坎培拉醫院，在二月四日接受了腎部手術。我不知道何時能重返菲律賓，但已經訂好了九月二十二日返回馬尼拉的機票。祝福你們兩口子。

海倫 (郭美貞的聖名)

收到她這封簡短的電子郵件，我和妻子開始擔心她的病情，但從她的簡短郵件中捉摸不出究竟是她因病情惡化而接受了手術呢？還是僅僅做了臀部手術，而這手術是否和乳腺癌有關也不得而知。

爲了不影響她的康復，我們就考慮不妨把探訪她的時間略微後移。一直到 8 月 3 日我們再度收到美貞的電子郵件，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希望打開郵件時能得到有關她健康比較令人鼓舞的信息，與此同時也憂慮她的病情會否朝我們不願意的方向發展。

然而當我打開她的郵件時，內容不是她發來的，而是她兩個弟弟用她的郵箱給我們傳來震驚但更是悲傷的內容：

哎！我用海倫的郵箱通知你，經過長時間鼓足勇氣和癌癥的抗爭後，海倫在 2013 年 7 月 31 日安祥地去世了。現定 2013 年 8 月 8 日下午一點，在坎培拉 (2604) 金斯頓，坎培拉道 75 號托賓兄弟殯儀館爲她舉行告別式。禮儀後在坎培拉 (2600) 雅拉盧拉區霍普頓街 93 號郭彼得寓所舉行茶會。

羅波特和彼德·郭

我坐在電腦前，就那一瞬間屏幕上的每一個字，都轉換成郭美貞那對善良而閃亮并充滿智慧的大眼睛，以及臉上始終展現發自內心的純真笑容。這對眼睛和笑容，是我和妻子從 1965 年以來始終的記憶和懷念。它象徵着郭美貞從年輕到晚年爲音樂的堅定和執着，以及她對音樂事業的

樂觀和自信。

(郭美貞在 Lago de Garda 留影)

然而她没有等我們這對有五十年情誼的友人去看望就這樣撒手人寰，我內心除了悲傷，還有遺憾。遺憾的不僅僅是我們沒有在彼此晚年的時候相聚，而是我感到她在受到全世界尊重的時候，唯獨她在為最關心的臺灣所付出的一切後，給予她的却是無法承受的打擊。

接到這個噩耗後，我在第一時間給臺北輔仁大學好友習賢德教授報告了郭美貞去世的不幸消息，因為郭美貞在1965年首次訪臺，得到當時的于斌總主教的關懷和支持，而郭美貞生前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所以我建議是否能在臺北為郭美貞舉行一場追思彌撒，以紀念她對臺灣音樂界的奉獻。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除了聯合報和我通過長途電話，從我這裏了解美貞去世的信息之後，在報紙發布了短短的新聞之外，我們的願望就如同郭美貞最後離開臺灣時一樣，冷漠！

更令人費解的是，在臺灣的好友收到我的郵件，請他協助聯繫天主教會，為美貞舉行一場追思彌撒時，得到的答復竟然是要為美貞舉行追思彌撒，必須由美貞的家屬親自提出。當然最後這場彌撒也就無疾而終。

在2013年聖誕節期間我去了臺北，通過輔仁大學傳媒

系習賢德教授的介紹，和輔仁大學音樂系主任徐玫玲教授晤面，在交談中談及郭美貞生前為臺灣音樂教育所作出的奉獻，我希望郭美貞一生為音樂的追求和奉獻，成為後代為音樂而奮鬥向上的積極參考，而且作為近半世紀的友情，我正準備和妻子前往澳大利亞為故友獻花追思。

他們兩位得知我夫婦和郭美貞一段大半生“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真誠友情後，鼓勵我將她一生為音樂的奮鬥和堅定不移的意志記錄下來。我毫不遲疑地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離開臺北後，我開始醞釀寫作計劃，感謝美貞弟弟郭建平，在和他取得聯系的時候得知美貞留下不少照片和資料，分別由他和他哥哥郭奮中保管，并慨允我去查看。

雖然路途遙遠，但是為故友作一些記

錄，我和妻子于 2014 年 3 月 5 日啟程前往澳大利亞。

當時我和妻子正在北京，就決定直接從那裏搭機到悉尼，航程十一個小時，到達後還要轉搭國內航班到坎培拉。但我們沒有絲毫疲勞的感覺，心中祇是盼望能早點看到她留下的那些曾經輝煌的痕迹。抵達時，美貞的小弟弟建平在機場接我們，并將我們送到酒店後，先回診所工作，并約定晚上來接我們一同去晚餐再細談。

由於行前我曾閱讀了很多手邊資料，其中最重要的是輔仁大學音樂系主任徐玫玲教授提供自 1965 年到 2005 年近千頁有關郭美貞在臺灣的新聞報道，閱讀了這些資料後，對我在坎培拉收集資料過程中幫助很，妻子和我專心一致地翻閱着她所有生前的音樂指揮記錄和衆多照片，我甚至親手觸摸着她 1967 年獲得的紐約密特羅波洛斯國際

青年指揮比賽的第一名金獎牌，以及在臺灣獲得的第一屆優秀女青年的獎狀和頒贈的金指揮棒等，還有一疊疊世界各地的新聞報道剪報等等珍貴文物，心中感觸萬千。

徵得她兩位弟弟的同意，我選擇了一部分和我寫作有關的資料和圖片并拍攝成照片，作為此書的配圖，以見證美貞一生為音樂的奮鬥和奉獻。

在這本書中，我找不到任何的美麗詞藻去讚美她，因為我再怎麼描寫，都無法體現真實而令人尊敬的她，她的一生已經在世界各地的音樂會中完整的書寫了，而且得到舉世音樂界的認可和讚美。那才是真正符合她成就的歌頌。當我和紐約愛樂交響樂團聯系互通電子郵件，說明我需要他們支持提供有關美貞圖片或資料，作為我撰寫她傳記使用時，他們在回復電文中第一句話就說，美貞是二十世紀世界樂團上一位舉足輕重而且是不能忘記的偉大女指揮家。這封電子郵件更增加了我撰寫她傳記的信心和勇氣。

作為她近半世紀的故友，這本有關她的傳記，體現的是我帶着謙卑的心情表達對她的尊重和懷念。

在她留下的資料中，最珍貴的是她命名“外界與內心的旅程”未完成的自傳。她祇寫了序言和標題為“童年的回憶”第一章後就中斷了。全文是用英語寫的。我分析她是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裏才開始着筆的。在“序言”中，描述她對人生的看法，我在後面再予以分析。

我將她寫的第一章作為此書的開場白。因為沒有人能夠將她的童年寫得比出自她自己的描述更為真切，更為細

膩,更令讀者感受到親切感。更爲重要的是有了她自己的序言和第一章,這本傳記也就無形中成爲她自己的真實寫照了。

在記錄美貞的一生音樂生涯事迹前,我認爲有必要先介紹前面提及的四位國際知名音樂家:尼古拉·馬可,卡洛·切奇,約翰·巴比羅裏爵士,和雷奧拉多·伯恩斯坦。如果說尼古拉·馬可是美貞的啓蒙老師,那麼後面三位應該是美貞當仁不讓的伯樂。沒有他們的提携就不可能有後來的美貞,通過美貞的成就,也體現了國際音樂界對人才的珍惜和培養,這些愛惜和培養沒有國際,膚色和宗教信仰的界別。

尼古拉·馬可是烏克蘭人,爲二十世紀極其重要的音樂家。他于 1883 年 5 月 4 日出生在烏克蘭維尼特西亞州 (Vinnytsia) 的布拉伊利夫城 (Brailiv)。父親是烏克蘭人,母親則是俄羅斯人。他就讀於聖彼德堡音樂學院并于 1909 年畢業。在學習期間先後師承世界著名俄羅斯作曲家尼古拉·雷姆斯基·柯薩可夫 (Nicolai Rimsky Korsakov 1844-1908), 亞力山大·葛拉朱諾夫 (Alexander Glazunov 1865-1936) 和安納托裏·李阿多爾 (Anatoli Lyador 1855-1914)。

畢業後隨即在當地歷史悠久的馬林斯基劇院 (Marinsky Theatre) 擔任指揮,六年後成爲首席指揮。他曾在德國慕尼黑追隨奧地利指揮兼作曲家菲利克斯·約塞夫·馮·莫狄 (Felix Josef von Motti 1856-1911) 學習指揮。

1918 年他成爲維迪布斯克 (Vitebsk) 大學音樂學院主任,在 1921 年到莫斯科音樂學院執教。從那時起到 1924

年他穿梭於莫斯科，基輔，和卡爾基輔城市之間從事指揮職業。並於 1925 年前往列寧格勒音樂學院擔任主任兼教授職，次年擔任當地交響樂團指揮。期間他親自指揮了作曲家尼古拉·米亞思可夫斯基 (Nicolai Myaskovsky) 特地為他創作的第五交響曲等作品。

從 1929 年開始他分別在維也納，布拉格和哥本哈根等西方國家城市工作，在丹麥組建了哥本哈根廣播交響樂團，並擔任該團的終身客座指揮。為酬謝他對音樂的貢獻，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九世 (Frederick IX) 在 1960 年特地給他頒發騎士大勳章。

他在 1954 年加入了英國國籍成為英國公民，並擔任約克郡交響樂團指揮。1956 年移居澳大利亞悉尼，接替了古森公爵出任悉尼交響樂團指揮一職，一直到他去世。

馬可先生在 1950 年曾出版了一本巨著“指揮家和他的指揮棒” (The Conductor and His Baton)，成為世界音樂界的經典著作，對後人學習指揮有着極其重要的指導理論。同時他一直不遺餘力推動培養年輕指揮家的工作。為紀念他對世界音樂界的貢獻，丹麥廣播交響樂團從 1965 年舉辦國際青年指揮比賽，每三年舉辦一次，迄今這一國際活動仍繼續進行。

卡洛·塞奇是意大利著名鋼琴家音樂老師及指揮。1903 年在羅馬出生。自幼即受到身為鋼琴家的母親傳授學習鋼琴，然後在聖齊契麗亞音樂學院隨老師佛蘭西斯哥·巴加狄 (Francesco Bajardi) 學習鋼琴和作曲。當時有一位在羅馬生活的美國費城人士 W.C. Cramp 認識塞奇後，支助他

前往柏林師從意大利鋼琴家及作曲家費魯西奧·布索尼 (Ferruccio Busoni 1866–1924) 。期間他曾轉往巴黎但不久又回到柏林，跟隨他認為一生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奧地利老師阿圖爾·施納貝爾 (Artur Schnable 1882–1951) 學習鋼琴。施納貝爾在音樂界是一位聞名額嚴謹學者派老師，他對一些音樂界人士單純地在技巧上炫耀不屑一顧，所以塞奇在他的教導下認真鑽研，終於在 1920–1930 年間在俄羅斯一舉成名，風靡樂壇。甚至當時世界風雲人物史達林都有意和他會面。

在兩次的世界大戰期間，他一直蟄居在羅馬，但也為墨索裏尼演奏，不過有趣的是他很討厭希特勒。戰爭結束後他的聲譽如日中天而響徹世界，在亞洲他曾七次訪問日本，并在那裏授課。

約翰·巴比洛利爵士來自生活在英國的意大利音樂世家，祖父和父親都曾在米蘭拉·斯卡拉歌劇院 (La Scala) 樂團工作過。巴比洛利四歲開始學習小提琴，後來轉學大提琴。在他輝煌的音樂成就中，兩次在美國擔任著名交響樂團指揮。從 1936 年接替阿瑟·托斯卡尼尼 (Arthur Toscanini) 出任紐約愛樂交響樂團指揮一職，到 1943 年離任。另一次是出任休斯頓交響樂團指揮達六年之久 (1961–1967)。

雷奧拉多·伯恩斯坦？（需要添加資料）

了解到這四位國際音樂家的背景，就能更深入了解郭美貞在音樂道路上的邁進和成就。美貞在追隨他們學習的過程中，領略到教育培養音樂後進，比創造自己在音樂界的成就，是一個有修養有愛心音樂家必須展現的無私精神。

# 序 言

(郭美贞亲自撰写)

我無法回憶起自己已經誕生…直到再次從潛意識裏從新認識到我出生的旅程。這一歷程是爲了對如何醫治我晚期的乳腺癌，愈合我受打擊的自尊心以及破碎的心而孤注一擲嘗試着找出答案。

我曾成功組建的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因爲政治鬥爭而被解散，友情也成爲讓靈魂痛苦的個人恩怨。完全令我無法理解。

我總是認真工作，目的是爲了完成父母，老師，社會和國家對我的期待，在你看了介紹我的小冊子後，就能了解我是經歷了奮鬥才得以成爲交響樂的指揮，去過許多國家工作。

我也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如同對音樂的熱情一般履行着我的信仰。我始終理解一直得到神靈的引導，我的演出是因爲有着比我自己更爲強大的力量在推動。

然而在我同馬尼拉交響樂團一同巡回演出最後一場音樂會的時候，皮娜土波火山爆發噴出火山灰和洪水，導致我第六場音樂會被迫取消。

在那沒有被取消的前五場座無虛席的音樂會中，我察覺到一個不祥黑暗的存在，這個黑暗的存在就隱藏在我曾

經面對過的政府，音樂和醫療一些龐大機構裏的層層欺騙和政治鬥爭裏面。

我兩個弟弟都是西醫，然而我們親眼看到雙親都是死于腸癌，一個是在腸的左邊，而另一個則是在右邊。

我看過最好的醫生和專家，最好的外科專家和醫院治療。但我無法欺騙自己。面對這個存在，我知道所有在我外界人生裏所作的一切包含我的天主教信仰都顯得蒼白無力。

這都祇不過是錯覺而已！死亡是我不能再否定的現實。

當我在臺北等候控告臺北愛樂交響樂團被非法解散的官司聽證之際；我夢見被不同顏色的蛇群包圍着，我被神魂顛倒地迷住了，但我知道蛇是欺騙的警鐘。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案件没有被允許做任何的聽證，我的等待也是徒然。在臺北愛樂交響樂團被解散後，我夢見三位中國廟宇裏帶有油彩臉的神欲將我從這個心碎的地球上的生命帶走，然後令他們驚奇的是我暗示他們遠離我，於是他們轉動着難以置信的眼珠子順從了我。

我也曾有過兩個很生動的夢，給了我希望和鼓勵深入觀察自己。一個是龍形的人從山崖上伏衝入海。因為我是在龍年出生的，我將它解釋成那是我在潛意識裏伏衝入海。

另外一個夢是對死亡的可怕恐懼。蓬罩着的骷髏在我面前盤旋。然而如同靈魂般，我感覺到的是沉靜和強健。我向死亡招呼，并讓它漸漸向我靠近。突然間我伸出左手奪走它右手中的權杖，同時命令它離開。

那骷髏上的洞原來都是眼睛和嘴，如同受了驚慌般地張大着，并聚精會神地望着我，然後慢慢地面向着我恭敬地飛翔般地後退直至消失。

記住了靈魂的力量，這夢也驅散了我對癌癥的恐懼。但是醫生們并不喜歡我的態度。

其中一位就很不客氣地對我說：“你是死定了，所以你要好好地按照我配的食譜進餐。”

看了他配的食譜後我決定不吃，我寧可因營養不良而死，也不會遵守她配的食譜。另外一個專科醫生曾說，他并不希望活得太長，因為那祇是時間問題，我們都會或早或晚地死去。我記得醫生都一致說癌癥不應該被割，因為萬一癌細胞被騷擾後癌癥就會擴散。然而現在動手術却成了普遍的建議。

外科專家曾對我說過動手術并不能讓我康復，因為要將整個腫瘤完全割除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樣，他又補充說，應該允許他給我動手術，祇有這樣我們才能百分之一百確定我已得了癌癥晚期，而不是從其他如乳腺癌掃描，超音波或者是穿刺等檢查最後祇得出百分之九十八的準確率。祇有這樣所有的醫生和我的家人都認為我的死亡是對的。

從這些故事中我認識了生命，同時我在沒有手術沒有化療和放射的過程而給自己治療，我拒絕了弟弟給我提供治療，還讓我如同母親在那裏仙逝一樣。住在他家等待死亡。

我知道假如我逃脫了死亡，我必須對自己的治療要付全責。我知道我需要重新檢視我的外界生命，每一個情緒和心智精神的模式，每一個態度和意見。

我曾有很長的時間獨處，傾聽着寂靜，同時傾聽着內在的自我。我觀察着腫瘤和每天身體內在的變化。

我發現自己并不僅僅是因爲癌癥而走向死亡，而是我整個的器官中沒有一個是正常發揮它的水平。這是因爲一次觸電意外所致。當然後來我發現生命中是沒有意外的。

一位自然療法專家曾告訴我，她不知道應從那方面開始給我提供治療，我子宮裏酵素增高，因腎衰竭而引起過尿中毒，因肺衰弱而引起氧氣不足和身體部分的阻塞，因爲營養不良而將導致我逐漸步向死亡。我無法消化吃下去的食物，連維生素也吸收不了，尤其是含鐵的維生素甚至還回引起痛楚。我沒有任何的選擇，祇有接受黑夜和靈魂的種種試探。緊跟着神靈的引導及其神秘的方向。

我發現上帝的愛永遠是爲了生命而不是爲了死亡，永恒的生命和愛。

千言萬語仍無法道出全部故事，我僅能一個場景接一個場景來描述自己的觀點。

你可以用自己類似的經驗或幻想來彌補我字裏行間的不足。

順着我自己獨一無二崎嶇的道路，通向我的外界和內心旅程。

力量和愛的道路都是愉悅的雕花裏的死胡同。

# 第一章: 童年的回忆

我記得越南西貢不同尋常的熱和潮濕的空氣，讓我的眼睛感到沉重。

我看到牆上的壁虎，在牆周圍一會兒蠕動一會兒又躲躲閃閃。到了晚上開燈後，我可以看到它們的心臟在半透明的黃色身子裏脉動。

我喜歡涼爽的夜晚，喜歡看星星和月亮。

我感到家就在上面某一個地方，而穿街走巷的小販叫賣聲和盲人按摩師單調的笛子聲給人的感覺是格格不入。

大概在我三歲的時候，弟弟勞伯特經常跟在我後面。

我記得在那座大醫院門口等待着他的出生，祇見帶着有兩翼白頭巾的修女忙着照顧病人。他是一個強健又開心的小嬰兒，母親給他取了個中文名字叫奮中，意思是要誠實，忠誠和真實。

我也是在這家醫院出生的，時間是 1940 年 7 月 4 日半夜三點鐘。

(郭美贞幼年时的照片)

我父親經常會不厭其煩重復地說，每當我被放置在漆黑的嬰兒床裏後，他總會忍不住要再看我一眼，用手電筒照我的眼睛時，祇見到我兩祇神氣活現的大眼睛注視着他。

醫生不需要打我屁股，我的眼睛就早已大大地睁着了。他認為這也是我很特別的另一種象徵。

因為出生在龍年，又是美國獨立紀念日也就成了特殊象徵，我感到自己很特別，甚至母親除了稱贊我，就喜歡挑其他人的毛病，尤其是對我父親。

即便是在早年，母親常說，不論我做什麼事都會做得很完善，而且引以為榮地將我所做的東西展示給別人，其中有畫畫或是折手帕。

(郭美貞和父母家庭照片)

生命對我來說是一連串的等待……

母親穿着打扮好，等父親在他的法國大米出口公司外面和商販討價還價後，回到家裏吃午飯。也等他會在擺滿琳琅滿目攤位的市場裏買回水果，蔬菜，肉魚和米。

我注意到街邊小販們在小心翼翼地秤好父母要買的東西後，總會額外添加一點。我很早就注意到，這額外的添加是任何努力中的成功不二要素。

這些等待也教導了我凡事觀察。

我見到土塵滾滾的街道上，擁擠着棕色皮膚的人們在那裏盡情地作着買賣。

我見到樹木，花卉，藍色的天空和雲彩，感受到比和我周圍的人們更形接近。至少他們是沉默的而沒有侵犯我的空間。

有時候我見到缺腿的在那裏要飯或是匍伏在地上，有時候見到他們用雙手推着自己前行。

對這些生命中的慘狀我早已麻木，因為每天清晨公雞的喔喔叫將我喚醒，而我總喜歡注視母雞帶着小雞在花園裏窺視。

然而一祇一祇先後被宰當作晚餐或午餐了。

每天清晨雞群因被廚師追逐而發出恐懼痛苦的尖叫，令我整日毛孔悚然。

開始時我非常憤怒而試着想阻止他，但他們却笑話我，還警告我說如果我没完沒了的抗議，就有可能吃不上飯而餓肚子。

他說得很對。

由于好奇的天性，我停止了抗議甚至還注視那觸目驚心的過程，從雞的脖子被割，接下來血慢慢的滴到一祇碗裏，然後用開水澆到死雞全身，再把雞毛拔光。

然後屍體被剝成一塊一塊，這時候我還被教會如何辨別雞胃，腸子，心肝，然後把雞珍切開，將雞吃過的最後一頓餐食清理幹淨。

我也學會了如何分辨雞的每一部份的味道，如雞肝和

鷄心味道就不一樣。甚至白肉和黑肉的味道也非常不同。我學會了品嚐帶骨頭的鷄肉是最鮮美的，而魚也是一樣，鮮美的魚往往骨頭很多。

廚師也宰殺活魚，活磅蟹，蝦甚至是活小豬。這些都最後上了餐桌。吃不吃成了每天的鬥爭。

這時候祇有逃避到白日夢裏去是最好的庇護所。有我的狗和貓相伴，比圍繞在我周圍人類的卑微生活要舒服得多。至少他們不會饒舌也不會對他們自己的思維和感受隨意批評。尤其是關於我是否應該思考，工作或者感受。

祇要我在汽車邊等候，或是坐在車裏把我帶到某一地方的時候，我就會做白日夢。至少這能讓我對生活予以忍受。我真正感受到悲傷和無所適從。

祇要我在汽車邊等候，或是坐在車裏把我帶到某一地方的時候，我就會做白日夢。至少這能讓我對生活予以忍受。我真正感受到悲傷和無所適從。

記得我曾對着鏡子看着我一雙小手和我鬱鬱寡歡的臉孔而絕望地哭了。

“這不是我！我已經長大了！” 我不可能這樣孱弱，這皮包骨的身子。

我了解自己曾經是強而有力的，而此刻這絕不是我自已。

然而沒有人體恤我用一些笨拙的動作來展現我內心的苦惱，經常被母親的傭人把我抱上床，她似乎把自己看成比我強而有力而感到自豪。

有一段時間我很反叛，凡是他們禁止我做的我偏要

做，就好像自樓上從樓梯扶手滑下來，將剩下的香檳酒，或者把父親最喜愛的巧克力和糖栗子全喝光吃光。

其實香檳酒并不好喝，但我注意到成年人似乎都很喜歡抽烟或是喝紅，白葡萄酒一類極壞的東西。

我雙親都不抽烟也不喜歡烈酒，但他們備有這些東西來款待訪客，為的是不要失面子。他們為客人購買昂貴的烟酒為的是要表現他們是行家，西方化和現代化。

他們總讓我嘗試我想要嘗的東西，所以有時候我就像法國孩子一樣喝摻了水的酒。

每每我嘗試了某一樣東西後就對它完全失去了吸引力。

我也曾喝過維迪 (Vitel)，一種沒有味道的礦泉水，或者是我比較喜歡的有氣泡并帶有一點咸味的維席 (Vichy)。

家裏的廚師備有一口大陶缸，裏面放了六層沙，用來過濾烹調用水。

因為我看到客人抽烟，也就用一張紙把一支香烟卷在裏面，然後插在燒煤的熱熨鬥裏吸了一口。我的舌頭被燙着，也就沒有再抽烟，直至二十六年到紐約之後我才再度抽烟，因為咳嗽最後也就完全戒掉了。

我們從西貢堤岸唐人街的一層平房搬遷到法國區裏的兩層樓房中。原因是父親的運輸生意迅速發展。他從一輛運輸車開始，到目前已擴充到八輛。

從郊外運輸大米到城裏是要冒着被土匪搶劫的風險。因為法國的占領，這些土匪蟄居在山區裏密謀反抗。

我父親經常說，沒有冒險就不可能獲得。因此我又學

到了另一個成功的秘訣。

我們第一個家前面有個小院子，種了幾棵水果樹。我和弟弟羅伯特同睡一張床，可以聽到父母輕聲地交談，他們以為我們已經睡着了，或是在談論孩子不該知道的事，比如路不遠處的妓院，孩子們連看一眼都不被允許的。

我父親和祖父在社區裏很受尊重，因為他們承擔了大伯公留下的債務。為了還債，父親很早就輟學，而在法國大米出口公司裏當裝卸工學徒。我祖父也在那裏工作過。父親很辛勤地工作，還要招待顧客一直到深夜。每當他回家必定會靜靜地窺視我們一眼，看羅伯特和我是否已經熟睡。羅伯特總一如既往地睡得很香，而我却用兩祇大眼注視着父親。

於是他會把我從床上抱起來，不顧母親抗議把我扛在肩上，消失在黑夜裏去買蘋果或是梨子。他認為這些水果比熱帶水果對我們更健康長壽。

我們就坐在街邊小攤上吃蛋撻，一些年輕人往往會給我們展現放滿了蘋果和梨子以及一些琳琅滿目不同內容的罐頭食物。這都是清潔工剛從法國戰艦上扔下來的，而他們就跳下水去撈起來。清潔工人知道這些東西當晚被撈起來賣出後可以分成。

父親在削好蘋果或梨子後，他總是把最好的部分給羅伯特和我，然後給母親，他自己就啃果心。

聽說母親埋怨父親愛得她不深，或是沒有實現送她去巴黎學鋼琴的許諾。她也經常提起多少有錢家庭希望父親能娶他們的女兒為妻，但父親選了窮人家的她。

外公在海上失蹤，所以要依靠家境好的親屬把她送到中國去深造。作為一個經過培訓的幼兒園教師，她肩負起先後撫養六個年幼弟弟妹妹的責任。

她不厭其煩地講因為父親堅持要娶她為妻，而祖母用拖鞋打父親腦袋的故事。

她也說父親對她的朋友總是很友善的，而曾經有一段時間沒人知道他究竟是在追那一個。

母親甚至警告過我，假如一個男人對我好，是因為他戀愛了。但這並不意味着他的善良是與生具來的。而假如他對每個人都一視同仁，那我就可以肯定他是善良的。

母親認為這就是一個男人最重要的質素。他必須具有一顆善良的心，不僅僅是爲了照顧他自己，也是爲了妻室兒女。

父親個子很高，長得很帥；高鼻梁和高額頭，一眼看上去就是一個誠懇的人。母親在批評他的時候他總是滿臉笑容。

母親長得并不漂亮，却具有天份和聰慧。她在彈鋼琴或是跳舞的時候所展現出的高超品位經常能掩飾她的缺陷。她的眼睛很小，塌鼻子，典型的中國人，而父親有部分越南血統，遺傳了島民的魅力。

(美貞全家福照片)

從我們搬到有兩個露臺，一個大花園還有自己防空洞的兩層樓房後，我們見到父母的時間就少很多了。因為他們要工作同時要參加商業和外交圈子裏的社交。

我和傭人及廚師相處的時間就更多了，他們的住處和主樓分開，廚房和洗衣也設在那裏。

對他們來說我是一個無法駕馭的孩子，有一天我親眼看到一條活生生的壁虎在廚房門的合葉處被壓扁了。之前它的心臟還在跳動，此刻却成了無沒有生命的一堆漿液。傭人看到我害怕了，就威脅說不管什麼時候，祇要我不聽話，就會從牆上抓一條壁虎來嚇呼我。

我也聽說斷了尾巴的壁虎每天在牆上亂爬會再長出另外一條尾巴來的。也還真是這樣。

我很害怕他們傷害壁虎的念頭，從那時起我就變成了一個模範兒童。但內心却很壓抑，而不惜用我細小的身子保持沉默和絕食來表達抗議。

我又得到父母的注意，因為他們不清楚為什麼我保持沉默又不吃東西，而一天天地瘦了下去。

因為西醫找不出什麼原因，所以他們帶我去看中醫。中醫師蓄着長胡子，有一對充滿智慧微笑的眼睛。

我的心帶着希望在跳動。在這個瘋狂的地方真會有高手的存在嗎？

他給我把脈，當我看到他那過長的手指甲時開始懷疑他會真的是個高手。但我有太多的問題要問他，而我的問題令父母感到吃驚。

聽到我開口後，他們就立即感到鬆了一口氣，而決定

不論他們去那裏都會讓我跟着，不再讓我跟着傭人了。

我去過夜總會看耍把戲，肚皮舞還有魔術。去過父親老板安排的宴會，也去過馬球俱樂部看馬跳躍，也看到許多穿着華麗幽雅服飾的法國女士。我推斷法國人處在社會中的頂端，其次是富裕的中國人，然後才是越南僕役和工人。

這裏有印度人，他們擁有很大的布料店，但富有的并不很多。

每個人都贊揚我的彬彬有禮，每次母親在中國總領事館裏和她朋友喋喋不休交談時，我總安靜地坐在那裏。陳阿姨是總領事的夫人，還有她圈子裏的一群夫人，而母親總是超藝群眾成爲最時尚的或是杰出的鋼琴家，或是最佳舞蹈者。父親也就不得不同他們一起練習舞步。

在這個圈子裏我結識了一些小伙伴，但他們祇喜歡洋娃娃，而我却對蜻蜓，公牛蟻，螢火蟲和蝴蝶更感興趣。

有一次，好幾祇和人臉差不多大的蝴蝶飛進家裏來，我被告知稱這是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精靈的造訪。我祇是驚嚇地望着它們。

高大的橡樹也是巨大的精靈，伸展出它們的枝叉，給我們遮住炎熱的陽光。有些樹的葉子在它樹幹周圍形成一個圓圈，祇要在那個圈子裏就會感到很舒服的。那裏比圈子外面要涼快多了，讓人感到輕鬆自如。

我發現自己并不喜歡匆忙地從一個場合到另一個場合，祇是爲了聽那些大人們毫無意義的閒聊。

我喜歡自己的三條狗，Kiki 和它的兩個孩子，我寧可

和它們及羅伯特一起呆在家裏。

我開始練習鋼琴了，母親對我的學習和輕鬆地練琴感到欣喜萬分，不管什麼時候，祇要父母要我為他們或是他們的客人彈琴，他們會因為我彈得一手好琴而引以為榮。

(郭美貞練習鋼琴照片)

我不明白的是，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但是祇要音樂能讓母親開心，我就去彈。

經常在練習完一首曲子後，在開始練另一首曲子前，就跳上我的黑白色三輪馬車。用最快的速度在起居室裏騎着轉。母親常常認為我很嚴肅地翻着那些樂譜，或者是在回味着我的彈奏。

母親在我曾姑婆創辦的幼兒園裏教過書。學校院子裏有四座神臺，上面擺着不同的廟宇菩薩或神仙，經常是香火裊裊。

我常用親吻或哈她癢給曾姑婆逗樂。她有一雙小脚而使她不良于行。但她將所有的精力和積蓄都投入到學校裏去，因為她認為祇有通過教育才能使中國人能有所長進。

我能感受到學校周遭的精靈，特別是這裏有一棵巨大

的老樹。有一次一個光頭尼姑來到我們的學校。我注意到她有一對明亮的眼睛，她的思維和僕役，廚師和司機炯然不同。

傭人們花很多時間和我們孩子在一起，如洗滌，喂飯，洗衣服和開車帶我們逛等等。

他們警告我遠離這尼姑，因為她會吃小孩。我知道這是假的，也因為她并不介意他們的玩笑而為她高興。

有一天她把我拉到一邊，用黑墨水在我左邊面頰上點了七下。她說這是為了提醒我到家的心靈旅程。

我還在幼兒園的時候，曾姑婆去世了。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此風光的葬禮。燒了一個好幾層高并放了家具和設備的紙屋，還加上許多紙錢和禮物，都是準備好給她使用的。

許多和尚在那裏唸經，好多人穿着白色的喪服在哭泣，我没有哭，也不認為她已經死了或是失去了她。我直觀地了解她還存在，祇是不在她自己的肉身裏而已。

為什麼要為她的下輩子燒那些禮物，她在那裏沒有了病痛身子也不疲憊，却還要那麼地為她悲傷。

我的結論是人們不是為她哭泣而是為他們自己，因為他們害怕還沒有為自己賺到足夠的風光喪禮和極樂世界之前就死了。後來有人告訴我，其中那些哀嚎的都是職業送葬的。他們是在支付報酬後為了維持哀傷場景而哭泣的。

還有許多食物和飲料有如是一個大聚會。

我第二個家也在法國區內，鄰近也有一座小佛教廟。每天不分晝夜都可以聽到和尚和尼姑頌經。

祇要我一問起有關神仙和神靈的事，就會被告知，把雙臂下垂并不停地轉着身子，然後停下來感覺一下自己的精神狀態，一直轉到頭都暈了。

他們又教我閉上眼睛，用手指壓着眼睛面向太陽，然後放開手我就可以看到額頭上出現紅顏色而不是黑色。從那天開始我額頭上就經常充滿了紅色，粉紅色和橙色，從來就沒有黑色出現過，一直到後來我用心靈網上的第三祇眼理解到觀察顏色的意義。

當母親懷着彼德的時候，日本飛機經常轟炸西貢，祇要空襲警報一響我們就躲到防空洞裏去。爲了躲避轟炸，我們就遷移到郊外去了，在河邊租了一棟有錢人已經騰空了很久的大房子。

我們距離叢林很近，那裏有高大的橡樹和羅望子樹，鮮艷的花朵和不同種的鬱鬱蔥蔥的綠色灌木。在河邊有美麗的荷花，我們也養了鴨子，豬和雞，同時在菜園子裏種了包括四季豆，番茄和南瓜等在內的蔬菜。

那裏有木瓜，椰子，和香蕉樹，男孩子會爬到樹上把成熟的果子摘下來給我們吃。我們常去摘番石榴和芒果還有好多其他的水果，它們似乎在甘蔗田附近隨處生長。

那裏還有菠蘿蜜甚至榴蓮樹長着碩大的果實等着人去採摘。

這些田園詩般的場景，却被我們在河中採摘菱角和蓮子的時候看到漂浮在水面的死尸所破壞。母親總會帶着恐懼趕緊讓我們進到屋子裏去。

即便母親懷着大肚子，爲了鼓舞農民抗日士氣，她在

附近餐館裏爲他們拉手風琴，還可以賺到一些外快。我們家的傭人去叢林裏參加秘密會議，爲了打仗在臉上塗了油彩。他們帶我去過，記得有一次因爲他們自己無法前往，我還給他們傳遞過情報。他們在叢林中的隊友還稱贊我很勇敢同時感謝我，但要我盡快順着原路回去，不要告訴任何人我曾去過那裏。

這些隊友們都攜帶着博羅刀，祇要砍一下就能够把一根粗壯的甘蔗劈開。他們給我砍下甘蔗，我先嚼着汁，然後把幹巴巴的渣滓吐掉。我很喜歡甜甜的甘蔗汁，但因爲咀嚼粗纖維太久以至于我的嘴巴都咬痛了。甘蔗汁和椰子汁都是我喜愛的飲料。

母親從來就不知道我曾去過被禁止進入到叢林中的郊游。我知道那很危險，因爲我經常聽到槍聲。

曾經有一段時間農村婦女脫下她們的襯衣，半裸着上身來回走動向日本人抗議。這是爲反抗對他們國家和人民施行野蠻暴行和強奸的團結和蔑視的象徵。

這些苗條而美麗的婦女看上去激進而令人敬畏，特別是她們因嚼檳榔而使牙齒都變黑了，看上去和北方同胞沒有兩樣。

父親很自豪地告訴我，中國從來就沒有用武力來徵服越南。因爲中國的優越文化，越南人向中國納稅而享受保護，同時從她的智慧和文化中學到不少。

有一次麻瘋病人來到我們家，臉上和雙手都被包扎着。我們給了他們食物。即使母親不許我靠近他們，我還是走近端詳他們腐爛的臉龐。

我父親經常往返于西貢和郊區之間。當一群日本士兵到家裏來索取食物時，幸好父親和我們在一起。因為父親對他們很客氣，也給了他們索要的食物。我們逃過了一場傷害。母親，姑媽，羅伯特和我躲藏在一個大壁櫥裏。日本軍官還給父親留下一把日本軍刀作為謝禮，我想看一下那鋒利的刀刃，但給父親嚴詞拒絕，並把它放置在我無法企及的高處。他知道我好奇性格，往往對任何事情都要一試。從父親那裏我學到了最聰明的辦法，就是用禮貌對待即使是痛恨和害怕的敵人。

我也記得戰爭結束前，彼德在郊區醫院出生。彼德是一個很文靜的寶寶，母親給他取了個中文名字叫建平，意思是期待和平。在等待他出生的時候，羅伯特和我在花園裏踢小石子玩。母親最小的妹妹從西貢來做羅伯特的保姆，但她在戰爭結束前就過世了。

母親說她是為了我們而犧牲了自己的生活。但也承認這個妹妹是真正愛她的。在我生命的早期就學到了犧牲和責任這兩個字眼的意義。

父親為了代伯公還債而作出犧牲，母親為了照顧弟弟妹妹而作出了犧牲。對他們來說，除非是為榮譽而生活，否則生命就毫無意義。

因為我是長女，所以常被提醒，為了得到尊重就必須要更機靈。我外婆是首先剪掉辮子的女性之一。梳了短頭髮。她也拒絕纏腳，她是長女所以要先出嫁，那怕外公那時候愛的是她最小的妹妹。

他們雖然有六個孩子，可是兩人經常吵架，有一天突

然傳來他在海上失蹤的噩耗，從此沒有再回來。

母親和外婆經常是意見相左，兩個人都很率真而又直接。母親總是爭着社會地位和尊重，衣着上力求時尚甚至帶有西方化，而外婆就穿着中國農村裏的黑衣衫并引以為榮。

### (郭美貞和外婆照片)

我們不屬於富有階層，也明白生活在外國，必須要勤奮工作創建自己的財富。母親要看着我們吃乾淨碗裏的每一粒飯，強調農民在烈日之下站在泥濘的田裏種稻。很明確地讓我們這些孩子了解到農民的貧困。告訴我們農民們沒有肉甚至連魚也吃不上。所以他們雕了一條木魚，把炒好的豆豉放在上面，象徵他們在吃米飯和豆豉的時候有魚佐飯。

我們從不被允許浪費食物，但有足夠的糧食給傭人，他們吃剩下來的就用來喂狗，貓和雞。

在中國，假如有像我祖父那樣不想融入中國社會或遵守規矩的人，就會離開村莊出海，成為華僑到海外掙錢。然後他們就把錢匯給中國的家人，由此而得到尊重。

我祖父在償還所有的債務後，他和父親還把錢匯到家鄉，蓋了一座祖居。曾祖母爲祖父選了一個中國女孩子作爲他的未婚妻。他拒絕回到中國去完婚，因爲他已經和我有半個越南血統的祖母結婚，我用越南文 banoy 稱呼她。於是曾祖母用一祇公鷄代表他成婚，然後安排他從未見過面的中國妻子乘船來到西貢，開始她的新生活。我祖父需要爲中國妻子另外安個家，我有半個越南血統的祖母爲此傷心而經常以泪洗面。

祖父和半個越南籍的妻子生了七個孩子，和中國妻子生了六個。父親是半個越南籍祖母生的長子，也就有四分之一的越南血統，這樣一來我和弟弟們就具有八分之一的越南血統了，但我們持有的是中華民國護照，認爲自己是中國人。

### (郭美贞和祖母合照)

半個越南籍祖母和她妹妹是典型的勤懇越南婦女，既會做生意又能看住家裏的錢包。我的越南姨婆擁有幾輛小馬車，用它們來載客或是在城裏送貨。

祖父對半個越南血統的祖母照顧得無微不至，他發誓她是唯一的真愛，而另外一個家祇是爲了討母親的歡心并尊重她的願望。

半個越南血統祖母給我們做精美食物和點心，她有一張大木床幾乎占了整間房，用來做床，飯桌，也用來坐或是在那裏玩。這張床的木頭有六英吋厚，做工很精致。一般越南家庭在這大床的一端堆着很多枕頭。在上面睡覺很涼爽而感到身價百倍。

父親後來也買了一張類似的大床，但一直放在我們第二個家的車庫裏。父母從來就沒有在那床上睡過，祇給我們孩子在上面玩。祇有在節日的時候，父親把他所有的員工和司機請來，上面擺滿了吃的喝的，給客人們準備了露天烤的乳豬，越南蛋卷，蒸的和炸的春卷，魚蝦，魷魚和螃蟹，蛋糕點心和不同的水果等等。

這是父親表達他贊賞和獎勵員工的方式，而每個人都盡情地享受這節日。我也因此學到了表達贊賞和感激以及建立友好關係及社會接觸都是成功的關鍵。我從來沒有見過外公，因為他是在海上失蹤的，但我和外婆很親，因為母親在教書的時候，她就一直照顧着我，我們在社交上的獨立精神和對事物的討厭都有很多的共同點。

爲了拍家庭照片，我很討厭把自己穿着得像個西方洋娃娃，或是爲了照相而把頭髮卷了起來。我不僅是個愛打打鬧鬧的女孩子，而且還真相信自己錯身了。

**(郭美贞卷头发照片)**

這和性別無關，而是與其弱小不如強而有力，在包括兩個弟弟和三個表弟在內的小幫派裏，我就自然而然成了頭頭。

我畫了一尊神像後就要他們鞠躬下跪，他們絕對是百依百順。但很快我們對這種遊戲就產生了厭倦。經常去看廟會就注意到，如沒有信徒就會感到百般無聊。

原來母親最要好的朋友是她的一位學生，爲了能更接近母親，她選擇了嫁給我四叔，成了我們家裏的一員。他們婚後一共生了三個表弟。我們經常一起玩玻璃彈球，跳房子，跳繩，捉迷藏，或是用橡皮筋將紙彈粒射同學。有一天幾個男孩子用鋼絲球打我們，讓我們感到巨痛，從那之後我不許再這樣玩了。也決定不再理會那些男孩子。

我們也和家庭醫生的三個孩子一起玩，就如同我第一次和莫尼克玩耍的時候那樣，我的心裏在放電。

在我長期的愈合過程中，我重新經驗到這屢屢的放電，感受到這些就是在我肉身中的情感和心靈所釋放出長期被遺忘的痛楚的因果報應。

我們也和司機的女兒一起玩，她妻子也在我們家裏幫傭。

我記得在看漫畫書中描寫男主人公抓住一把打開的傘從高樓上一躍而下安全地降落在地上，於是我就命令我們的小幫派從陽臺上跳下去。

她的女兒首先自願爬到欄杆上，打開了傘正要向下跳，被她母親大聲呼叫阻止了她，並衝上去從欄杆上把她拽了下來，並對着我大嚷，說我把他們給帶壞了。

爲了不想錯過我的實驗，我把打開的傘扔向欄杆外，令我吃驚的是它不像降落傘那樣徐徐下降落，而是瞬間就掉在地面上了。從那天起我認識到我不能完全相信書裏所讀到的一切。

戰後我們回到長堤的老家，羅伯特開始病得很厲害。母親還沒有從失去幼妹的痛苦中恢復過來，也經常感到很不開心，總覺得沒有人愛護她。

她經常含着淚說，父親對她唯一表達過的感情是用筷子夾了一塊魚送到她嘴裏。

因爲羅伯特發高燒也不吃不喝，母親日夜得看着他，但最後他昏迷了過去。西醫對他束手無策，母親爲此焦慮不已，祇得帶他去看中醫。她要先將草藥熬好幾個小時，然後按時間一匙匙地喂他。漸漸地他身子沒有那麼僵硬了，母親看到他眼皮眨了幾下竟然高興得哭了。

她要不斷爲她擦拭排出來的清液體，經過了好幾個星期，他嚷着要吃東西。母親說他身體裏的毒都排出來了，爲此她煲各種不同的湯來幫他恢復體力。

她爲他炖烏雞藥材湯，在他恢復健康前還辭去了教職。母親還說她妹妹就在那時去世了，所以羅伯特一定要活下來。

後來她經常以此來提醒羅伯特，在他長大之後一定要當醫生來救治生命，而他做到了。

羅伯特長得很結實，其他的男孩兒就經常到我們家來一同玩耍。他們都比我們大，給我們講一些成人的故事，也搭帳篷要我們和他們一起在裏面睡覺。

他們要我們爬到圍牆上去偷看鄰居做一些我不懂的事，然後他們就在那兒傻笑。他們教羅伯特一祇手做成一個圓圈，然後用另一祇手指在圓圈裏一進一出地拉。

母親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任何我不能做的事，但她告訴羅伯特不能這樣做，而且不許他摸自己。

她搖着頭對父親說，羅伯特的生殖器一直處於堅挺狀態。我注意到她用同樣不贊成的口吻，抱怨他把用過的避孕套隨意扔在房裏而被我找到。然後她快速地從我手裏拿走，包起來扔掉，從而無法找到。

我們經常看到狗在交配，但我從來沒有看過人做同樣的事。我想像着妓院裏赤身裸體女人上下抖動的情景，僅此而已。

我不喜歡那些到我們家來玩耍的孩子，看上去幹幹瘦瘦的。

唯一我喜歡的是舅舅的身材，是母親的三弟，抗日戰爭後回來，他有着高大而堅如磐石般的強健身體。

他胸前帶有槍傷，大腿上有一條長長的疤。經常給我們講戰爭故事和中國歷史英雄，既有聰明也有殘酷的黃帝。忠心耿耿的關公，和老謀深算的周瑜，還有喜歡冒險的孫悟空。

他可以和我們消磨一整天，為此母親不必看管我們，而能好好休息一下。每天下午他開車帶我們去公園或到河畔，那裏經常可以看到泊停在河裏的法國戰艦。我知道這就是那些蘋果，梨和許多罐裝食物的來源。

我也看到瘦小越南女人在河邊沐浴，年輕的法國水手在那裏注視。有一次我聽到在河裏沐浴的女子在叫罵，而那些法國水手把她們的衣服偷走了還在那裏大笑。

這些女子從不會在那裏裸浴，他們上岸後去水手那裏要回衣服，濕淋淋的衣服緊貼在堅挺的乳房上，似乎讓水手感到喜悅。

我喜歡和小狗及弟弟一同在公園裏奔跑。舅舅就給我們買糖果或雪糕筒。但母親不喜歡我們吃小攤上的食物。外婆不理會她的現代衛生觀念而讓我們開心，舅舅也是這樣。

我八歲了，也長大了，父親不可能再讓我跨在肩上周圍走，何況他也很忙。但舅舅常襍我，我也因為能貼着他強健的身子而感到喜悅。

他會坐在父親的大椅子上，我們三個孩子就坐在大桌子上，聽他給我們講勇敢而忠誠的英雄和那些狡猾刁鑽的將軍們如何智取對方的故事。

我們常常會滑下來坐在他的大腿上，外婆就警告舅舅不要讓母親看到我們這樣抱在一起。

有一天母親回來興奮地說她遇到一個叫伊蓮。麥唐諾的澳大利亞女士，她很願意贊助我到悉尼去上學。母親常說她不會給我備嫁妝，而要給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也不會給弟弟們錢，而是要給他們提供良好的教育。因為她說別人可以拿走你的錢，但永遠取不走你的技能和知識。

我很願意離開西貢因為這裏教育沒有挑戰性。而我花很多時間在做白日夢。

我上的法國小學，用簾子隔開不同的班級，我就常常趁人不備的時候溜出課室。

記得有一次印度女老師爲了要班上安靜而打我的頭，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有人生氣地用指頭觸碰我。

我想還手，但因爲沒有勇氣這樣做而對自己生氣。我發誓假如有人再打我，我回立即還以顏色而不會再被羞辱。

一天父親回來給我展示那些叫基尼的澳大利亞金幣，又給我看一些土著，袋鼠和考拉熊的圖片。然後他就把這些錢幣放在抽屜裏鎖了起來。

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決定去找父親的鑰匙，想再好好看一下澳大利亞雜誌。令我吃驚的是發現一大堆雜誌裏面都是裸體的男男女女。我就把這些雜誌給外婆和舅舅看。他們告誡我在母親回來之前，趕緊把這些雜誌放回原處。

由于我没有好好看，於是決定想看外婆的乳房。外婆邊笑邊搖頭。但在我一再堅持下她終於解開襯衫的鈕扣露出兩祇細長的乳房。

我正在贊嘆不已的時候她很自豪地說：“這兩祇乳房喂了六個孩子！你期待什麼？”

然後我也想看看舅舅赤身裸體。他決不脫衣服，但把我的手伸到他的褲檔裏。當我觸覺到粗卷曲的毛發時立即把手抽了出來。這祇是對成年男女身體的好奇心而已。由于我和弟弟常在一起沐浴，所以了解女孩子和男孩子之間的不同。

有一天阿媽爲我穿衣服的時候捏了一下我的胸部，還告訴我胸部會長得更大。而我對這些改變感到很生氣。

父母同意母親的澳大利亞朋友的妹妹作爲我的贊助人，因爲伊蓮·麥唐諾是單身不能做我的贊助人。

他們願意放我遠行，認爲趁我年輕可以體驗一下新國家的生活。他們讓命運或是上蒼來決定，意思是假如我能獲得簽證和贊助，他們就讓我走。

不管怎樣，在等待了一年後，一天父親從澳大利亞使館回來，高興地說領事在沒有附帶的要求下同意給我發簽證。

我感覺到母親在想方設法地讓我留在家裏。我還要到中華民國總領事館申請護照，父親告訴我中文姓名，還教我寫郭美貞三個字，郭是我們的姓，美的意思是美麗，而貞的意思是貞潔。

我在上法國小學的時候，每個人都叫我小名咪咪。給我取了法國名字叫海倫·郭 (Helene Quach)，現在我在澳大利亞用的姓名是 Helen Quach。爲生命中的一個新階段所用的新名字。

記得每天我們開車去公園的時候，我總是手裏拿着一個玩具飛機，把頭和手臂伸到汽車天窗外。有一天我們在鬱鬱蔥蔥的垂樹下開車回家的路上，一祇藍舌頭的蜥蜴掉在我頭上，感覺有東西在拉我的頭髮。

我以爲是小樹枝就用右手去摸，感覺到小手指上劇疼。舅舅從我頭上把它拉下來，丟到草叢裏去了。

我要他答應回去不要告訴任何人，尤其是母親，深怕她會以此為理由不讓我去澳大利亞。

原先她是準備帶我去的，但後來却冷淡下來擔心整個的旅程。

舅舅在我傷口上搽了碘酒，還死命的把毒水擠出來，我却裝得若無其事。

最捨不得的是我的狗。不知什麼緣故，我總感覺我們關心的死實際上并不是離去，我們終究會在某一個地方重聚。

記得我曾在眾多的白日夢裏曾經告訴上帝，我並不想活在這個地球上的傷心之地，但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在這裏。因此需要他的指引，也要讓我清楚不論何時都要這樣做，同時我答應為了他，我將會盡一切努力做好。假如那是為了上帝我一定會做得最好。我不希望在此生失去四肢和頭腦。

我絕對不會要像那無腿乞丐的生活和因為悲哀而變得精神失常。

我承諾過祇要我清楚地認識到，別人對我的期待或者是要求我做什麼時，我會盡最大的努力。

為此我一生中從來不會說“不”，一直到我體會到歧視的精神法律。

我的法語老師因為我離開而感到很遺憾。她認為我很有天賦，而為了激勵我，她常常彈琴給我聽。

記得她一開始先用貝多芬的 Wullstein 奏鳴曲音樂來提煉感覺，促使你跟着那音樂走，或是用第二樂章的要點，使

那聲音引領你休息或者沉默。我可以感覺到她在彈奏蕭邦浪漫曲二號時的感情，也注意到她沉醉地哼着，試着將生命注入到音符裏去。

後來我認識到除非能將真誠的感情融入到每一節拍中，否則音符是毫無意義的。

我知道她的特別并非因為她美，她戴着厚厚的眼鏡幾乎涵蓋了她全部的臉。她長得矮矮壯壯，但她具有豐富的感情，使她贏得一個比她小很多而且很帥的丈夫。

出發的日子近了，母親和我裝了十個箱子。這時候我感冒了，母親要舅舅在我睡前給我在喉嚨和胸前熱敷。他一邊給我擦胸，一邊要求我別忘記他，同時他給了我從來沒有感受過的吻，我把他推開了。

這第一次肉體和性能量緊鎖在我的記憶中，對它的力量從此產生了懷疑。

母親和我是飛往悉尼四個引擎飛機航班上唯一的乘客。空中小姐坐在那裏和我們交談，并給我們送餐。

(美貞上飛機前照片)

大部份時間感覺到飛機似乎沒有動靜，而當飛機突然飛入雲端時，雲朵匆匆地從窗前飛過，為此感覺到飛機在飛而有點頭暈。

空中小姐離開我們後也趟下了。我注視着飛過的雲朵好一會，感到有點累就睡着了，當我醒來的時候，飛機在1950年1月1日在悉尼機場着落了。

機場裏空蕩蕩的，海關人員朝我們一大排的行李看了一眼，眨眨眼笑着，一祇箱子都沒有打開，就向我們擺了擺手讓我們通過。

母親不會說英語，但她微笑着說：“謝謝你”，用中文對我贊賞這位澳大利亞好官員。

伊蓮阿姨同他的兄弟杰克，以及我的贊助人赫爾夫婦都在機場接我們。總算把我們和一大堆行李塞進了兩輛車裏。

從機場到赫爾住的馬諾布拉區道路上空空蕩蕩的。西貢的街道從不會這樣的空蕩，經常是像新年一樣熙熙攘攘地。然而現在，人，舞龍，鞭炮和新年慶祝活動都到哪兒去了？

這沉默的空虛是我遇到的第一個文化衝擊。接下來是經過長途飛行後的冷食，我想喝點熱稀飯來調節一下氣候轉變和時差。但主人祇給了我一個雪糕筒，似乎我要爲此而喜歡他們，事實上我覺得太甜太膩，就讓母親幫我吃掉。

然後我們拿了一大盤菜，裏面有冷火腿片，冷蕃茄和生菜，加上奶酪和紅菜頭讓我感到更倒胃口。冷的碳酸檸檬水是我第一次嘗到的重碳酸飲料讓我吐了。

因為我和母親誰都不會說英語，祇能默默地望着主人讓他們感到很不安，而我們的笑臉也逐漸顯得蒼白而有倦容。

在絕望中他們祇得帶我們到對面的中國人家裏，留我們在那裏閑聊。母親能說三種中國方言，所以很容易和那個家庭交流，但我沒有心情去交談。

我望着街對面主人家修剪得整齊的草坪和花園裏的玫瑰叢。我回想着腦子裏那些令人窒息的牆到牆地毯，擋住光線的窗簾，帶有網眼花邊的床單上面還放着一個傻洋娃娃，以及鳥籠子裏孤獨的藍鳥，我無奈地嘆了口氣。

他們又帶我們到波塔尼 (Botany) 伊蓮和杰克的老家去，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裏以前是一座牛奶場，杰克養了一祇狗和一祇貓還有一間大鳥舍裏面養着無數的禽鳥。看到他的巨大馱馬和他們從皇家復活節展中贏得的獎帶我好開心。

有幾祇賽馬正在假眠，另一祇漂亮的灰色母馬贏得了我的歡心。鄰近的圍場和火車綫路都是預見的探險。我不加思索地對自己說這就是我想住的地方。

我注意到地上鋪有塑料氈和地毯，也有同樣令我不開心的檔光的窗簾，還有床上放着的傻娃娃，不過這座房子裏的氣氛和那座相比之下沒有那麼單調，這裏甚至還有一架鋼琴。我決定為主人彈奏，以後他們就不至于拒絕我的任何要求。

母親和我就和伊蓮住在一起，到了晚上，赫爾夫婦過來和我打乒乓球或者玩撞球。

在玩這些遊戲的時候我總贏過赫爾叔叔而感到高興而自豪。他是我所有見過的男人裏最魁梧的一個。但他沒有強壯的肌肉。却有一對明亮的藍眼，挺直的鼻樑和白皙的皮膚，是一個典型的好人。

赫爾阿姨既會彈鋼琴也會拉小提琴，但稍嫌枯燥乏味，她把小提琴給了我，我說一定會好好去學。

赫爾夫婦帶我們去參觀他們在春林 (Springwood) 的一座度假別墅，赫爾夫婦有愛爾蘭的高大血統，赫爾阿姨穿着貼身內衣，胸脯很大。她把我的頭靠在她胸口，但那貼身內衣把我頭緊緊包住，我趕緊把頭挪開。

那裏曾發生過森林火災，看到那大片大片被燒焦的樹木我感到很不舒服。又是生命的空虛！

然而那些土著，袋鼠和考拉熊又在哪儿呢？

我們到達之後曾沿着溪谷行走了很久，却仍然沒有看到任何生命迹象，連一祇麻雀都沒看到。

我覺得很沮喪，走到溪谷盡頭的時候，我拿了一根樹叉把水打到每個人身上，弄得所有的人全身濕透。

我們僅在那裏度過周末，沒有任何的村莊也沒有任何的文化生活。祇有長長的車道和在空蕩蕩的叢林裏行走。

吃的和喝的都沒有什麼花樣。和西貢街上鱗次櫛比的小攤商店和餐館無法相比。那裏有鴨鵝烤魷魚熏鰻魚和種類繁多的魚。和伊蓮後院裏長的酸蘋果和又硬又綠的梨子相比，椰汁點心，瓊脂果凍和鮮美的熱帶水果都那麼好吃。讓我高興的祇是那些令人失望的酸味。伊蓮阿姨將水果用濃糖一起煮，然後給我和蛋奶沙

司一起吃。這和父親晚上帶我出去時給我買的精致的雞蛋羹迥然不同。這祇是沒有一點蛋味的濃濃而帶甜味的黃色混合物而已。

因為食物和水的改變，我全身長滿了蕁麻疹。我用爐甘石洗劑擦全身。

假如不是因為每天到牧場去為灰母馬割草，喂它并撫摸它，我真不想留下來。

這裏的牛狗和貓祇是以動物來對待，而不是寵物來飼養。他們在馴馬的時候，甚至連杰克對他的狗和貓一點都不在乎，有時候還會詛咒或踢它們，然後衝着我眨眨眼，想表示他們是強悍的大男人。

日復一日，杰克煮着同樣的餡餅來喂他們。

在西貢時，我用吃剩的食物來喂我的狗，裏面經常有不同的飯湯，還有讓它們啃的骨頭。Kiki(小狗名字)和它兩個孩子對我們很親，在戰爭年代，父親把他們送給了鄰居，它們居然走了好長的路到鄉村找到我們。父親深受感動而從此不再讓任何人看顧我們的狗。

很快我發現澳大利亞人很自私，祇知道自顧自。

每逢星期日，他們給我看周日報刊中的漫畫，我模仿米老鼠和唐老鴨說話來讓每個人開心。

我拿到了學校制服，是深藍的摺裙搭配了西裝上衣，還有一頂圓帽子，上面都鑲有校徽，伊蓮經常給我買不同尺碼的衣服，讓我長大了還可以穿。這使得我看上去怪怪的，好像穿了別人的衣服。但我很感謝這套制服，這意味着我不必每天為了穿什麼衣服而煩惱了。

在家裏時我就穿馬褲，騎馬長靴子，一件開領襯衫或是一件羊毛衣。杰克給我一根馬鞭，有時候我就在大院子裏騎一匹很乖的小馬。我在學騎馬的基本要點，小跑和慢跑。但我不敢逾越，擔心我會受傷的恐懼在澳大利亞人的安靜表情中強烈地表現了出來。

我發現從某種程度上聽不懂周圍的人所說的話，食物味道如何，或者是我穿的衣服樣式怎麼樣，或者是我感覺如何都不那麼重要，特別是當我無法用他們的語言去向他們表達時。

### (悉尼天主教中學校舍)

我是在位於藍德維克 (Randwick) 的布立甘丁修道院 (Brigandine Convent) 裏讀五年級，那是一個建在山頂上氣勢宏偉的建築群還有一座禮拜堂。那裏有一條很長的車道和訪客門廳，裏面有一架三角鋼琴，還有巨大的耶穌，聖母瑪利亞和幾個聖人的雕塑和畫像。打了臘的木地板光潔得一塵不染。修女們總是把頭髮緊緊地包在帽子裏，兩祇手藏在長袍中像滑行一樣地輕輕地行走。學生們在學校裏要安靜地蹣跚着腳走，即便在上午茶，午餐和下午茶期間以及就寢前我們是不允許大聲說話的。雖然我們被允許和其他女孩子一起跳舞，同時一年有一次的學校舞會，邀請從

維佛力 (Waverly) 天主教男校的學生共舞，平時是不允許手牽手或是任何形式的身體接觸。

我們是不準有任何約會，也沒有機會去認識男孩子。我們這些寄宿生的每天每一刻都被安排好。上午六時三十分起床鈴叫醒我們去望彌撒，在跪着做完早晨祈禱後，即到簾子隔着的小房間裏洗臉，裏面有一祇放冷水的小洗臉盆，同時我們要安靜地穿衣服。一直等到另外一個鈴響後，我們就兩人一排到樓下禮拜堂裏望彌撒。然後排隊回到宿舍將床鋪好，把洗臉盆裏的水換好，當另一個鈴聲響時，我們就排隊下樓到飯廳吃早餐。包含有茶，面包和牛油，還有果醬，蔬菜醬或是花生醬，到了星期天就加一片冷肉。早餐後有一個小時自由時間，對我來說這是我練鋼琴的時間。在上午茶時我們分到一塊蛋糕，午餐時候又是面包牛油還有罐裝意大利面條，或是煮過頭的蔬菜和炖肉，但在這中間我們可以用零花錢買棒棒糖或其他小食部食品。我最喜歡的小吃是把烤豆子放在烤面包皮上，那比三明治要便宜得多，我在西貢吃慣了法國脆皮面包，而澳大利亞人却把面包脆皮扔掉。

待續……

郭美貞的自傳到這裏嘎然中斷，給人無限遺憾。原文是英語，從內容來看，應該是初稿，她祇是將童年故事想到那裏就寫到那裏，先點點滴滴地記錄下來，沒有任何的修飾或生活次序的安排。因為她的去世，也爲了尊重美貞

對她童年的真實自我表白，我在翻譯的時候保持了它的原來面貌沒有作任何的修改，祇是逐字忠實地記錄下來。作為她的故友，我將為她做接力撰寫，但我沒有把握是否能用自己的拙劣文字完整地去形容描寫她真實的一面，祇能盡我所能力求完整。

## 她的音乐萌芽

美貞在離開臺灣之前，曾作過一段口述她的經歷，連續三天在臺北中央日報中央副刊刊載（1980年1月3日至5日第四版），她在這題為“放下指揮棒嗎？”一文中對自己開始進入音樂世界的歷程有着詳細的敘述。中學畢業後，她得到悉尼音樂學院入學許可，原本一心想做鋼琴家，所以進入音樂學院後，她選擇主修鋼琴兼習作曲，但後來漸漸對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豎琴，雙簧管，長笛，三角鐵等樂器產生了興趣，甚至對指揮也發生興趣，於是在校時經常擔任同學樂團和合唱團指揮。

澳大利亞悉尼音樂學院創辦過程給這所南半球的最高音樂學府留下極富戲劇性的歷史。當時的英國總督麥魁爾 (Macquarie) 下令，要英國流放到澳大利亞的囚犯佛蘭西斯。葛林威 (Francis Greenway) 為新建的總督府設計一座馬廐，採用傳統的哥德式建築造型，由于過分奢侈，遭到倫敦方面的批評。幾經周折這座馬廐最終在 1821 年落成，而總督府則在 1847 年才竣工。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爭議，這座氣派非凡的馬廐在 1912 年改為音樂學院，但當時也有人提出不同的建議，認為改為餐館更為合適，從而演變成‘奏鳴曲’和‘香腸’之間的爭論。直到 1915 年 5 月 6 日才正式被批准成立為音樂學院。

當美貞在這所地位崇高的音樂學院準備畢業考試的時候，從報章一則簡短的廣告中，得悉當地的悉尼交響樂團指揮尼古拉·馬可 (Nicolai Malko) 在招收弟，引起了她拜師入門的興趣。但廣告上說明馬可先生祇招收男學生，而美貞自幼養成的不屈服不妥協個性，以及她與生俱來的勇氣和信心，從而產生出來的真誠和執着，令她鼓起勇氣，給馬可先生寫了一封極其懇切的信作‘毛遂自薦，向國際聞名的音樂家說明自己的願望。從她的字裏行間，馬可先生被這個年僅二十歲，但充滿了活力，智慧和勇氣的中國女孩以及她向上的精神所感動，破例將美貞延攔到門下，成爲他三個弟子中唯一的一位女弟子。日後也證明她對這位老師不僅完成了她勤奮研習的諾言，而且成爲馬可先生最後生命中唯一一走上音樂指揮臺在奮鬥的徵程中走向成功的女弟子。其他兩位男性弟子最後都改了行。

悉尼交響樂團的發展是從 1919–1921 年，由比利時指揮亨利·佛布魯根(Henri Verbrugghen) 創辦的新南威爾斯音樂學院交響樂團 (Orchestra of the New South Wales Conservatorium) 開始。經過了當地人士的支持，第一個 ABC 悉尼交響樂團在 1932 年成立，當時規模較小，祇有 24 位音樂成員組成。1935 年發展有 45 位樂團團員，直至 1946 年才成爲擁有 82 位音樂成員的正規大型交響樂團，并在當年一月份演奏了第一場音樂會。

從 1947 年開始，樂團向歐洲邀請世界著名音樂家擔任該交響樂團指揮，首任指揮是來自挪威的尤金·古森 (Eugene Goossens)，他從 1947 年出任到 1956 年結束。他在

上任之後，就提出發展交響樂團和歌劇的呼吁，并為澳大利亞留下不朽名言：“音樂中心應該為交響樂團建一所大廳，為室內樂建一所小廳，為歌劇建一所美麗的家園”。今天悉尼歌劇院成為世界聞名的城市地標，也就是按照古森先生的建議而形成的。

因為古森爵士在 1957 年的突然離職，尼古拉·馬可接替了古森出任悉尼交響樂團的指揮，一直到 1961 年他病逝。

也是因緣際會，在馬可先生的教誨下，美貞的成績突飛猛進，也是她的自告奮勇和進取精神，給自己開創了學習音樂的道。馬可先生看到她的勤奮努力，讓她跟隨學習了三年，成為馬可先生離開俄羅斯之後，唯一受到如此長時間教誨的學生。然而就在這時，馬可先生驟然因病去世。美貞後來在她口述文章裏誠摯地表達：“師恩浩瀚，令我沒齒難忘，他那對藝術的真誠，他那追求完美的意志，以及他那天人合一的技巧，一直引導我向音樂的旅程踏實邁進。”

最令美貞終生難忘的是，馬可先生在 1961 年美貞還在求學時代，特地安排她登臺指揮悉尼交響樂團的機會，并且將他的指揮棒交給美貞來指揮演奏，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指揮該交響樂團的女指揮，那時她才二十歲。當地音樂評論家對美貞的勇氣和技巧給予了高度的贊賞。接着又和他老師同臺指揮了另五場音樂會，以及悉尼弦樂團的演奏。象徵着她人生音樂旅途中的重要起步。

在以後的歲月裏，每當提起馬可先生時，她總會說：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給了我第一次在公眾面前指揮的機會。從他那裏我學會了不會因為自己年輕而需要辯護，不要因為自己不同性別而需要辯護。馬可先生去世後，允許我使用他所有的樂譜，其中有不少珍貴的筆記。”

她在臺灣發展音樂事業的時候，每每談及這位恩師時必然會作出如下的謙卑感言：“我隨馬可先生苦學三年，他待我很好，視我如同掌上明珠。在漫長的三年裏，他從沒有責備過我，也從沒有讓我感到指揮交響樂團是件難事。他給了我指揮世界十大樂團之一的悉尼交響樂團的五次機會，讓我初嘗指揮的滋味，使我發現這才是我最喜歡的事業。如果我有什麼成就，應全部歸功於馬可先生。”

自馬可先生去世後，美貞教了三年音樂，積攢了一些錢，作為 1964 年去意大利西西裏島達奧明娜 (Taormina) 的盤纏，報名參加意大利指揮家卡洛·塞奇 (Carlo Zecchi) 和英國指揮家約翰·巴比洛利爵士 (Sir John Barbirolli 1899–1970) 共同組織的指揮進修班。共有三十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音樂家參加了這次培訓。

這兩位世界著名的指揮家選拔了包括美貞在內的八名青年學員，指揮西西裏交響樂團 (Sinfonica Siciliano)。聆聽了美貞的指揮，巴比洛利爵士日後曾發出贊嘆稱：

“我不僅對她的音樂知識和演奏藝術及技巧印象深刻，尤其是她指揮方面那自然的音樂天質確實是罕見的秉賦。她擁有在這領域裏任何方面成功的本質，和她駕馭樂團演奏自如的天資。我將會以最大的興趣來注意她未來的

事業。”

美貞因刻苦努力學習得到世界著名指揮的如此好評，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事實證明日後她在國際指揮上的成就，巴比洛利的預言一點沒有誇張。

因爲美貞在學習過程中的刻苦努力，并展現出她的音樂指揮潛力，於是兩位世界著名音樂家積極爲她建立并贏得國際音樂界的密切關係，還竭盡全力推薦她前往紐約參加美國密特羅波洛斯國際青年指揮比賽 (The Dimitri Mitropolous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於是美貞決定參加而飛赴紐約，經過激烈的競爭，在四十二人比賽中，美貞僅獲得第九名晉升入半決賽。但是給了她在國際競賽中綻露頭角的機會。

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比賽，是爲了紀念著名希臘音樂家密特洛波羅斯而舉辦的。密特羅波洛斯于 1896 年出生在希臘雅典，被公認爲二十世紀重要的音樂指揮家，作曲家和鋼琴家。他在童年的時候，幾乎每逢周末下午就在家裏舉辦音樂聚會。他先在雅典音樂學院學習，隨後前往布魯塞爾和柏林深造。追隨著名音樂家費魯西奧·布索尼學習指揮。

他於 1930 年首次在柏林愛樂交響樂團擔任鋼琴獨奏，同時用電風琴指揮全團，開現代音樂和交響樂在舞臺同時演奏并指揮的先河。

他在 1936 年前往美國，首次擔任波斯頓交響樂團指揮，從此留在美國，于 1946 年加入了美國國籍。從 1937 年到 1949 年他出任美國明裏阿波裏斯交響樂團 (Minneapolis)

Symphony Orchestra)的首席指揮，也是現在的明尼蘇達交響樂團 (Minneapolis Symphony Orchestra) 前身。

他在 1949 年和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建立了關係，從此在交響樂事業上登上巔峰。他在那裏一直工作到 1958 年，然後由著名國際指揮伯恩斯坦 (Leonard Bernstein) 接替。

除了在交響樂方面的成就外，他在歌劇方面也有輝煌的成就。從 1954 年到 1960 年他一直擔任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首席指揮。直至去世。

由於恩師馬可先生生前曾協助丹麥組建廣播交響樂團，並擔任指揮，而巴比洛利先生正是美國休斯頓交響樂團指揮，因為和這兩位前輩的師生關係，美貞于 1965 年 5 月參加了丹麥國際音樂指揮比賽，指揮丹麥廣播交響樂團，演奏西貝留斯作品第二交響曲，雖沒有獲獎，仍膺選為十大杰出指揮之一。

而在 1966 年 8 月受到臺北休斯頓友好城市委員會的邀請，于 8 月 6 日晚上在赫爾曼公園 (Hermann Park) 指揮夏季交響樂演奏，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指揮家指揮該交響樂團晚會演奏。

當地紀事報 (Houston Chronicle) 在 8 月 8 日刊登了音樂評論家喬治·紐 (George New) 的一篇報道中這樣寫道：

“……男指揮家在指揮台上已經不再享有專利。事實上，我們不必對海倫·郭出現在那些在她之前曾指揮過的休斯頓交響樂團來指揮一事上獻上殷勤。...可以確定的是有些聽眾之所以會出席，只是抱着好奇心一睹一個不同性別

的指揮家。而唯一的新鮮事就是她用優美的方式使樂團演奏出  
靈敏而富有感情的音樂。”

(休斯敦交響樂團提供的圖片)

因為這次的成功指揮演出，她在 1967 年再次受邀到美國休斯頓參加由紀事報主辦的慈善交響樂團演奏大會。她和恩師世界權威音樂指揮巴比洛裏及卜萊文(Andre Privin)同臺擔任指揮，使她再次得到機會一展她的才華。

因為在丹麥的演奏會上沒有獲獎，她自認必須繼續刻苦修煉，所以在回到羅馬後，立即轉往歷史古城西艾娜(Siena)，考進了當代大指揮家修登的指揮研究班，接受了為期一個月的訓練，然後回到羅馬，準備報考世界聞名的聖齊芝麗亞音樂學院(Conservatorio di Santa Cecilia)深造，她居住在當時旅居羅馬的男高音伍伯就先生寓所，也和伍教授女兒結成親如姐妹般的友情。

美貞整個夏天就和伍伯就教授的女兒一起，還結伴到意大利北部著名避暑勝地卡爾達湖(Lago Garda)度假。我和伍教授的女兒組織了家庭後，她經常提起在湖邊和美貞一起度假的那段時光，美貞幾乎是每天清晨四點起床，拿着小錄音機或者小唱機和一根棒子，在湖邊隨着錄音機或唱片裏的音樂舞着手中的棒子。據美貞的解釋是，聽錄音機或唱片裏是最好的自我鍛煉，不僅熟悉樂曲，更重要的是

分辨每一個音符的細膩之處，訓練自己的聽覺。所以妻子一直讚賞美貞的成功絕對不是偶然的，也是每次她站在臺上指揮時，即便某一個樂團成員在演奏時的細小失誤，美貞都能敏銳地聽出而立即給以糾正。

在伍教授女兒的介紹下，我有機會認識了美貞。記得我們初次見面時，她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從她的氣質和眼神中，透視出她的音樂才華，我感受到那將是可以徵服未來世界樂壇的女指揮，也將是中華民族的一朵奇葩。從交談中理解到她對自己音樂前途有些彷徨，儘管她從求學時代就幸運地遇到世界著名音樂家，而且能以學生身份就登上舞臺指揮國際交響樂團，這祇能被看成是漫長音樂生命中的曇花一現，不能為此而沾沾自喜。

何況自己終究是個帶有亞洲血統的女性指揮，從事着一直被認為是男性獨有的職業。無論在音樂指揮上能獲得多少掌聲，作為女性，如何從男性指揮為主體的國際交響樂團中能占一席之地，是個非常艱巨的挑戰。也因此作為女性指揮，要真能出人頭地，必然要比男性指揮付出更艱辛的磨練。這所謂的磨練不僅僅是爭取音樂指揮上的成就，更為艱難的是消除社會上的歧視並最終得到認同。雖然她出生在越南，在澳大利亞求學成長，但在當地“白人政策”高壓下，具有亞洲人背景的美貞，如要代表澳大利亞去參加任何的國際比賽，勢必要低聲下氣去求索，還不一定能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還不如先代表自己的國家更能體現自尊。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分裂狀態，大陸給予外界的是充滿神秘感的完全隔絕。臺灣對外的宣傳是樹立‘自由中國’的形象，是一座太平洋上的燈塔。也因此在海外，來自臺灣的留學生就成了自由民主的鬥士，而港澳的留學生則是頭戴英國和葡萄牙殖民光環的高等華人。彼此之間的摩擦和相互排斥也就不言而喻了。

因為美貞有越南華僑的背景，在那充滿是非的環境裏發展，精神上的壓力可以想像。也許前往臺灣是唯一的選擇，也是她能一遂為‘祖國’爭光的心願，這是她自童年從家庭中得到的熏陶和教育，雖然身在海外，却不要忘掉自己的祖先。但實際上那時候臺灣內部也是處於風雨飄搖中，美貞是否能在這裏尋找到她的音樂立足點，道路上充滿着荆棘和障礙是可以遇見的。

## 台灣 —— 她心中的向往

她在音樂上的追求需要外界的力量來推動，為她創造發展未來的機遇，引領她走向成功，在中華民族音樂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頁。從我認識她的那一刻，以及在海外多年的生活經驗，潛意識中就感受到她若要在海外綻放異彩的光芒，就必須先在自己的國家打下堅實的基礎。沒有自己國家社會的支撐，無論付出多少代價，其結果必然是事倍功半。

但那時候我自己還在異鄉孤軍奮鬥，想為她去臺灣助一臂之力無異是個非分之想。而要促成美貞前往臺灣，就必須依靠大使館的協助。當時駐意大利大使于竣吉是先伯父劉師舜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同學，又是外交界同事。在梵蒂岡工作期間和于大使建立了密切交往。主意打定，我就直接去大使館找到大使並說明來意，是否能請于大使通過外交渠道協助美貞到臺灣發展。

我在 1963 年從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到了羅馬，感恩自于斌總主教的安排。也是在于斌總主教的協助下，圓了我在馬德里大學求學的夢。1962 年于斌總主教還是以南京區總主教的身份到馬德里訪問。我去他下榻的酒店拜見，他談及梵蒂岡正在舉行第二次大公會議，是教宗約翰 23 世創議舉辦的，會期為四年，大會新聞辦公室原來沒有中文組，

經過于斌總主教的力爭，在會期中期增設了中文部門，他問我是否願意去那裏工作。當事我正對自己前途彷徨無依，和于斌總主教的一席談，讓我感到渺茫的前途露出了一線曙光。當然我沒有絲毫的猶豫就答應下來了。

結束了梵蒂岡的新聞工作後，我原本計劃前往德國繼續文學研究工作，而于竣吉大使在沒有告訴我的前題下，為我爭取到意大利政府的獎學金，給我創造了在羅馬大學研究宗教考古的機會，這一安排讓我在日後的教學工作中獲益匪淺。

此時正好于斌總主教抵達羅馬出席教廷會議，在拜見了于大使後，我又前往于總主教下榻的酒店，說明我有意將美貞推薦到臺灣去發展的原委。果不出我所料，我的游說得到兩位長輩的積極支持，而且願意盡一切可能促成美貞的臺灣之行。

為此我在 1965 年 11 月 6 日晚上，請于大使和于總主教在我家小聚。我親自下廚為兩位長輩做了幾道小菜。兩位長輩雖位居要職，却没有嫌棄我那陳設極其簡陋的寒捨，兩位長輩興致勃勃毫無拘束地在餐桌上討論如何安排美貞前往臺灣，他們都一致認為這是為臺灣吸引海外音樂人才的好事，于總主教拜托于大使通過使館的渠道為美貞創造機會，而于大使也向于總主教允諾，盡力為美貞在臺灣鋪陳發展的道路。我們一直聊到近半夜，那一夜我興奮得幾乎徹夜未眠，因為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協助他人發展事業的探索，更令我欣慰的是，正如我的預期，美貞在臺灣音樂界獲得了積極的認同。

這件事我始終沒有向美貞提過，正如我協助其他年輕人一樣，都是感恩和懷念于竣吉大使和于斌總主教對我的栽培，而希望將兩位長者在培養人才方面的高風亮節精神如薪火般相傳下去。所以一直到美貞去世，她始終不知到是我給她打開了一個通道。其實理由很簡單，我為她所做的祇不過是向兩位長者提出建議，僅此而已，沒有必要去自我標榜。她日後的造就還是依靠她自己的刻苦奮鬥而獲得的，她的成功也因此成為世界音樂界以及人類所共有的一份財富。

事後證明，美貞在臺灣的發展是我所有協助過的諸多人物中，唯一成為真正跨國際的音樂指揮，而且是國際音樂界中鶴立雞群的女性指揮家，應該是全中華兒女值得驕傲自豪的象徵。

就在我于大使及于斌總主教商談如何協助美貞去臺灣的計劃是時，她和于大使之間還曾產生過些微誤解。她在“放下指揮棒嗎？”一文中曾坦率地描述她對於大使的不滿，是因為她以為于大使有徇私之嫌，將意大利政府的獎學金給了他的朋友，而美貞計劃申請却未能如願。

實際上作為一個音樂指揮，對當時臺灣在外交上的窘境全然不知。為了鞏固和意大利之間脆弱的外交關係，于大使幾乎每天絞盡腦汁，想方設法如走鋼絲般地密切注視國際關係的發展。因為我和于大使過從甚密，所以對他的苦衷知之甚詳。臺灣外交部對駐意大利大使館的經費控制極嚴，肇因于羅馬有人向臺灣反應于大使出手闊卓浪費公款，實際上在經費窘迫的條件下，為了鞏固和意大利的外

交關係，于大使連宴請意大利官方人士的費用都没有着落，因此在當地一家名叫‘中華園’的中餐館主人支持下，于大使在該餐館宴請意大利人士的費用，都是以簽單賒賬進行。于大使在臺北去世後，他兒子從美國到羅馬整理父親的遺物，打開于大使的保險箱，發現其中沒有絲毫有價值證券或現金，留下的是一大疊賬單，其中包括在‘中華園’賒欠的一堆賬單，目睹這些遺物令人鼻酸。

爲了報答這位餐館主人對他艱巨的外交工作上所給予的支持，于大使爲他夫人申請了意大利政府的獎學金，在不知實情的現狀下，引起了美貞的抗議。這祇是個題外話，因爲美貞對他的不了解而有所誤會，才略提一筆。實際上在我向于大使和于總主教提到她後，兩位前輩沒有絲毫的保留，全力以赴支持她去臺灣發展。

當時大使館正在組織一個意大利經貿代表團訪問臺灣，出發日期是十一月十二日，于大使在我家晚餐後，想方設法思忖如何能讓美貞作爲訪問團一員順利前往臺灣訪問，但訪問團已經組織完畢，而且出發在即，無法再增減訪問團的成員。也是事有湊巧，于大使正苦無計可施之時，就在出發的前一天，一位意大利團員因臨時有事無法成行，于大使立即在十一日要他的秘書麗莉安妮 (Lilliani) 打電話給美貞，請她到大使館和于大使共進晚餐。在席上于大使請美貞作爲訪問團的一員去臺灣訪問。足證于大使對美貞赴臺一事極其認真。那時候美貞正在申請羅馬聖齊芝麗亞音樂學院，而且入學考試時間就在訪問團出發的同一天。

然而于大使在餐桌上，說了一段令她動容而無法拒絕的話，他說：“聖齊芝麗亞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每年都會舉辦，而去臺灣的機會就祇有這一次，稍縱即逝，訪問團正巧有一位意大利團員因事不能去，騰出了空額，你應該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

美貞被說服了，主要原因還不僅僅是可以到臺灣去發展她的音樂事業，甚至還能夠在那裏一遂她夢寐以求發展培養兒童音樂人才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音樂家，她希望能代表中國而引以為榮。在這方面不論生活了多少代的海外華僑，都有相同的心願，尤其是東南亞華僑，對故鄉的傳統情結極其深厚，美貞自幼在父母家庭的熏陶下，尤其是他舅父給她灌輸對中國的認知，一直影響着她的思維，對於作為中國人的理念深深扎根在她的腦海中。

自從童年時隨母親移居到澳大利亞後，學習成績優越，音樂上也有了一定的根基，而生活的環境也很優厚。但處在白人政策下，有色人種無論如何優秀，也必須忍受被歧視的困擾。她曾經向澳大利亞有關部門提出幫助，即便她長期居住在澳大利亞，也無法避免遭到拒絕的厄運，理由祇因為她是有色民族。所以她參加國際比賽也好，出席國際會議也好，她總以能代表“中華民國”而引以為豪。

就是在這樣的思維驅動下，她接受了于大使的邀請，并在僅有的一天時間裏，大使館協助她辦妥了入臺手續，將自己需要的物品塞進了皮箱，就這樣匆匆地隨着代表團

去了臺灣。

當于大使秘書麗莉安妮告訴我美貞和于大使一行上了飛機後，我私下爲她高興，而且第六感告訴我，她的成就名震中外將指日可待。我默默地爲她祝禱，并分別向臺灣的好友寫信，請他們在可能範圍內，給美貞提供一切可能的幫助。

## 台灣——她心目中曾經的“祖國”

從美貞抵達臺灣後，她一直在所有的活動中很低調，但不久即因為她的音樂才華就風靡了臺北。意大利訪問團中有幾位意大利音樂家和旅居當地的華人音樂界人士同行，早在出發前就已經排定了在臺灣的公開音樂會，唯獨美貞因為最後一分鐘的加入，所以她在臺灣的活動還一時無法確定。

訪問團最初是安排在臺北圓山大飯店，因為地理位置所限，她感覺很不方便，語言上又有隔閡，和當地人士溝通更是困難重重。後來訪問團搬遷到中山北路的國賓大飯店，才給美貞提供了和外界接觸的機會。晚上她就偕同伍伯就教授的女兒到飯店後面的小巷裏去體驗當地的生活。

因為曾接受過幾位國際知名老師的熏陶影響，她更喜歡了解有關兒童音樂學習的內容。在這一次的臺灣之行中，他認識了當地企業家辜偉甫，他安排美貞參觀了榮星合唱團，指揮是臺灣的名指揮呂泉生先生。在淡水河邊一座不起眼的老屋子裏，她聽到了如同來自天籟的童音，讓她對臺灣開發兒童音樂的未來深具信心并充滿了憧憬。

十一月十二日是孫中山先生誕生百年紀念，臺灣對孫中山先生尊稱為國父，每年此時必定要舉行各種不同的紀念活動，來表達對這位推翻滿清，創建共和的偉大歷史人物。而美貞訪問臺灣時，恰逢國父孫中山誕生百年紀念，

國防部政工幹校定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山堂舉行一場音樂會，作為紀念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的慶祝活動。

國防部示範樂隊的隊長兼指揮樊燮華上校得悉美貞訪問臺北，特地邀請美貞和他擔任是晚演出指揮，她欣然接受并和他合作分擔指揮上下場。雖然部隊裏的管樂隊不適合演奏交響樂，但美貞仍然愉快地完成了任務。她指揮了貝多芬的“愛格蒙特序曲”，莫扎特的“魔曲”和韋伯的“奧勃隆序曲”。這是她在臺灣的首次公開指揮，并從此打開了她在臺灣的音樂之門。

她在演出結束回到後臺時，收到父親從西貢寄來的信，無異是對她訪問臺灣指揮了第一場音樂會的鼓勵。她興奮而迫不及待地拆開信封，一面向周圍的人說：“在中國同胞面前演出，是最高興的事，我期待這麼久了，就樂隊和我兩方面來說，我覺得這是第一次的祖國演出，成績還不錯。”

在這之前，美貞在十六日拜訪了臺灣省交響樂團團長戴粹倫先生，雙方商定在二十七日晚上，請美貞在臺北國際學捨以客座指揮身份，為該團指揮是晚的演奏。曲目是孟德爾鬆的“E小調小提琴協和奏曲”，由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奧列夫斯基擔任獨奏，交響樂團伴奏。另外還有海頓的“倫敦交響曲”和貝多芬的“愛格蒙特序曲”，這場音樂會原本由戴粹倫指揮，但他改請美貞出場。

在那個時代，臺灣的文化建設較比落後，整個臺北唯一能安排演出的場所就是日本人殖民時代留下的中山堂，但該場所沒有音樂共鳴，對大型交響樂團演出效果有一定

的缺陷。臺灣省交響樂團演奏場地“國際學捨”實際上是一個室內體育場，無論在音響和燈光的配備，都無法舉行高水平的交響樂演奏。但是在那個環境下，一切也祇能因陋就簡了，但美貞並沒有嫌棄這座令音樂家尷尬的場地。將她指揮的才能認真并毫無保留地展現在她心目中的‘同胞’面前，她後來在十二月七日舉行的座談會上，很誠懇地表達她的看法，她說在臺北的幾個樂團中，發現有很多可資造就的音樂人才，并對他們在簡陋的設備和環境下仍能努力學習，使她深深欽佩這些年輕人的‘忍耐力’，她還強調，必須人需要音樂，音樂才有前途。

在臺灣逗留期間，指揮交響樂團固然是她的願望，但更讓她關心的是對青少年的音樂教育。這都應歸功于她母親對她在音樂道路上所給予的啓蒙，後來她的幾位老師都是享譽國際的音樂家，但他們在音樂事業之際始終不懈地為有志於音樂事業的青年提供傳授音樂的機會。

她在臺北期間曾得到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科主任申學庸的邀請，在該校教授管弦樂課，指導學生學習演奏莫扎特的“K 5 5 0 第四十號G小調交響曲”。除此之外，她還在臺北開設短期指揮講習班，講授指揮常識和樂曲分析。

臺南有一個三B兒童管弦樂團，其中有一部分孩子的父母得悉美貞在臺北訪問的信息，幾次專程到臺北要求美貞到臺南指導孩子們。因為他們的真誠使美貞感動而對團長楊麗雲女士說，祇要她到臺灣來，一定會去臺南給孩子們適當訓練。她沒有食言，在以後的日子裏，每逢她到臺灣訪問，必定會安排試講到臺南給孩子們上課。

臺灣省交響樂團和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分別聘請美貞擔任他們的客座指揮。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團長為鄧昌國先生，他夫人藤田梓是日本籍的鋼琴家，該團在 1966 年 1 月 30 日在臺北國際學捨舉行的第二次音樂會，原本由鄧昌國先生親自指揮，後來請美貞出場，鄧昌國先生則擔任第一小提琴手。當晚的節目包括有貝多芬的“柯裏奧蘭序曲”和“第四交響曲”及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

在臺灣方面文化活動的低靡環境裏，美貞的到訪掀起了一陣對音樂的追捧。整個社會突然發現，臺灣真的需要美貞這樣具備國際地位的音樂家來整合臺灣音樂的蘇醒。教育部為酬謝美貞對臺灣音樂教育的奉獻，特地在 1965 年 12 月 15 日下午四點由時任教育部長的閻振興先生為美貞舉行頒獎典禮，臺灣音樂界人士出席，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于斌總主教不僅親自出席，還在會上致詞，足證于斌對美貞的關懷和期望。閻振興部長親自為美貞頒發了金質獎章和獎詞，內容為：

“郭美贞女士，广东中山县人，现年廿五岁，奕叶承华，侨居澳洲，英年挺秀，遊学欧洲，宫商精引，弥勤钻研之功。吕律克谐，尤能指挥之妙。去年参加国际青年指挥比赛，深为外邦人士所许，天才横溢，良属难能，用以颁授艺术奖章，以资鼓励。”

([奖词远文图片](#)) ([閻振興部長頒獎及于斌總主教講話圖片](#))

我和妻子在 2014 年 3 月到堪培拉美貞弟弟家，在她的遺物中看到這枚仍閃着光亮的獎章，和稍帶黃色的獎詞，

不僅反映了時間的消失，更令我感觸的是一代光芒灑遍地球上五大洲的女指揮家，就這樣靜悄悄的離我們而去。

郭美貞在 1966 年榮膺為臺灣十大杰出女青年。這是臺北的中華日報和扶輪社聯合主辦的第一屆杰出女青年活動。于 2 月 23 日在臺北的國賓飯店舉行頒授金手獎典禮，由當時的行政院長嚴家淦先生出席致詞，因為他是扶輪社在臺灣成立時第一屆社長，所以他是以榮譽社員身份出席，頒獎則有他夫人主持。

在這十位杰出女青年中，有後來擔任救國團主任的李鐘桂女士，和曾在國際奧運會中獲得全能銀牌的運動員紀政等女士。由于美貞正在韓國首都漢城（現改名為首爾）指揮當地交響樂團，所以沒有親自出席這一頒獎典禮，而由當時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高信夫人代表郭美貞領取了這份殊榮。

#### (十大女青年頒獎圖片)

她之所以能被選上十大女青年之一，得力于她在國內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指揮家，也是國際上屈指可數的年輕女指揮家，音樂天才橫溢，而且對臺灣的音樂教學啓示很大。

自此之後，美貞開始了她在國際上的演奏生涯，當她再次踏上臺灣時，和她首次訪問之間已經相隔一年多，也

是她在紐約獲得國際最重要的米特羅波洛斯國際青年指揮比賽金獎後。她和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再度合作，但仍然是以客座指揮身份為該團指揮兩場，分別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和六日在中山堂舉行，首先是羅西尼的“塞維亞理發師序曲”，接着是蕭邦作品“鋼琴協奏曲 E 小調作品第十一號”，由藤田梓擔任鋼琴獨奏，最後是貝多芬的“交響曲第一號 C 大調作品第二十一號”，臺灣著名小提琴家司徒興城擔任第一小提琴手。

在音樂會中，有一首意義特殊的作品，是美國作曲家魏德為紀念已故韓戰中犧牲的戰士張壽哲而寫出的作品“烈士”中的一段。在魏德得知美貞赴臺指揮時，特地委托她將這首作品帶到臺灣，希望能在臺灣作首場演出，而美貞完成了友人的寄托。

雖然美貞在國際音樂界中享受着日正當中的榮譽，但她始終沒有忘記對臺灣兒童音樂培養的諾言。就在她前往日本前，美貞為臺南的三 B 兒童管弦樂團，在 1967 年 8 月 8 日晚上在臺北國軍文藝活動中心，指揮了一場極富人情味的音樂會。她為兒童們選擇了韓德爾的“摩瑞特風笛”，莫扎特的“D 小調鋼琴協奏曲”，由高國香擔任鋼琴獨奏，還有海頓的“玩具交響曲”，以及莫扎特的（小夜曲）等曲目。

### (美貞指揮三 B 少年乐团演奏图片)

從 1965 年首次訪問臺灣後，在後來的五年中，幾乎每年夏天都要回到臺灣，特地去臺南看望那些可愛的孩子。

她竭誠心意地希望能給這些具備天賦的孩子給以適當的培養。1968年8月結束了菲律賓行程後，她立即飛往臺灣，在臺北拜會嚴家淦副總統，文化局長王洪鈞等官員後，就前往臺南培訓三 B 兒童交響樂團的孩子，並且在臺北，高雄和臺南分別舉行了四場音樂會，給孩子們編排了精彩的節目，包括有莫扎特的“喜遊曲”；格裏克的“遲來的春天”；孟德爾鬆的“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和威爾第的“四季”。她強調為孩子們創造演出機會是最好的鼓勵。

那時候這三十多名兒童都年僅十歲左右，但他們却擁有不凡的演奏技巧，其中有好幾位經過美貞的精心培養，都有了長足進步，並遠赴海外深造脫穎而出，陸續成為臺灣音樂界中的佼佼者。

除了對孩子的培養外，美貞另一個心願就是在臺灣創辦音樂教育工作。她一直希望能建立一所音樂學校，來培養臺灣的音樂人才。然而經費和場地的提供都不是當時臺灣有關部門力能所及的。不過在 1970 年臺灣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的支持下提供場地和設備，使得美貞能有機會一展她的教育理念，在文化大學內創辦了華岡音樂訓練營。于 1970 年 7 月 25 日開課，8 月 15 日結業，當時有二百多名有志于音樂的青年報名參加。為此美貞特地分別從菲律賓，韓國，美國，瑞士，及香港等地聘請了音樂家在營地指導，其中以菲律賓力度最強，共派了五位音樂家支持美貞主持的音樂營。

## (华音乐夏令营说明书封面)

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還特地聘請美貞擔任中國文化學院樂團指揮，還給她安排宿舍和辦公室，並且說即使她不在臺灣，這些設備都為她保留，隨時回來使用。他希望美貞將臺灣當成自己的家。

這個在臺灣首創的音樂營，得到當時駐臺灣的美國，韓國及菲律賓大使以及亞洲基金會的支持，于斌樞機主教為這個夏令營和美貞寫了祝辭：

“望天主降福于你的工作，而使你的音樂蕩漾發揚于吾國同胞心中，願吾國之音樂家以美妙之旋律表達其對天主之讚美。”

從這祝辭中可以看出自 1965 年于斌在羅馬以總主教身份，開始支持美貞到臺灣發展，一直到 1970 年于斌以樞機主教地位，為美貞寫祝辭，足證他對美貞的關懷，愛護和期望。可以說于樞機主教給予的讚美和支持，對深為天主教徒的美貞，是她從教會中所獲得的最高榮譽。

承辦這樣的音樂營，最關鍵的是經費支持，雖然經過她的努力，和臺灣有關各方磋商，也得到張群，林語堂等政府民間人士支持，但是每在面對實際行動時却無法解決現實中的尷尬。美貞原本建議參加的學生交納部分費用，但考慮到學生的經濟負擔也就無法落實。所以華岡音樂營最後也祇能看成是曇花一現。縱然美貞對臺灣有千絲萬縷

的感情，縱然美貞將臺灣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祖國’，縱然美貞對臺灣有志于學習音樂的兒童寄以厚望，但在現實的經濟環境面前，這一切終究祇能看成是夢想。在美貞心靈深處永遠是個遺憾。不過在華岡音樂營結束前，美貞在萬般困難的情勢下，仍然在八月十三日和十四日兩天，組織了兩場華岡音樂營師生音樂會，給參與的學生和老師們同臺演出，給他們鼓勵和展現音樂才能提供了機會。

其實自第一次踏上臺灣的土地後，美貞固然想到有登臺指揮的願望，但主要目的是能夠為臺灣的音樂發展提供一些協助。尤其是對兒童音樂的培養。然而在每次的演出，臺灣並沒有為她提供屬於她自己的樂團，祇能以客座指揮的身份登臺。

那時候的臺灣音樂水平受到很多政治社會因素的限制，雖有一些有識之士不斷呼吁建議，音樂的發展始終處於隨時都會夭折的境地，無論是音樂場地或是樂團整體水平都有亟待提高的必要。可是在當時的環境中，一些音樂界人士的思維跳不出臺灣本土的自我滿足心態。而美貞在國際音樂界的地位，也無形中使他們下意識地感受到本身職位受到威脅的壓力和多慮。所以美貞心底的願望總會在有意或無意間被一層無法看到的阻力所困擾。

自從美貞在紐約獲得大獎成為國際著名女指揮家後，她穿梭在世界各地的舞臺上，指揮知名的交響樂團，享受着她前半生刻苦奮鬥所獲得的成果。但她從未忘記過而臺灣，從一開始接觸始終是孜孜不倦地盡其所能，為臺灣開拓國際空間，出席世界各地的活動。從她個人的角度分

析，為臺灣創造國際活動，目的祇是想通過音樂演出，給孩子們提供發揮才能的機會，與此同時，也讓臺灣的樂團能走出海島，能在國際舞臺上占一席之地。目的無他，歸根結底，這是對中華民族的關懷和維護民族尊嚴及榮譽所驅使的使命感。

在兩次的國際活動中，美貞都付出了不少心血，還要放棄自己在世界各地演奏指揮的個人利益，專心一致地將兩個活動進行得有聲有色。她把所有的榮耀都歸功于樂團中每一個孩子的努力。

那是她在馬尼拉指揮當地交響樂團演出後，和菲律賓總統夫人伊美爾黛·馬可仕會晤，總統夫人委托美貞在回臺灣的時候，將她的一封親筆信轉交給臺灣的教育部，內容是邀請美貞率領中華兒童交響樂團訪問馬尼拉，指揮馬尼拉交響樂團，作為總統夫人主持的文化中心落成典禮活動。

### (馬尼拉交響樂團演出照片)

另一個大型活動是代表中華民國，出席美國 1976 年的開國二百周年紀念活動。這是應教育部蔣彥士部長，國際

文教處鮑幼玉處長和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執行長李鐘桂等邀請，回臺灣組織一個少年管弦樂團，前往美國訪問。

和國立師範大學李淑德等教授合作，就在曾前往馬尼拉演出的前中華兒童交響樂團的團員中，甄選了三十名給予短期培訓，以“中華民國華美青少年管弦樂團”的名義于六月底到達美國，在兩個月的時間裏前往十八個州作巡回演出。

### （在美国演出图片）

美貞自幼年即非常獨立任性，這和她從童年開始在天主教學校接受教育，以及後來自己在外闖蕩辛勤奮鬥有着非常密切的關聯。由于她的音樂天賦，青年時代即在國際樂壇上暫露頭角，而且她的音樂道路一直不斷有國際音樂界著名指揮的賞識，也得到政府和教會的支持，可以說比許多和她同齡的音樂人士要順暢得多，更加深了她的任性。儘管如此她擁有一顆善良的心和天主教徒獨有的慈悲為懷的意境。

她這種個性在西方國家能獲得他人的認同和尊敬，因為她是自己從奮鬥中闖開的一片天地。然而在東方就很容易引起別人背後的議論甚至排斥。2014年9月24日在臺北輔仁大學舉行紀念郭美貞頒發獎學金的儀式中，救國團前

主任李鐘桂博士就在講話中舉了一個美貞鮮為人知的小故事。

那是在美國參加紀念開國二百周年活動時，舉行演奏會前，因為和一位樂團裏的成員有些爭議。美貞的任性就毫無掩飾地表現出來，她把指揮棒一摔，聲言不指揮了。加入她真的不走上臺，那就會造成非常尷尬的場面。當時李鐘桂博士在場，立即對美貞曉以厲害，說明這對中華民國會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美貞斟酌片刻，聽從了了博士的勸導，走上舞臺圓滿完成了那場音樂會。然而在社會上，又有幾個如李博士這樣德高望重善體人意，而能駕馭美貞的任性！

美貞的音樂指揮事業在 1976 年達到了顛峰，一年中，除了美國參加開國兩百周年活動巡回演出 20 場外，她在全球各地總共有五十場演奏的合同。而 10 月 4 日在華盛頓肯尼迪中心指揮華盛頓交響樂團的音樂會達到了巔峰。

## 国际桂冠决定她的一生

如果說 1964 年是美貞音樂事業的起始點，1967 年應該被認為是美貞從此踏入國際音樂樂壇節節攀升的重要轉折點。她在澳大利亞辛勤執教積攢了一些收入，作為前往意大利西西裏島達奧明納城（Taormina），參加塞奇和巴比洛利爵士合作主辦的音樂指揮培訓班，因為她的勤勞刻苦學習，同時在指揮西西裏交響樂團的時候，展現出她在音樂指揮上的杰出才華，除了獲得全額獎學金之外，塞奇和巴比洛利爵士還極力推薦她前往紐約參加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比賽。雖然她僅進入了半決賽，但給她提供了不少參加國際比賽的經驗。

也因為她在 1964 年學習時候的努力，她受邀于 1965 年到西西裏島的首府巴勒爾摩（Palermo），在“音樂之友”（Amici della Musica）指揮西西裏交響樂團。在老師鼓勵下決再度前往紐約，參加 1967 年的比賽。行前她曾經有一番內心的掙扎，擔心自己是否有足夠實力奪取這個聞名全球的國際音樂指揮大獎。經過反復斟酌，她終於下定決心前往參賽。

這個世界聞名的國際青年指揮比賽，是為紀念世界著名指揮家笛密特裏·密特羅波洛斯（Dimitri Mitropoulos 1896-1960）而舉辦的。他是美國籍希臘指揮家，作曲家和鋼琴家，出生于雅典，在布魯塞爾和柏林求學。是國際著

名音樂家布索尼 (Bosoni) 的學生。1921-1925 在柏林國家歌劇院艾裏希。克萊伯手下當助理指揮。

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比賽的參賽條件極為嚴格，一共有十二條規則，第一條規定參賽者年齡限制在 20 歲到 33 歲之間；第二條要求參賽者必須得到其具有公民資格的國家出具證明并給以支持，換言之參賽者必須代表其國家才能登上比賽殿堂。

這一條就是美貞是否決定參加比賽的最大糾結。她生活的澳大利亞一直施行“白人政策”，對有色人種成見很深。居住在當地的移民必需要連續生活十五年才有資格申請加入國籍。美貞離開澳大利亞前往美國參加第一次比賽時，祇有十四年零十個月的居住記錄，僅僅差兩個月，澳大利亞政府拒絕了美貞改變身份的申請。雖然澳大利亞政府願意她代表該國，因為公民資格的矛盾，使得美貞拒絕了澳大利亞政府的要求，而希望能以“中華民國”公民身份代表臺灣參加這個重要的國際比賽。

美貞一家雖然幾代人生活在越南，却一直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代表臺灣出賽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美貞倔強的個性再次展現出來，她主動寫信給教育部說明原委，要求允許她代表“中華民國”參加這個享有國際盛譽的國際音樂比賽。

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教育部遲遲不予答復。在情急之下，美貞直接向教育部撥通了長途電話，在電話中作了自我介紹，最後教育部給了個似是而非的答復，意思是所有中國人都可以代表國家，但政府不會特別指定她代表臺

灣參加這個比賽。但這並沒有挫折美貞對臺灣的嚮往和對當地孩子音樂教育培養的勇氣。

解決了代表參賽國的資格問題，其他的規則如需要國際知名音樂家的推薦信等等，美貞都不費吹灰之力就能順利解決。接下來她要解決另一個難題，那就是她需要自己負擔從居住地到紐約的往返旅費，抵達後，從一月六日到二十三日在當地的食宿費用則全部由紐約猶太人慈善聯合會 (Federation of Jewish Philanthropies) 負擔。

紐約猶太人慈善聯合會創立於 1917 年，是世界上猶太人最大的地方慈善組織，每年要撥出巨款支持分散在世界各地逾一百多個慈善機構。

有了第一次參加這個國際比賽並進入半決賽的經驗，美貞對這次參賽也有了更堅強的信心。

每個參加比賽者要通過初賽，復賽，半決賽和決賽四個階段，大會選擇了近三十位世界著名音樂作曲家的作品分成三組，由參賽者在每組中選擇三首作為參賽時指揮的樂曲。裁判員在其中挑選一首樂曲的部分或整首，由參賽者指揮。裁判也可能會臨時選擇一首不包括在這些樂曲之內的作品，要求參賽者即席指揮。

在半決賽時，所有參賽者必須從大會安排的三首作品中選擇一首來指揮。最後大會選擇一首新作品，讓參賽者和樂團在演奏前十分鐘進行簡短的排練，考驗參賽者對作品的領會和隨機應變的靈敏性。

大會為美貞指定的是美國作曲家柯布蘭 (Copland) 的作品，樂曲非常複雜，但是在她的指揮棒下，多彩多藝的燦

爛旋律，如行雲流水，揮灑自如，并且動作優美，具備權威氣派，獲得了由指揮家萊奧納多·伯恩斯坦 (Leonard Bertstein) 為首的九位裁判一致讚賞，最終奪得國際比賽金獎。

### (美贞获得的金牌正反面)

裁判員在這次的國際比賽中選出了四名參賽者同時名列榜首，除了美貞是唯一的一位亞洲女青年之外，其他三位都來自歐洲，他們是西德三十歲的阿羅易司·斯卜林格爾 (Alois Springer)，二十五歲的法國人保羅·卡波隆格 (Paul Capolongo 25 歲) 及三十三歲的西班牙參賽者加西亞·阿森西奧 (Garcia Ascensio 33 歲)。每人各獲得金獎牌一枚及現金五千元，對他們四位年輕音樂比賽得獎者的事業上最大的幫助，是每人都和紐約愛樂交響樂團或者和華盛頓國家交響樂團簽訂 1967-1968 音樂季節合同。

### (美贞和另外三位获奖者合影)

大會還設有第二名銀獎，獎金為二千五百美元，第三名銅獎，獎金一千美元，第四名銅獎，獎金七百五十美元。

四位獲得金獎者都有機會于 1967 年 1 月 23 日在紐約

四位獲得金獎者都有機會于 1967 年 1 月 23 日在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大廳裏舉辦的頒獎典禮中，出場指揮是晚的音樂演奏。晚會結束後，大會主席正式宣布三位獲得金獎者將在紐約交響樂團擔任助理指揮一年，另一位前往華盛頓國家交響樂團擔任助理指揮一年。美貞很榮幸地被留在紐約，擔任首席指揮伯恩斯坦的助理指揮。

**(美貞在卡奈基音乐厅前留影)**

紐約世界論壇報(World Journal Tribune) 在 1 月 20 日首先發布突出美貞獲獎的新聞。從 1 月 25 日開始自紐約到愛荷華小城，至少有四十家報刊，同時轉載了美聯社發布的新聞稿并配有美貞和紐約愛樂交響樂團首席指揮伯恩斯坦的合照。照片上顯示了美貞愉悅的燦爛笑容。美國新聞界為一位年輕外國指揮家發布全國新聞，用空前絕後來形容一點都不誇張。

**(美貞和伯恩斯坦合影) (当地报纸全文)**

美國休斯頓當地報刊在 2 月 4 日發表了對美貞在國際指揮賽中的脫穎而出給予了超越尋常的評價，形容她是“握着充滿活力指揮棒的女性”(The lady with fiery baton)。這句充滿贊揚的評語，後來被廣泛借用，但到了臺灣將美貞形容成“女暴君”。當然其中不乏背後因對美貞的成就而產生的嫉羨。

經過了近三周的艱苦競爭，1967 年的國際指揮比賽落下帷幕，美貞實現了她多年夢寐以求的願望，帶着這份榮譽開始了國際樂壇的生涯。

早在 1958 年，美貞在澳大利亞就曾在悉尼參加過一個為十八歲到二十八歲青年舉行的指揮比賽，她獲得勝利。那次的比賽者有來自西班牙、新西蘭和英國等國家四十餘名青年。

在 1965 年的春天，美貞以“中華民國”代表身份前往丹麥參加當地的一次國際比賽，她指揮了丹麥廣播交響樂團，演奏西貝留斯作品第二交響曲，獲得好評，雖然沒有入圍，而被膺選為十位杰出青年指揮之一。對美貞後來的音樂道路上增加了一道彩虹。

1967 年 2 月在國際音樂著名音樂家也是美貞的老師約翰·巴比洛利爵士協助下，她從紐約直接飛到休斯頓，和這位老師及另一位大指揮家安德裏·普雷溫 (Andre Privin) 分別指揮了休斯頓交響樂團，贏得了熱烈的喝彩。

(休斯頓交響樂團提供的圖片)

這些國際比賽給美貞累積了舞臺上指揮的經驗和膽量，而給她打開國際音樂職業大門的是當時美國最著名的音樂經紀人索爾。胡洛克 (Sol Hurok)。有了他的支持，美貞在國際音樂界的威望如虎添翼。

胡洛克原籍俄羅斯，于 1888 年出生在沙皇時代，全名為索羅門·伊沙勒維奇。胡洛克 (Solomon Isalevich Hurok)，1906 移居美國，1914 年加入美國國籍。

胡洛克在演藝界聲望甚高，通過他的宣傳和推動，許多國際舞臺表演者，音樂家等因此而成名。西班牙作曲家安德列·塞克維亞 (Andres Segovia)，波蘭鋼琴家阿塞。魯賓斯坦 (Arthur Rubnstein) 和美國小提琴家艾塞克。斯特恩 (Isaac Stern) 等，都是在他的策劃宣傳下得以名聞全球。

他在演藝圈裏最杰出的演出活動都是經過不懈努力和奮鬥而著有成效的。他喜歡接受挑戰，凡是他想完成的項目必定是鍥而不捨。其中包括經過三十五年的醞釀策劃，终于在 1959 年將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安排到美國作八周巡回公演。繼而在 1961 年蘇聯的基洛夫芭蕾舞團到美國公演。甚至在 1962 年正值古巴飛彈危機之時，他仍然順利安排了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到美國訪問演出。從這幾個文化活動的安排，可以看出胡洛克先生的膽識和才幹。

當然胡洛克先生的成功引起美國猶太人的不滿，一些極端組織在 1972 年曾前往他在紐約曼哈頓的辦公樓裏放置炸彈，企圖謀害他，結果是造成無辜人員傷亡，胡洛克也因此而受了傷。他在 1974 年因心臟病發在紐約去世。

美貞於 1967 年在紐約獲得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比賽金獎後，第二年年初即和胡洛克簽訂了合約，正式成爲美貞的經紀人。有趣的是胡洛克先生本人對音樂的理解非常有限，但他擁有天賦的敏銳第六感，他能肯定判斷出一個音樂家擁有特殊天分，值得他去策劃宣傳幫助走向成功。否則他絕對不會主動表達支持的。

他毫無猶疑地和美貞簽約，就是看準了她在音樂上的天賦，以及她在舞臺上淡定自如的指揮技巧，很多地方即便是男性指揮也難以具備，這些將是她通向成功道路最有力的條件。他爲美貞選擇的兩幅宣傳照片成爲後來幾乎世界各地采用的標準版本。圖片中的美貞聚精會神地指揮，表情中反映出美貞的全身投入，揮灑自如。

### (两图片)

從美貞獲得這個世界最重要的金獎後，世界各地一直宣揚她是第一個獲得這個獎項的女性。實際上這是個誤傳。就在前一年，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獎的桂冠被 1937 年在瑞士出生的女指揮家西爾維亞·卡杜芙 (Sylvia Caduff) 奪得。

美貞之所以被譽爲國際杰出女指揮家，甚至被公認爲是第一個奪得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獎的女性，可以說是

第一位亞裔女性獲得這項殊榮，也因為她的個性，技巧和勇氣，她能衝破社會上對女人不能擔任指揮的傳統態度，讓紐約人士對她刮目相看而是永遠銘記在心的。

事實上，女性在音樂界的地位一直受到挑戰和歧視。在男人的心目中，女人應以家庭為主，而且因為女性的纖細嬌弱，很難掌控以男性為主的舞臺。然而從歷史的角度看，女性在音樂界裏的奮鬥是一直存在的。

公元二世紀，在古羅馬時代，天主教裏一位殉難的女性，切齊麗亞，後來得到教廷公議宣布為音樂守護神，成為教廷中少數的女性聖人之一，被尊稱為聖·切齊麗亞(Santa Cecilia)。

根據歷史記載，公元 1570 年在諾曼迪的艾佛挪(Evreux)舉行了有史以來第一場紀念這位女聖人的音樂會，到 1585 年羅馬創立了以聖·切齊麗亞命名至今為止最古老的音樂學院，開創了女性在音樂界裏的歷史地位。

女性在歐洲積極參與音樂的活動，德國鋼琴家克拉娜·修曼(Clara Schumann 1819-1896)不愧為先驅者。她一生和丈夫羅勃特·修曼(Robert Schumann)攜手為音樂奮鬥，六十一年來，她既要挑起撫養八個孩子的重擔，還不間斷地舉行音樂會來維持家計。她鼓勵著名作曲家約翰·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創作，是第一個為公眾演奏勃拉姆斯作品的女鋼琴家。因為她的創作音樂，曾留下這樣的名言：

“没有任何的東西能超越創作的愉悅。當一個人生活在聲音的世界裏時，就能得到些許時間的忘我。”

(...There is nothing that surpasses the joy of creation.

If only because through it one wins hours of self-forgetful

ness when one lives in a world of sound”

修曼給後來的女性在音樂界裏奮鬥旅程上，給予了難以估計的鼓勵。而在十八世紀，意大利威尼斯出現了一個以受過音樂教育的孤兒組成的女子樂團。

到 1867 年維也納音樂女指揮約瑟芬·維恩莉奇 (Josephine Weimlich) 創辦了女子交響樂團，然而在音樂廳裏，聽眾祇是用輕挑的態度去看待女音樂家的儀態風姿，却不去理解她們在音樂上的造詣。

雖然在美國女指揮家有蓬勃的發展，但也是經過女性的不懈爭取。第一位出現在指揮臺上的是卡洛琳·B·尼可 (Caroline B·Nichols 1864-1939) 她擔任波斯頓在 1888 年創立的法德特女子交響樂團指揮。

繼而從 1926 到 1932 年，美國波斯頓，芝加哥和紐約等城市先後組成了女子交響樂團，擔任這幾個交響樂團的女指揮是來自英國的艾賽爾·樂琴斯卡 (Ethel Leginska 1886-1970)，成為第一位站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 指揮臺上的女指揮家。

此後女性在音樂舞臺上指揮樂團風起雲湧，歷史在轉變，漸漸地美國音樂界素以男性為主的指揮臺上，女指揮家的身影不斷出現，為自己爭得一席之地，但仍然避免不了男性給予的歧視，并用各種不同的理由為借口給女指揮

家設置種種障礙，即使在素以民主自由為標榜的美國，大男人主義仍然在音樂圈裏盛行。

一直到二十世紀，在幾位有遠見的音樂家努力下，女指揮在樂壇的地位漸露曙光。雷奧納多·伯恩斯坦在這方面功不可沒，他在培養青年指揮時沒有設置任何的性別歧視。

從 1958 年到 1972 年，他始終如一地舉行青年音樂會 (Young People's Concert)。第一場于 1958 年 1 月 18 日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舉行，并由哥倫比亞電視廣播公司(CBS)實況轉播。到 1962 年這個有影響力的音樂會轉到林肯中心演奏，繼續由 CBS 電視擔任轉播，同時向全球四十個國家出售播出版權。伯恩斯坦一共指揮了五十三場。他在 1969 年從音樂總監位置上卸任，但仍然以名譽指揮身份指揮到 1972 年結束。

通過這個持續有近十四年的青年音樂會，伯恩斯坦為音樂界培植了無數有才華有能力的青年指揮家，使得國際樂壇上的指揮人才輩出。美貞在 1967 年贏得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比賽金獎後，也被伯恩斯坦延攔為助理指揮，同時給予了機會參加到青年音樂會陣營中。至今在紐約發行的伯恩斯坦青年音樂會 DVD，不僅讓音樂愛好者可以欣賞歷屆著名青年指揮家的音樂會，也鼓勵有志於音樂事業年輕後輩立志奮鬥。

美貞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奪得金獎，又指揮紐約愛樂交響樂團，不僅僅是她個人的成就，重要的是她成為亞洲

第一位負有國際聲譽的女指揮，打破了被男性壟斷的音樂指揮臺。迄今為止亞洲沒有再出現被國際公認的女指揮。

她徵服了韓國與日本：

戴着臺灣成功的光環和紐約獲得國際金獎的盛譽，一顆明亮的新星在東方冉冉升起，世界各地邀請函如同雪片般飛來，包括素有瞧不起女性的韓國和日本。

因為臺灣的演出成功，韓國東亞日報向她發出邀請，以客座指揮身份，為 1966 年 2 月 23 日 漢城國民廳舉行的漢城交響樂團演奏，指揮了第一場音樂會，三千座位的音樂大廳座無虛席。節目內容有李斯特的“前奏曲”，拉羅的“大提琴協奏曲”和貝多芬的“第六交響曲”。隨後又在釜山和大邱各指揮一場。她在韓國逗留了十天。

### (东亚日报的资料)

在紐約獲得世界級的米特羅波洛斯國際青年指揮比賽金獎後，韓國再度發出邀請，這次她將指揮擁有八十五名團員的漢城愛樂交響樂團，于 1967 年 6 月 11 日晚間在漢城市區大會堂舉行，節目包括有貝多芬的“裏奧納序曲”，柴可夫斯基的“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和孟德爾鬆的“意大利交響曲”第四樂章等作品，終場時曾謝幕達五、六次。當時駐韓國唐縱大使親自陪同四十餘位重要貴賓出席了演奏會，並為美貞在大使館舉行酒會，介紹她與韓國各界人士會面。

在韓國漢城京鄉新聞的邀請下，美貞于 1970 年 11 月 30 日再度蒞臨漢城，在當地市民會館為韓國交響樂團指揮演出。她在四年之內一共三次訪問了漢城。除了指揮漢城交響樂團和韓國國家交響樂團外，她還特地為漢城女子管弦樂團指揮過。

### (漢城演出圖片)

至於日本的訪問，却帶有幾分戲劇性。美貞在 1966 年 3 月 1 日從漢城飛抵東京，拜會了當地的著名音樂指揮和音樂家，探討七月到日本指揮演出事宜。在高傲自大的日本男人面前，發生了一段小插曲。她在拜訪讀賣新聞交響樂團的時候，負責人看到眼前身高祇有 155 公分的小姑娘，不免對她產生懷疑，認為要在指揮臺上震住上百位的男性樂團，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和對方的交談中，她嗅覺到對方的傲慢自大，但她沉着應對，再次展現了她的執著和勇氣，向該團負責人據理力爭。最後負責人祇在該樂團排練的時候，給她一個指揮的機會，以便應付了事。但美貞並不因為是排練而稍有懈怠，於是拿起指揮棒，在 3 月 6 日為日本讀賣新聞擁有八十二位團員的龐大交響樂團，極其認真地作了一場指揮。

她的技巧和臺風深深地吸引住該團負責人，全團的團員也對這位中國女指揮刮目相看。也因為她的堅持和努力，終於感動了日本讀賣新聞的負責人，而向美貞發出正式邀請，安排她在 1967 年 8 月 16 日在日本最大的音樂廳，東京“上野文化會堂”舉行。日本讀賣新聞交響樂團素有“日本愛樂交響樂團”的盛譽，它是一個擁有八十位全部為男性團員的正式交響樂團，而且日本人大男人主義甚強，對待女性缺乏尊重。這次美貞得以成功赴日，除了她在這之前訪問該團時，為他們排練時的指揮留下深刻印象之外，最關鍵的是美貞在紐約獲得國際金獎，引起了日本音樂界的注意。她徵服了日本，並成為第一位亞洲女性指揮家在日本發出閃爍的光亮。當筆者在籌劃撰寫她傳記的時候，和讀賣新聞交響樂團書信來往中，希望能得東京‘上野文化會堂’的會址，但被告知該會堂因為年代已久而被拆除。

### (读卖新闻提供图片)

在日本巡回指揮後，東京每日新聞（Mainichi News）的音樂專欄作家克勞斯·波林申（Klaus Pringsheim）在文章中對美貞給予了最高的評價：“我記得在所有聆聽過肖斯塔科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 1906-1075）作品第五號交響曲 D 小調一曲中，日本樂團認為她指揮了一場最完美而沒有絲毫瑕疵的演出。”（She got from them ‘Japanese

musicians' the most completely satisfying performance I recall having ever heard of the 5th Symphony by Shostakovich)

肖斯塔科維奇的這首交響樂是在 1937 年完成創作的，同一年 11 月 21 日在列寧格勒由列寧格勒愛樂交響樂團首演，這首 45 分鐘的曲目，被公認為是最具藝術風格，但也是難度極高的樂曲。美貞能獲得日本音樂界的好評，正反映出她在古典音樂上刻苦勤練所獲得的造詣。

她在世界各地不止一次地遭遇到類似在日本的待遇，但最後都被她若定自如細膩的指揮所震撼。法國音樂評論家 Yves Hucher 就曾這樣描述稱：

**“听众在一开始时略带怀疑的态度，但随即被她的魅力所吸引而被征服并极度的喜爱。最重要的是法国电台电视广播交响乐团的团员一致细心地注视着美贞时的每一节拍。在最后应听众之请再度献演后，所获得的如雷掌声，就证明了一切。”**

在東京演奏會中，美貞指揮了史特勞斯的“唐璜交響曲”，莫扎特的“K 基調第四百六十七號鋼琴和奏曲”，和貝多芬的“第七號交響曲”。日本聞名的女鋼琴家江戶京子擔任莫扎特“鋼琴 K 基調第四百六十七號鋼琴和奏曲”中的鋼琴獨奏。

美貞這次的日本之行，實際上是美貞自身的努力和國際成就而促成的。然而臺灣方面也把握了這次機會，展開對日本的文化交流工作，由駐日本大使館和中日文化交流

協會聯合出面作為主辦方。當時臺灣駐日本大使陳之邁先生邀請了世界各國駐日本使館外交人員，日本政府及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出席。日本天皇御弟高鬆宮夫婦率領一百八十多位貴賓出席了這場音樂會。可謂盛況空前。

日本各大報都大篇幅報道推崇：“郭美貞是第一位指揮日本大型交響樂團的女性，也是國際指揮比賽中贏得最高獎的女性。”

由于她的精湛指揮技巧及溫文爾雅的風姿，折服了向來以男人為中心的日本。並邀請她到日本指揮東京交響樂團。美貞于 1968 年 5 月再度踏上日本，開始了她在日本十八場指揮的巡回演出。

首場是 5 月 27 日在日本東京上野文化會堂舉行。同臺演出有日本盲人鋼琴家和波孝嬉，是晚擁有 2600 座位的音樂聽裏座無虛席。

5 月 30 日日本朝日新聞刊出：“郭女士是中國人，今年二十七歲，現在是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助理指揮。以一個女性統率男性團員，確實相當不易。”一個以男性位中心的日本社會，新聞界對一個亞洲女性的如此推崇可以說是破天荒的表現。

該報繼續報道了美貞和和波孝嬉的一段對話：

“我曾經用了九年的時間，去琢磨這次演出中的最後一首交響曲中的許多思想，即使是天才音樂家也不可能在幾天之內趨于成熟，需要時間來提煉。”

“郭小姐的指揮相當優秀，親切而認真，我想，在練習時也是如此。”

“我曾經用了八年的時間練習今夜指揮的莫扎特協奏曲。”

“是嗎?”

“練習是無止境的。”

這段談話反映了美貞的成就絕非偶然，也是和波孝嬉的寫照，因為他是在母親十多年的培養下，給他創造了登上舞臺的機會。

### (美貞和和波孝嬉的合照)

美貞這次的日本巡回演出一共指揮了十八場，其中兩場是在電視中指揮。而6月28日在上野文化會堂的最後一場音樂會，七次出場謝幕，給她的日本之行畫上圓滿的句號。

### (美貞在日本飞机上的手绘图)

她的日本之行，不僅贏得了日本社會的推崇，還引起全球媒體的矚目，紐約星期天新聞用全版刊登了一則署名希納金撰寫的報道，對美貞在美國，日本和哥倫比亞等地的演出綜合地給于最高評價和贊揚，他是這樣描述的：

“她正过着一种使一般女人都会嫉妒的生活，只要她一举那纤细的手指，一百零六个人便会立即注视她。这可从

她最近以助理指挥的身份，首次登台指挥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一个事实中获得证实。这个闻名的乐坛，系由名指挥伯恩斯坦任首席指挥的。”

他接着称赞美贞：

“在日本，海伦郭凭籍着麦克风，以及通过一位女译员的协助，成功地指挥了全部是男性的交响乐团。她更在最近一场极其成功的哥伦比亚演奏中，临时变更节目，加上一些南美洲人都想演唱的乐曲。当地报道以“大师”来称呼她，并指出她熟练的技巧，细腻的表现，从音乐中表达出人性美。”。

(新潮周刊资料)

销售量达七十万份的日本‘新潮周刊’用六页的篇幅报道美贞，并配有大幅照片，影响很大。日本时报在8月24日刊登了美国音乐评论家葛利裹 (Marcel Grilli) 的文章，他高度评价称：“无人能怀疑郭美贞小姐不寻常的操纵音乐指挥棒技巧，和与生俱来的音乐情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能够在让乐谱和韵律如波涛般迅速地起伏。”

《周刊新闻》在9月20日刊登了美贞四张照片，表达对这位中国女指挥家的尊重。日文星期晚报《东京观察报》以全页刊载了两篇独家访问的报道。

日本NHK交响乐团在1971年访问台湾时，共演出四场，特地邀请美贞指挥其中的第三场。

美貞的韓國和日本之行，打破了這兩個男性社會的音樂傳統，因為美貞熟練的指揮技巧和她在指揮時的魅力，讓他們無法拒絕她站在指揮臺上，指揮男性音樂成員組成的交響樂團。他們不僅是感動，更認為因為有她的指揮，是每一個團員的至高榮耀。

## 菲律賓——她的第二故鄉

她在紐約獲得國際比賽金獎的消息傳遍全球時，菲律賓華僑在獲得這一令人鼓舞興奮的信息時也為此感到自豪。當地華僑李惠秀女士（Mrs. Fay Lee Co）得悉後更是雀躍無比，那是東南亞華僑對故鄉傳統情結的表現，不管在地球的那個角落，凡是中國人，哪怕是點滴成就，都會給海外僑胞帶去發自內心的自豪感。

李惠秀的父親拉蒙·李(Ramon Lee)在馬尼拉唐人街經營一家因炸雞而聞名的餐館。這家餐館至今仍然保持百年前的原貌，沒有空調，但是每天都門庭若市，顧客却是一代又一代在這裏品嚐那特殊制作的炸雞。在眾多的顧客中，有一位名叫拉法埃爾·祖盧埃塔(Rafael Zulueta)，是當地著名的演藝經紀人。他光顧該餐館的日子久了，很自然地也就和李先生成了好友。

爲了讓菲律賓當地愛好音樂的菲律賓人和華僑，能共享美貞在國際上獲得的殊榮，李惠秀女士先多方收集美貞的資料，然後請父親和拉法埃爾·祖魯埃塔商議，是否能設法爭取邀請美貞訪問菲律賓，指揮馬尼拉交響樂團。李惠秀的真誠和對音樂的愛好，感動了祖魯埃塔，終於邀請到美貞的到菲律賓訪問。

我和妻子爲了收集有關美貞在菲律賓生活的資料，在2014年7月到馬尼拉的時候，通過許文哲先生的介紹而認

識了李惠秀女士，在和她交談中，她用愉快但帶着幾分惋惜的語調，回憶着和父親同祖魯埃塔先生一同去機場迎接美貞的那段情景，她那布滿皺紋的臉龐上一直是帶着淳樸的微笑。她還告訴我，當美貞發現她父女兩人是廣東原籍時，她立即感受到‘他鄉遇故知’的興奮，彼此間立即用廣東話交談，給美貞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美貞在 1968 年 9 月抵達菲律賓，馬尼拉交響樂團於 9 月 12、14 和 15 日在菲華人壽保險公司大禮堂舉行了三場音樂會，統由美貞指揮。這三場音樂會是特地為當地瑜美公寓悲劇事件的孤兒籌募教育基金而舉行的，所以定名為“菲華之夜”。在公演之後，馬尼拉紀事報評論美貞是“指揮壇上權威與信心的象徵。”

在美貞整個音樂生涯中，菲律賓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頁，不僅在音樂上她給予了菲律賓社會無法形容的影響，在那裏她感受到在其他國家地區難以企及的率真對待和尊重，尤其是在旅菲僑胞之間，建立了牢固的友情，享盡他們給予的溫暖和關愛。

演出結束後，當時菲律賓總統夫人伊美爾黛·馬可士 (Imelda Marcos) 特地在 27 日接見了美貞，並贈送她簽名照片。（我在 2014 年 3 月去澳大利亞她弟弟家時，在她遺物中發現了這張照片，本擬編排在這本傳記中，遺憾的是照片上布滿了墨水印迹無法清理，祇能割愛。）馬可士總統夫人還邀請美貞第二年再度到訪菲律賓，出席六月開幕的馬尼拉文化中心落成典禮。這座造價千萬美元的文化中

心，是由馬可士夫人親自主持，并由她自己擔任該中心主席。

那時候菲律賓和臺灣的關係非常友好，交流密切，菲律賓馬可士總統夫人特地請美貞攜帶一封致臺灣教育部的親筆信，邀請美貞率領一個兒童交響樂團于九月為文化中心落成典禮的藝術節演出。

邀請信中曾這樣寫着：“這一個節目將成為文化中心開幕典禮的高潮。”菲國音樂學院院長雷蒙·塔帕萊斯在訪問臺灣時聽過臺南三 B 兒童管弦樂團的演出，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郭美貞回到臺灣後，立即快馬加鞭，加緊訓練臺南三 B 兒童交響樂團和臺北興仁小學管弦樂團及世紀學生管弦樂團，從中選拔出 54 位兒童組成了“中華兒童管弦樂團”，幽默大師林語堂為此還特地去臺南聆聽孩子們的演奏。

令孩子們興奮而終身難忘的是，在飛往馬尼拉的前夕，中華兒童交響樂團于八月十四日晚上，在陽明山華興育幼院禮堂舉行了一場演出。蔣介石總統夫婦親臨觀賞孩子們的演出，并接見了郭美貞及全團。除了鼓勵叮嚀孩子們之外，還告訴他們在回到臺灣後，總統夫婦將準備好禮物贈送給每個孩子。

在接見的時候，蔣介石總統握着美貞的手說：“你正在從事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兒童是中國的前途，非常高興你願意花時間來訓練這些兒童，把他們的程度加強了許

多，并且還要帶他們到菲律賓為國家爭取榮譽。”（摘自1978年4月5日民生報第二版紀念蔣公逝世三周年特刊）

美貞於1969年率領兒童團到訪馬尼拉，原本安排在馬尼拉文化中心演出兩場，因為兒童們的天資及高超的演出，最後一共演出六場，在菲律賓掀起了高潮和對音樂的熱情。

十月一日及二日在聖歡 (San Juan) 馬尼拉電力公司禮堂指揮馬尼拉交響樂團演出，美貞在菲律賓從此名聲大震，連當地希爾頓酒店都以她的姓 “Quach 郭) 為一道點心命名，並將采用材料及制作方法刊載在報上。

美貞在1970年再度被邀請訪問馬尼拉，分別在3月13及15日，4月10日及12日，5月8日及10日先後指揮了六場音樂會，她所到之處風靡了音樂愛好者，在欲罷不能的情況下，又在6月及7月增加了三場演出。

1971年2月20日抵達菲律賓後，美貞又分別在菲律賓南部地區巴可洛等城市巡回演出，深得當地人士的贊賞。1973年11月13日指揮馬尼拉交響樂團。次年8月30日及9月27日分別在菲律賓文化中心指揮兩場。

她並沒有因為在菲律賓擁有眾多慕名而來的聽眾，令她在指揮的時候稍有鬆懈。我在2014年7月訪問馬尼拉的時候，許文哲先生請設宴接待我，在席間與會的柯美智女士親口給我講了一段令她對郭美貞在指揮音樂會時的小插曲。當時樂團中有一位團員，接二連三地在一個音符上發生錯誤，無法逃過美貞敏銳的聽覺而即時糾正他，不知這位團員是有意還是無意，仍然犯了同樣的錯誤，美貞的急

性子再也忍耐不住，將指揮棒在樂譜架上使勁地敲了一下，居然指揮棒被敲斷，而那斷裂的一小節飛向聽眾席，掉在一位聽眾的正前方，而這位聽眾時菲律賓的著名音樂評論家，她沒有遲疑即將折斷的指揮棒撿了起來，放進口袋裏。從這個小插曲可以理解，是因為她在音樂事業上的嚴肅認真而贏得了菲律賓音樂界和社會各界的尊重。

後來因為她在全球指揮樂團檔期安排得非常緊密，同時也爲了臺灣的古典音樂發展嘔心瀝血，她在那裏逗留了相當一段時間，爲此她也就對菲律賓祇能作暫時的闊別。一直到 1991 年她再度蒞臨斯島，令她感動的是，菲律賓音樂愛好者始終沒有忘記她，所以她一抵達，在音樂界立即掀起一陣狂熱。其中最爲轟動的是她爲馬尼拉的 MET 劇院排練以日本爲背景的輕歌劇‘日本天皇’（The Mikado），指揮馬尼拉交響樂團爲該劇團伴奏。先後在該劇院演出六場，然後移師到大馬尼拉劇院繼續演出兩場。

1994 年美貞在健康檢查時發現自己罹患了乳腺癌，而父母的先後病逝，一連串生活中的變故，導致她無法專注于音樂事業。那是她最爲低沉的一段生命。一直到 2007 年，在菲律賓演藝經紀人莫奈特·奇萊科(Monet Kilayko)的策劃下，美貞來到闊別了十六年的馬尼拉和馬尼拉交響樂團合作舉行了幾場極爲出色的演奏，分別爲：

2007 年 4 月 22 日，在馬尼拉聖史科拉斯狄卡音樂學院（St. Scholastica's College）爲該音樂學院建校百周年的一項紀念活動。在該院的聖·契奇麗亞音樂廳（St. Cecilia's

Hall) 指揮一場音樂會。

這是一場非常特殊的音樂會，美貞和馬尼拉當地保險業巨子許文哲先生的夫人，當地著名鋼琴家許林韻文女士合作獻演一場音樂會。

### (音乐会后合影)

2007年4月26日，在馬尼拉文化中心大禮堂舉辦一場音樂會；當音樂會開始時，美貞指揮演奏了菲律賓國歌。被公認為是所有交響樂團將菲律賓國歌演奏得天衣無縫，令菲律賓人感動的一次，每一位在場的來賓都屏息住呼吸，享受着菲律賓民族文化的自豪和尊嚴。

2007年9月5日，在巴孔羅城 (Bacolod City) 聖拉沙爾大學 University of St. La Salle 的聖拉沙爾聖堂 (Santuario de La Salle) 舉行了一場音樂會；

2007年9月7日和8日，在杜馬奎迪城 (Dumaguete City) 的西利曼大學 (Siliman University) 的露西音樂廳 (Luce Auditorium) 舉辦了兩場音樂會；

2008年5月25日前往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和波拉德高地交響樂團 (Braddell Heights Symphony Orchestra) 舉行了一場音樂會，仍然由許林韻文擔任鋼琴獨奏。

在前往新加坡之前，美貞於2月24日在菲律賓馬尼拉的馬卡蒂區 40 Solar Street 的 Bel-air Village 和馬尼拉交響樂團合作，為葡羅大眾舉行了一場露天公園音樂會。

## （音乐会的海报）

她在 2008 年 9 月 27 日，和許林韵文女士再度携手合作，在菲律賓帕西葛城(Pasig City)的奧爾狄卡中心（Ortiga Center）梅拉爾多劇場(Meraldo Theatre)，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音樂會。許林韵文女士擔任鋼琴獨奏，她的年僅十四歲的女兒首次登臺演出笛子獨奏。

## （音乐会的海报及图片）

這場音樂會是為紀念許先生先翁當地殷商許有道八十五誕辰而舉辦的音樂會，由馬尼拉交響樂團演出。由于許先生多年來支持馬尼拉當地的音樂發展事業，舉辦一場紀念他父親的音樂會，在菲律賓也是絕無僅有的場面。

在這場音樂會之前，美貞特地為馬尼拉歌劇團指揮演出普希尼作品“波西米亞人”，這是她生前指揮的最後一場歌劇，而為許先生先翁八十五誕辰舉辦的音樂會，也是她音樂生涯的最後一場指揮。

估計美貞先後訪問了菲律賓達二十多次，是她一生中所訪問的國家中最多的一個。因為當地華僑對她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真心實意的支持，她不止一次告訴當地的友人，菲律賓是她的第二故鄉。實際上當她罹患乳腺癌後，在生

命終結前，她一直在菲律賓小島上生活，游泳和潛水作為對她的自然療方，直到 2013 年春天美貞回到澳大利亞前，都一直受到俞鴻鈞女兒俞菀璉（Angela Dee）長期的照料。

郭美貞在 2013 年辭世後，消息傳到馬尼拉，除了當地對她有着長期友情的著名音樂評論家，在中英文報刊撰寫紀念文章外。華僑保險業鉅子許文哲先生和夫人許林韻雲共同在其保險公司大堂舉行了一場追思彌撒，以資紀念這位一代國際音樂界的才女。

## 从澳大利亚走向世界

盡管澳大利亞政府實行的白人政策，給移民增加諸多困擾和不便，但爲了生存，移民也祇能忍氣吞聲，低頭做人。美貞爲了參加國際音樂活動，也需要澳大利亞政府批准她轉變成公民身份才能實現她的理想。尤其是參加美國紐約密特羅波洛斯國際青年指揮比賽時，參賽者必須要代表國家，而不能以個人身份報名。

她那時已經在澳大利亞居住了十四年另十個月，而澳大利亞政府規定移民必須住滿十五年才能申請公民身份。所以她希望政府能給以通融，目的也是爲了能代表澳大利亞參加國際音樂比賽。但是澳大利亞政府拒絕了美貞的要求，她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中國人的身份去參賽。

在 1960 年時代，中國大陸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對外完全呈封閉隔離狀態，海外華僑得不到大陸內部絲毫信息。而美貞受到家庭中的影響，一直認爲中華民國才是自己的祖國。而後來她希望以中華民國公民身份代表臺灣參加國際比賽，也是經過一波三折的。

美貞在享譽全球之後，並沒有背離澳大利亞，相反的她仍然用一顆善良的心去對待。她感受到在幼年時期的教育得自于澳大利亞，她的音樂生命起始于澳大利亞，在那裏她得到俄羅斯恩師馬可先生給她音樂上的啓蒙，又經過

老師的安排，她一生中所指揮的第一場音樂會也在澳大利亞，而且老師將自己的指揮棒交給她使用，那時候她才二十出頭，卻有機會在後面的五場音樂會和老師同時登臺指揮。帶着感恩之心，她回到澳大利亞，為當地音樂教育鋪墊了扎實的基礎。

在導師尼古拉·馬可的影響下，每當她站在指揮臺上，對待每一個音樂參與者的態度認真堅定而毫不留情，目的不是炫耀自己，而是樂團在舞臺上的精神。她曾說：“指揮是和聽眾的聯系，通過指揮聽眾接受了音樂中的內涵意義”。她從不會緊張，她祇相信假如是一個好指揮，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那麼即使樂團成員不喜歡他，但也會尊重他們”。

因為出師于澳大利亞，她對當地的音樂事業不僅給于關注，也有嚴格的要求，有一次她在指揮悉尼交響樂團的時候，其中一位小提琴手為了達到自己音樂效果而不斷改變旋律，美貞立即中斷并嚴格地告訴那小提琴手，不要再犯了！另外一個小提琴手立即低聲抱怨稱：“為什麼這時候要停下來？”美貞不加思索地回答他：“等會兒告訴你怎麼回事”。

她很尊重每一位和她一起工作的音樂者，但她堅信必須要用專業者的態度來看待他們。因為“要成為一個專業人員必須要對自己，對我，對聽眾負責，要發揮到伶俐盡致”。

她對自己在指揮臺上一絲不苟的理由很簡單，尤其是作為一個女性。在指揮臺上很容易制造轟動，她認為這祇

是一個短暫的價值：“最多也就是一個晚上而已。假如他們不請你回來，意味着就此結束了。迄今為止凡是我到過的地方，他們都會邀請我再去。”

這就是她的自信，也是對澳大利亞的反饋。她曾先後指揮了墨爾本交響樂團，阿迪萊交響樂團，布裏斯班交響樂團，帕思交響樂團，和賀帕交響樂團。爲了發展澳大利亞音樂事業以及培養年輕音樂愛好者，她在 1971 年前往悉尼哥林卡 (Ku-rin-gai) 地區，向當地議會申請創立愛樂交響樂團 (Ku-ring-gai Philharmonic Orchestra)，但當地商會不予同意，並加以阻撓。經

過了兩年的堅持和不懈努力，最終在 1973 年得到議會通過，並聘請她擔任指揮兼音樂主任。

美貞創立這個非專業的樂團目的是推動當地音樂教育，至今這個樂團仍然活躍在社區裏，而且已經發展成爲一個培養青少年音樂愛好者的基地，每年都舉辦高中及兒童音樂比賽。這不僅實現了美貞創辦音樂教育的夢想，也是她給澳大利亞留下一筆豐厚的音樂遺產。

她在 1980 年訪問臺灣的時候，還曾不斷向人提到這個已經有了七年歷史的交響樂團，言談之下感到無比的自豪。事實上這個美貞專爲青少年創辦的澳大利亞交響樂團，迄今仍然活躍在當地的樂壇上，也許很多人早已忘記這個樂團的創始人，但那正符合美貞的人生哲學，凡是做對人類有益的事，不必去計較自己的付出。

她在 1983 年曾在堪培拉爲聖誕節指揮過一場取名爲“你自己唱彌賽亞”的露天音樂會，共有四千群眾，一起

在她的指揮下，合唱這首韓德爾創作的世界著名聖歌，創下了音樂史上合唱的記錄，也是美貞畢生深感欣慰的一次創舉，給澳大利亞和國際音樂界留下豐富的經驗。

除了對澳大利亞的音樂教育作出奉獻之外，那段時間也是她活躍在世界的音樂舞臺上，她音樂事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時代。來之世界各地的邀請如雪片飛來。

1973年2月她抵達法國巴黎，先後指揮了六個法國交響樂團及室內樂團。8月份她再度蒞臨法國東部史特拉斯堡指揮一個六十六人的大型交響樂團。1975年她以第一位女指揮的地位，指揮了法國無線電臺的室內管弦樂團。

1976年2月她到了香港，于23至25日在香港大會堂為香港管絃樂團指揮三場音樂會，臺灣的日籍鋼琴家藤田梓擔任貝多芬“皇帝”協奏曲的鋼琴獨奏。

從1977年9月到12月，美貞在香港指揮香港愛樂交響樂團共演奏十二場，其中在11月28日還邀請了臺灣的楊小佩擔任鋼琴獨奏，實際上美貞在香港擔任香港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達三年之久。

她在接受臺北聯合報的採訪時，曾這樣說出她的心聲：“我們中國人天份很高，祇要拋掉音樂是娛樂，陪襯的想法，真正的去懂音樂究竟是什麼，我想，我們可以在音樂方面有突破的表現。”（摘自1977年12月6日聯合報9版）

次年她在臺北民生報的採訪中，更道出她內心的世界：“我像一個沒有根的浮萍，我需要有一個屬於我的家。我不願經年在國外奔走，我之所以東奔西走，是爲了

音樂，但那些地方對我沒有意義，因為不是我自己的國家。”（摘自 1978 年 2 月 18 日民生報第 6 版）

早在 1966 年和 1969 年，她即已出席過美國密西根州英特拉根的全國音樂夏令營，並擔任世界青年交響樂團的指揮演出。這是一個專為培養青少年音樂人才的活動，每年六月開始為期八周。其中不分國籍，膚色和宗教背景，參加學員從八歲到大學生，分為幼兒，少年，高中生及大學生四個組成不分。參加大學生的學員，在結業後如進入當地大學研究所，可以將夏令營的成績作為學分轉送到就讀研究所。這是對學生在音樂學習上的一種積極鼓勵。

1978 年美貞應邀再次出席該夏令營，以指揮家的身份為該夏令營成立五十周年慶祝活動，在 7 月 16 日指揮一場演出。這個舉世聞名的世界青年音樂活動，啟發了美貞開拓臺灣及其他地方青少年的音樂工作。尤其是在 1970 年時代，美貞在臺灣籌組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直接受到這個世界音樂活動的影響。除此之外，在她的一生中，和培養青少年音樂有關的活動基本上還有：

在紐約期間，她曾在紐約的愛樂音樂廳和林肯中心指揮過紐約大都會青年交響樂的兩場音樂會；在紐約中央公園指揮過一場露天青年交響樂的演奏；並指揮過全紐約州高中學生樂團（All New York State High School）以及一年一度的阿靈頓高中樂團演出。

在臺灣她培訓了青少年樂團，率領他們做過三次巡回演出，並率領青少年樂團訪問菲律賓，擔任菲律賓文化中心開幕典禮演出。

她在澳大利亞悉尼古令卡（Kuringai）區創立了該區青年交響樂團，迄今為止仍然是澳大利亞培養青少年音樂人才非常活躍的一個音樂團體。

她在參加美國是項世界青少年音樂活動的時候，並沒有忘記為臺灣發展音樂教育的工作，所以她特地物色了七位青年音樂家，準備延攬他們到臺灣，加入到她正在籌備的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同時在夏令營結束後，她不遺餘力還特地途經韓國，在漢城停留了四天，目的也是為了延攬人才到臺灣共同為臺灣的音樂事業合作。

## 台灣 —— 她靈魂上的伤疤

在没有訪問臺灣之前，因為受到父母及舅舅的身教和言教，而且她一家三代僑居在越南西貢，一直用中華民國護照來證明他們仍然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所以在澳大利亞政府對她音樂生涯没有表達任何的關懷後，她始終把臺灣作為自己的祖國來看待。

從 1965 年 11 月首次成功訪問臺灣後，美貞的心願就是能在那裏為孩子們創辦一所音樂學校，培養一批有國際水平的音樂人才，為中華民族爭光。當然最理想的是臺灣當局能支持她創辦一個交響樂團，這樣就可以留下為她心目中的“祖國”奉獻。在開始的三年中，即使她在世界各地忙碌地為音樂會指揮，她都會想方設法安排途徑臺灣到臺南去看看孩子，或是在臺灣指揮音樂時，她必定會擠出時間去臺南為那些富有音樂潛力的孩子授課。但每次到臺灣指揮樂團，她僅能以客座指揮的身份出現。漸漸地她感受到那裏過於復雜的環境，何況她受到世界各地的邀請前往指揮，她原本可以放棄臺灣而一走了之，但她熱愛故鄉的情操，始終是她期盼能有培養臺灣音樂人才機會的推動力。

事實上另一方面，臺灣有識之士也一直不斷發出安排美貞留下的呼聲，黎中天先生于 1967 年 7 月 8 日在臺北的經濟日報副刊的專欄“說天說地”中有很精辟的分析。

他寫道：

“她在憂慮，憂慮來日沒有一個供她指揮的樂團。這對音樂指揮家是非常嚴重的事；一個音樂指揮沒有樂團，猶如一個科學家沒有實驗室，也猶如一個國王沒有土地和人民。”

在文章的結尾，黎中天先生期待：“爲了讓郭美貞小姐發揮才能，更爲了提倡文化，我們——包括政府，工商文化界，以及愛好音樂的人們，大家合力給她樂團，給她好樂團吧，相信她會給我們音樂，給我們好音樂。”

其實當時在臺灣，除了軍方國防部的軍樂團外，臺北市有市立交響樂團，臺灣省教育廳有省交響樂團，假如當時政府部門，或教育文化界稍有發展音樂的眼光和遠見，這原本是極其容易安排的事。然而臺灣的交響樂團是政府公務員體系中的一不分，任何參與的人員，都需要經過政府內的一套程序。美貞是外籍，能否加入任何一個交響樂團，都有一定的阻力。

更爲困難的是爲了延攬美貞，如何去克服文人相輕的傳統陋習，以及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觀念，就成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更何況美貞享有國際音樂指揮的尊稱，假如任何一個樂團交給美貞，勢必會影響相當一批人的飯碗，而導致音樂界裏人人自危的憂慮，也由此令一部分音樂界人士出現相形見拙的自卑感。於是在自私功利面前，祇有在發展音樂的通道上設立難以逾越的藩籬。而從美貞初次訪問臺灣受到各界熱情歡迎和接待，到後來音樂界的逐漸冷淡和疏遠就引證了對待外來人才的風度和修養。

當然臺灣社會上仍不乏有識之士，對臺灣的文化發展給予支持和鼓勵。當美貞在澳大利亞悉尼的衛星城市哥令卡（Ku-Rin-Gai）籌備成立當地愛樂交響樂團之際，臺灣的社會賢達也在醞釀，給美貞提供在臺北創造一個發展才能的環境。其中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先生熱心地在奔走，希望能促成在臺北創立一個能在國際上配比的交響樂團。經過他的奔走游說，先有臺塑曾答應資助臺幣五百萬元，但最終祇是紙上談兵未能如願。

1978年王惕吾先生轉而向當地另一個享有盛譽的財團董事長商酌，希望他能够慷慨解囊支持這個為臺灣發展未來音樂事業的文化活動。

須要說明的是，筆者對當時支持美貞的財團及關鍵人物都予以節略，目的是這本傳記專注記錄美貞一生在音樂事業上的奮鬥和成就，而不是制造社會新聞般地轟動效應。何況那段經歷因為雙方思維的差異造成了誤會，導致留下臺灣音樂界的無限遺憾。既然如此就沒有必要再去挖陳年瘡疤，何況美貞斯人已去，往事已成歷史，作為美貞近半個世紀的好友，對她的性格了如指掌，而對支持他的財團我也祇是風聞和新聞報道，不能就此作為杜撰依據，而要對雙方予以諒解和體恤。因此在這段歷史上，筆者祇是以客觀的立場，記錄下美貞和該財團從1978年開始交往的點點滴滴。至于兩者之間的是非功過，筆者覺得沒有必要去撻伐或贊譽。

早在1974年美貞就曾見過這個財團的負責人。那是為了慶祝總統和副總統就職典禮，美貞偕同鋼琴家王青雲先

生回到臺灣，指揮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這位負責人出席了是次的音樂會，美貞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王惕吾先生和他在商酌支持創立臺北交響樂團的事宜時，美貞正好在臺南，等美貞從臺灣南部旅行回到臺北後，受到邀請和他及王惕吾先生共餐，席間這位財團負責人立即慨允每年出資新臺幣一千兩百萬作為組織交響樂團的經費。並且要美貞在一天之內提出書面計劃。臺灣工商界如此果斷的大手筆來支持文化事業實屬史無前例的壯舉，除了給她難以置信的喜悅外，也讓她感受到也許這是她多年來夢寐以求報國夙願的契機。

稍後他還書面告訴美貞，在第一個會計年度裏，另外撥款五百萬，作為購買樂器和辦公室經費，其中不包括美貞的薪金。在接受邀請之前，她最大的顧慮是覺得自己中文的不足而是否能勝任這一重職。為此她曾特地前往拜訪于斌樞機主教，就她因語言上的障礙是否商酌，希望他能夠慷慨解囊支持這個為臺灣發展未來音樂事業合適留在臺灣的問題，徵求長輩的意見。

于斌樞機主教很和藹地告訴她：“你一直都在各國奔波，現在是你安頓下來的時候了。給臺灣兩年吧。”

言下之意，似乎對美貞在臺灣長久居留的計劃也有保留，但于斌樞機主教相信，祇要給她兩年的時間，她一定會為臺灣的交響樂打下扎實的基礎。不久于斌樞機即前往羅馬參加教宗保羅六世的葬禮，接下來準備出席選舉新教宗的重大儀式，不幸他突然因心臟病在八月十六日去世，這一噩耗傳到臺灣，都因這位樸素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的慈

善長者的去世感到傷痛，而他在行前和美貞的談話也是他一生中培養後進的最後留言，體現了這位忠厚前輩的‘鞠躬盡瘁’精神。

即便如此，美貞仍然無法去除她的顧慮。作為一個女性指揮，在男人主導的臺灣社會中，她能否獲得尊重是她的首要考慮，從往年作為客座指揮的經驗中她就已體驗到種種難以排除的障礙。現在要獨撐整個交響樂團的籌組，建立等工作，她不免有些猶疑。她也曾和美國的朋友商討過，他們勸告她，臺灣的社會關係非常復雜，她出生在海外，長期生活在西方國家，思維和工作方式都迥然不同。以一個單純的音樂指揮，如何應對中國人的“人情世故”是一門非常難解惑的“學問”。

經過謹慎的考慮，為了臺灣孩子的未來，為了臺灣交響樂的發展，美貞毅然決然地接受了邀請，願意拿出一到兩年時間對這個尚未誕生的樂團充滿了憧憬。

由該財團負責人擔任董事長的“財團法人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在同年六月誕生了。董事會成員包括這位負責人的夫人，另外該財團五位成員，連同美貞共七人組成。董事會聘請美貞為交響樂團“終身指揮兼團長”。七月五日，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像一個初生嬰兒呱呱誕生。財團方面宣布樂團為74名成員組成，其中有專業音樂團員和兼職團員，並且向美國，韓國及香港等地招募海外音樂成員。每周訓練九小時。

該財團負責人成立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的果斷決定是毋用質疑的，但這個龐大的計劃就如此倉促上馬顯然是有點

突然。成立一個擁有數十人的音樂團體非同兒戲，而美貞除了擔任指揮兼團長外，還要親自督軍，將整個樂團誕生前期的所有行政工作，壓在一個從未經歷過管理行政的音樂指揮家肩上，原本就欠周全考慮。

當時美貞在海內外有一連串事前早已排定的演出檔期合同，除了5月18日為慶祝第六屆正副總統就職典禮，在臺北國父紀念館指揮臺北市交響樂團舉行的慶祝音樂會之外；5、6月間指揮四場中華少年交響樂團的巡回演出。6月27日出席韓國藝術界，在漢城世宗文化中心，指揮漢城交響樂團；7月16日要在美國指揮世界青年交響樂團，隨後她還要前往芝加哥為當地交響樂團培訓。

結束了海外忙碌的指揮工作，她隨即趕返臺北，在沒有通盤預算，完備的人員編制和合約等規劃下，該財團僅僅為她配備了一位秘書，並借用該財團的辦公室作為樂團的辦公場所。首要工作是甄選樂團成員。並且在九月要開始排練。美貞的壓力可想而知。但十多年培養人才的願望也就在這時候成了主要的推動力，她一天要用十多個小時，來應對這個沒有經過正式籌組的樂團工作。

樂團的發展並不如她想像中的那麼一帆風順，美貞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該財團大樓舉行了一次聖誕節內部的演出，從而得到董事會的支持，能在第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按原計劃對外作首次公演。樂團雖然已經發展到55名團員，另外還從海外甄選了十位音樂成員，但還是沒有得到董事會的正面支持。有趣的是董事會却將樂團的經費從原來的一千萬新臺幣增加到一仟七百萬，還為美貞配備了

一位秘書。看來董事會對樂團的支持還是正面的。

董事會之所以對美貞計劃的對外公演有所保留，認為樂團必須要達到高水平才能對外公演，並保證一鳴驚人。但如何達到所要求的“高水平”及所謂的“一鳴驚人”似乎極其抽象。從美貞的角度，要達到“高水平”是要經過不斷勤練，不斷演出才能完善。實際上音樂家永遠都是在追求完美，而完美又是沒有止境的。

舉辦一場音樂會必須要完成一連串的前期工作，如印刷宣傳海報，說明書，入場券和出售入場券，都需要事前的周密部署。在沒有董事會首肯的前提下，美貞無法動用經費來進行這些工作，另一面又要鼓勵全團成員的積極排練，萬一董事會決定對外公演，就不至于出現倉促的尷尬。為此美貞祇能將三月二十四日的演出作為一個要實現的目標，一面要求團員勤力排練。一面自掏腰包將所需要的海報，說明書和入場券等印刷妥當，萬一董事會決定不對外公演，也就當成投資虧損來處理了。

在她的任性，堅持和不屈服的個性驅動下，美貞終於如期將臺北愛樂交響樂團搬上了舞臺。為了強化樂團的實力，並認為樂團應該賦有音樂教育的任務，團員之間應彼此切磋取長補短。為此她不遺餘力通過私人關係，從海外聘請了十四位不同國籍的音樂家加入了樂團（其中四位抵臺不久就因為個人原因而離開），分別擔任臺灣樂團比較弱的第二小提琴，長笛，雙簧管，豎笛，小號和低音號等組別中，帶動樂團並促進臺灣樂團水平的提升。

但這樣的安排，在剛誕生的樂團中，引起部分本土團

員的心理不平衡。就在聖誕節內部演出時，深恐外國團員會在樂團中占盡上風，在嫉妒心理的作祟下，對這些外國團員產生有意無意的排斥。加上臺灣的生活條件，和當時美國和臺灣因為斷交所造成的反美情緒，一部分外國團員決定離開，最後只剩下六人支持美貞的艱苦工作。

在她精密準備和不懈努力，最終獲得董事會同意，才使得音樂會順利進行。首場公演最初定在2月22日舉行，但被董事會否決。美貞始終不灰心，先後向董事會提出舉辦首場公演的建議，最終獲得批准在三月二十四日舉行。

早在一月份，美貞就深感力不從心，由她一人獨挑大梁，稍有不慎，不僅耽誤了樂團的正常發展，也有可能成爲外界攻擊的口實。爲此她向董事會提出，由董事會另安排經理人選，處理樂團裏所有的行政和財務事宜，而她則專注音樂演出排練等她所熟悉的業務。但爲辦好首場音樂會，改組樂團人事的工作也就暫時擱在一邊。

臺北市愛樂交響樂團成立後的首場公演，于1979年3月24日在臺北市國父紀念館隆重舉行，這是臺灣音樂界的大喜事，財團支持人爲臺北愛樂交響樂團首次公演，在節目單中寫下這樣一段話：

“ 在各界的关心与期许之下，经过六个多月的筹备，台北 爱乐交响乐团终于能够作第一次演出。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与支持。‘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透过音乐的熏陶，能够收到净化，移风易俗之效。我们是抱着想对社会贡献棉力的心情来创立爱乐交响乐团。适逢享誉中外之名

指揮家郭美貞女士返國，乃聘請其主持團務。吸收國內優秀青年音樂人才成團。茲逢首次公演，缺失必多，尚請各界人士多加批評指教，以致本團能更臻完善之境。謝謝。”

這次的公演還得到臺灣工商界的熱心支持，計有國泰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國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樹德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萬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金閣設計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萬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和萬成農牧股份有限公司等。

### (節目單)

當晚的音樂會美貞選擇了貝多芬作品七十二“裏奧諾拉”序曲第三號，布魯絲作品二十六 G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和德佛拉克作品第八十八號 G 大調第八號交響曲。由小提琴手陳中平擔任獨奏。整個演出獲得音樂各界的好評，美貞也由此建立了更為堅強的信心，並按照原定計劃每月舉辦一次。

美貞對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的發展充滿了信心，從三月份的第一場演出，到後來的每月一次演奏會，前後一共演出十多場，幾乎是場場客滿，最令她感到欣慰的是，票房收入除了支付每場音樂會的開支和團員的薪酬外，還為基

金會增添了逾百萬元的利。這對所有團員也是極大的鼓勵。

然而她在海內外的朋友，都對這個初生嬰兒能否健康成長仍然持懷疑態度，主要是對一個以營利為主的商業機構，是否會一如既往持續地支持一個所費不貸的音樂團體存有疑問。與此同時，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內部，人事缺乏合理布局，董事會成員除了美貞一人為音樂專才外，其他董事祇要談到音樂事業，就如同隔靴搔癢，從而出現一系列本不應該發生的矛盾，諸如人事的管理，行政的支配，音樂會的年度計劃等等，都一股腦兒壓在美貞的肩上。不是她無能，而這根本就是一個祇從會計上計較而忽略了現實需要的不合理安排。但是在開始組織樂團的時候，美貞為發展臺灣的音樂事業，接下了這個雄偉的計劃使其付諸實現，何況該財團的財政支持來自不易，所以她咬緊牙根，獨自挑起這付重擔。

在邀請美貞籌組臺北愛樂交響樂團時，賦予給她的職務頭銜是終身指揮兼團長，然而董事會祇給她發了單方面的聘請函件，雙方始終沒有簽訂正式的合同。作為國際著名女指揮，美貞不善于和社會交際，祇是專心致志于為臺灣發展樂團而忙碌，而且她以西方社會待人接物的態度，對支持她的財團充滿信任，所以對於那一紙合約也就從未挂在心上。

此時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的發展正處於巔峰狀態，負責人仍然繼續支持交響樂團的發展，但由于他本人業務繁忙無暇顧及樂團的日常事務，於是指派了董事會中的一位董

事擔任執行董事，全權代表處理樂團事務。並從該財團抽調一位工作人員擔任樂團經理職務，為美貞分憂。遺憾的是二人對音樂極為陌生。從六月份到整個樂團在緊鑼密鼓準備 12 月 8 日的音樂會，一直到演出前，團員們始終沒有見過他們，也就出現了隔山如隔行的尷尬局面，而這兩位被董事會聘用人士都沒有作主權，一切還得向董事長請示，工作進展的困難可以想象。

事實上種種迹象反映出美貞和該負責人之間的誤解已經是暗潮洶湧。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從原來的熱情支持，漸漸走向冷漠對待，令美貞百思不得其解。例如九月三日該負責人曾給美貞發過一封信件，內容如下：

**“ 当国内外邀请爱乐交响乐团出国演出时，请不要用肯定‘是’与‘否’回答对方，而将案子提交董事会办理裁夺，也请不要告诉对方，‘如果 X 先生同意就没有问题之类的话...’**

從中即可揣摩出兩人之間似乎祇有上級和下屬的關係。早在舉行董事會前一個月，也就是 11 月份美貞收到該財團一封英文信，敦促她在十一月三十日遷出阿波羅公寓樓。而這封通知既沒有發函的單位，也沒有發函人的簽名。美貞覺得事出蹊蹺而對這突如其來的逐客令實在是難以接受，而拒絕立即遷出，並要求給以合理的解釋，該財團的答復是如不遷出，她每個月就要交五萬新臺幣房租。

原先要美貞入住公寓的也是該負責人的好意，他還花費了近三百萬來裝修整個單元，作為美貞的住所兼辦公室。令人費解的是，樂團成立才一年多，美貞破除種種困

難，連續十個月每月舉行一場公開演出，每場音樂會的收入，幾乎足以支付團員的薪金。可就在此時，給美貞發出搬遷的通知令人匪夷所思，令她產生狂風暴雨即將來臨的預感。

此時該財團傳出內部改組的信息，該負責人也有可能從原來的公司轉到另一屬下機構擔任董事長一職，於是他在 12 月 18 日召開了一次董事會。

據美貞的回憶：“以前開董事會都是由我擬定開會的議程，這回，他們告訴我，教我不要管。OK! 我也不覺得有何不對，後來他們拿來一份中英文對照的開會通知，上面祇寫着要討論三件事：捐款收入情況，各項開支概算，樂團演出情形，一點都沒有說要改組的事。”

會開始時，先由執行董事長報告，並對美貞讚美了一番，隨後即提出辭職的要求。最後該負責人在會上詢問有關企業對樂團的資助情況，與會的董事們答復說並不很理想。該負責人立即宣布：“那麼我們就將愛樂解散吧！”他兒戲般的表態令在場的美貞一時呆住了，感到不知所以，因為事前董事長並沒有透露解散樂團的任何風聲，更沒有徵求過她的意見。

這一草率的決定，是否為該負責人在會上的一時衝動，還是早有預謀，外人不得而知，但從後來發生一連串令美貞措手不及的安排，證明董事會在解散愛樂交響樂團是有周密部署的。董事長宣布解散樂團，改組為“愛藝基金會”，愛樂交響樂團從 1980 年元月起暫時中止，並對每

一位團員支付一個月到一個半月的遣散費。並立即對外宣布解散樂團的理由：

- 1) 爲我國音樂環境與歐美不同，演奏人員不易招募，流動性又大，以致影響樂團的正常發展，原訂的工作計劃無法一一實現；
- 2) 爲愛樂交響樂團關係企業集資成立，最近因部分企業高層負責人調動，對樂團之贊助和基金的運用有不同意見，而導致改組。

這兩條似是而非的理由，令美貞和所有團員都感覺到過于牽強，且不近情理。但從該財團角度審視，說明樂團的結束完全是考慮到財團內部本身的問題，而將責任推諉給美貞。而美貞單純的音樂家思維，根本無法理解社會上爾虞我詐的伎倆。

開完董事會的第二天，團員們仍一如既往地前往原來的排練場練習時，發現鋼琴已上了鎖。而美貞還很天真地要將樂團所有檔案及一應資料先移到她住所，以便整理好後移交，當然結果是可以預料的。原先由美貞負責的車輛也不再由她支配。由于事出突然，相當一部分團員認爲，這不僅僅對美貞是個極大的傷害，對所有的團員也很不公平。皆以爲該財團對創辦愛樂交響樂團一事沒有誠意，才會導致最後草率解散。

但爲了臺灣音樂事業的前途，何況相當一部分團員對樂團已有深厚感情，美貞仍然希望該財團能回心轉意而能有一綫轉機，於是聯名寫信給該負責人，請求他能改變初衷，但最終也沒有獲得答復。

她還親自為所有團員向該負責人說情并提出三個要求：因為團員和該財團仍然有合約關係，到九月才到期，於是她要求將阿波羅十三層的 64 坪公寓作為團員訓練場所，與此同時她向社會各界尋求支持成立新樂團，以便能將原有的團員轉移到新樂團中去。到九月份團員合同滿期後遷出；2) 將愛樂樂團所有樂器及樂譜贈送給新樂團；3) 按照合同，一至九月每月提供 45 萬新臺幣作為團員的薪水，總共為 450 萬新臺幣。

為團員們的前途，美貞沒有浪費時間，開始向各方面探討，希望能成立新樂團，為原班人馬找到繼續發展音樂才華的處所。遺憾的是她向該負責人提出的三個要求都被拒絕了。一些團員比喻如此龐大的商業王國，創辦一個樂團就好像擺地攤一樣，說收就收。

事實上在解散樂團之前，該財團董事會接二連三的動作，讓美貞很困惑。首先是和團員在簽訂合同時條文有欠公允。由於該財團缺乏對音樂了解的人員，所以在制訂合同內容時，合同中的措詞採用了如同聘任公司工作人員的標準，根本沒有視他們為音樂人士，不僅貽笑大方，也引起部分團員的不滿。如合同中最令團員反感的一條是：“如父母親喪事假，不得超過三天，否則算缺席一天，一年缺席四次即開除，開除後須交回薪水及付給團員訓練費。”為此部分團員要求修改合同內容。董事會安排負責樂團的先生也對外承認，他從六月份接任以來，完全不熟悉樂團的運作，是個十足的外行。

因該財團屬下有一保險公司，該公司對保險銷售人員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即銷售的保險金，當天必須上交公司，如隔日即被開除。祇是該財團將音樂人士看成保險銷售員，也難怪樂團成員會有反彈。

爲此，美貞向該財團提出修改合同內容的要求，當局同意在開過董事會後再商議修改合同事宜，不料在董事會開會時就將樂團給解散了。團員們都認爲如此龐大的機構作出這樣不入流的事，已經不是單純的遺憾了。

這份既外行又不合情理的合同，還是在美貞一再催促下，才于 1979 年的 12 月姗姗來遲。早在前一年九月份團員們的合同到期後，該財團始終沒有提續約的事。而美貞本人從一開始也就是該財團單方面的延聘，作爲終身指揮，雙方却一直沒有簽訂正式的合同。但美貞一直貫注音樂上的發展，而忽略了合同的重要性。即便如此，團員們在沒有續約的支持下，仍然專心一致勤于排練，誠心誠意爲十二月的音樂會作準備。

既然樂團被解散了，那麼作爲主辦方的該財團，理應履行已經簽訂的合同義務和責任。即便十二月印出來的新合同中存在許多不合理的條款，但一部分團員還是簽訂了。於是美貞要求該財團有義務將剩下的九個月薪水支付給團員也是天經地義之情。但是部分團員已經無心戀棧，領取了遣散費紛紛求去，導致美貞失去了和該財團談判的基礎。

與此同時，該財團向外散布消息稱，美貞早已向他們提出辭呈，她得知後除了反駁外，還出示律師爲她擬好的

合約稿，希望和該負責人簽訂正式的合約。但這份合約稿却一直沒有機會遞交給他，所以美貞是在沒有合同的現狀下，為該財團付出了無法估計的心血，而能表達的僅僅是‘失望’和‘痛心’，而能形容的則是“很糟糕！”

其實美貞和該財團最後走到分道揚鑣的地步，站在美貞的一面，她的失誤是，從一開始談判組織樂壇，到成立後的整個過程，事無巨細都由她自己出面直接和該財團談判商議。而美貞率直的個性，有可能在商談中已經得罪了對方都還不自知，還用自己的思維方式據理以爭，導致矛盾越陷越深而走向最後的決裂。美貞在國際上一向有自己的經紀人，安排演出日程，惟獨在臺灣她始終是直接出面。有可能她將臺灣看成是自己的祖國，和家人商談就不須假手他人了。

因為在和該財團產生矛盾的時候，就有人將美貞和演出邀請單位之間談判報酬的事向該財團告狀，認為美貞有索取額外酬勞之嫌。甚至用這區區小事作為攻擊美貞的理由，但這些打小報告的人士，一味使用中華民族傳統的‘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陳腐思維來貶低美貞。他們祇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缺乏國際音樂界運作的常識。殊不知國際上音樂家的演出，和用其他勞動力謀生一樣，都是按勞計酬的，而這些酬勞都由經紀人在演出前就已經談妥。何況自始至終美貞始終沒有和該財團簽署正式合約，究竟該財團給美貞支付多少報酬，至今已無從考查。但在那樣的條件下，即使美貞直接向邀請單位商議演出報酬也是名正言順的手段，何況她是一位名震國際的音

樂指揮家，按照國際規定支付她的報酬必須要和她的地位相匹配，說得通俗一點就是要由一定的價位，總不能處處給以公益性的演出。

問題是在臺灣，她的直接談判將她推向流言蜚語的風口浪尖，無形中就成了她的致命傷。這已不是‘遺憾’或‘不愉快’幾個字能形容美貞離開臺灣的決定，祇有她自己曾說過的：‘臺灣在她靈魂上烙下無法癒合的瘡疤！’才能完整地反映出她內心的傷痛。

她曾無可奈何地表白：“大家叫我要愛國，我就回來了，好不容易有個樂團，希望能好好地弄好，把年輕音樂家帶到某個水準，而且下一年度的計劃都訂好了，外國的音樂家也約好了。突然間什麼都沒有了，這怎麼說呢？”

她還感嘆：“我第一次有‘家’的感覺，如今家就沒了。這個曾經被視為是中華民國最有前途，最有潛力，最有希望的樂團團員聚會的場所，如今已是空空蕩蕩和我的苦笑。”她所說的這個家，並不意味一般世俗的概念，認為她尋找到了一個栖身之所，而是她朝思暮想的音樂殿堂，希望給臺灣打造一個堅實的音樂基礎。

雖然該財團給了她極為不公平的待遇，但是為了臺灣的音樂事業，何況臺北愛樂交響樂團正朝着健康發展的方向進行，美貞仍然以積極的態度表示：“任何事都會有困難，如果X先生有困難，他可以找我商量討論，找出解決的方法。如今這麼突然地決定解散樂團，對團員怎麼交待得過去呢？”

她無可奈何地表示：“錢，祇是錢而已。”這簡單不過的幾個字，道出了解散樂團的癥結。

終於在 1979 年 12 月 31 日，該負責人給美貞下了最後通牒，分別發出兩封函件，一封通知為 1978 年 6 月 12 日財團法人愛樂交響樂團簽署的委任契約書，因基金會宣布改組，契約書自 1979 年 12 月 31 日終止。同時解聘郭美貞的團長兼指揮的職務。另一封通知是請她收到函件後即日遷出阿波羅大廈，否則依法請求賠償。

這兩封通知，充分展現缺乏對一位國際知名指揮家的基本尊重，也反映出商界人士對音樂支持的誠意太過隨意，缺乏深層考慮。將音樂視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商品，誠然不知包括音樂在內的文化人士，從不計較經濟來源多寡的個性，并漠視了他們需要的精神鼓勵和支撐。

樂團的一位團員曾這樣表示：“成立一個樂團很難，解散却祇要一句話！愛樂成立以來雖然有點波折，但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也進行了一年多，輕言解散實在不是明智之舉！”

解散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的消息傳出後，音樂愛好者紛紛用電話和美貞聯系，希望能按期舉行她正在安排的下一場音樂會。有些熱心人士還提出將自己心愛的小提琴捐贈給團員，部分團員也捐出自己的收入，作為樂團的經費。排練場地被取消後，所有團員就到美貞的住所排練。後來該贊助機構要求美貞將提供的住所讓出來的消息也傳到大街小巷，錢復先生得悉後，也曾邀請美貞搬到他的公館去

住。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對美貞的打擊是致命的。她曾傷感地說：“如果你喜歡音樂，就要承受音樂帶給你的一切痛苦。”她也回想起好朋友事前給她的忠告，勸她不要到關係複雜的臺灣工作。美貞問道：究竟是他錯了，還是她自己錯了。得出的結論是，她沒有錯，因為她認為，“回到自己祖國，將自己所學奉獻于社會和國家總不會錯的”。事後美貞對該贊助人還表達了歉意，認為有些地方是她做得不對，在西方社會，如果自己真有錯，表達歉意是君子風度，然而給美貞贊助的機構負責人，對自己不合清理的所作所為，始終保持沉默，沒有向美貞表達過些微的安慰，更毋用有任何的歉意。充分反映出東方人死不認錯的傳統遺風。

為了使社會各界認為該財團突然解散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的正確性，他們拿出了中華民族傳統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手段，先是向外公布該財團為美貞提供了一千七百萬資金，開支過大，似乎整個的經費都被美貞給浪費掉了。對此美貞認為有必要反駁，列出了所有的經費去向：董事會使用了資金中的六百萬作為裝修辦公室費用，另外三百萬則用來購買阿波羅十三層的場地，雖然提供給美貞住宿和辦公用，但房產權是在該財團的手裏，所以下來的區區數百萬元，要為整個樂團添置樂器，樂譜等可以說是捉襟見肘，而一年來祇從該財團的撥款中支付團員薪水祇有四十萬，因為美貞舉行的十多次音樂會，票房所得解決了團員的生活所需。

接着該財團又辯稱投資樂團的決定過於倉促，這樣的解說顯然過於牽強，那麼整個樂團的成立并不是由美貞引起，而是該支持機構邀請美貞來進行的。更有甚者，在沒有核實求證的前提下，輕信外界的道聽途說和個別團員對美貞的怨言，批評她不懂指揮，而要團員聽唱片作為學習的方法。當這些怨言傳到該財團董事會成員的耳裏就予以采信。至少董事會應該邀約美貞，就外界的傳說和團員的抱怨作出公正的分析和了解。

要團員聽唱片是事實，如果認為美貞偷懶，那絕對是因為不了解美貞而產生的誤會。美貞在剛到羅馬那段時間，住在我的岳家，我妻子當時還祇是個青春少女，和美貞兩人情同姊妹。我們結婚後，妻子經常在我面前，對美貞的苦學精神贊不絕口，而且贊揚她是中國人裏面聰明絕頂不可多得的音樂指揮天才。她永遠不會忘記，美貞在她家，或是兩人在暑期去意大利北部卡爾達湖（Largo Garda）畔度假的時候，美貞每天都會在清晨四點起床，聽唱片或拿了一個小錄音機到湖邊，在那裏選一根樹枝，打開錄音機裏的音樂，隨着節拍舞動着那根樹枝。她就是這樣勤奮而堅定不移地摸索着指揮交響樂的技巧。她還對我妻子說，聽唱片或聽錄音練習指揮技巧，逼使你要細心去聽每個音符，是訓練自己耳朵對不同樂器和音頻的分辯，從而掌控整個樂團協調一致最好的方法。

她契而不捨的學習精神，引領着她走向成功的道路，這就是為什麼每次她指揮樂團的時候，當一個團員犯了細

微的錯誤，或是另一個團員自以為是拉出和其他樂器不協調的音符，都逃不過她那敏銳的聽力。

也正是長年的自我訓練所得到的成果，她毫無保留地傳授給那些年輕的團員，希望他們能成爲一個高水平的音樂家，但她的一片好心，反而遭到誤解。因爲在傳統的世俗教育系統裏，團員都以爲祇有在那揮動的指揮棒下，才能學到演奏的技巧，他們哪能理解，美貞給他們提供的教導方法，是千金難買的個人經驗。

美貞生前曾這樣說過：“一個藝匠僅僅滿足于自以為是的作品，而一個藝術家應該超越這樣的思維，在藝術的道路上展現真，善，美”。（An artisan is content with a fairly good performance. An artist goes beyond that. An artist shows the way for truty, perfection and betuty.”

就因爲她一生追求的是音樂中的完美，加上她人格裏的單純，理念的崇高，在世俗的臺灣，盡管她付出一切，却仍然遭受無情的冷漠，譏諷和嫉妒甚至詆毀。她可以將這一切都深埋在心底，因爲她愛的是這片土地，和生活在這土地上的音樂愛好者。她不必要在臺灣討任何生活的要求，祇要她願意，她可以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有取之不盡的來源。她僅僅是盼望能在臺灣有一個角落，能容納她爲祖國下一代奉獻。然而這個極其樸素而無私的願望，終于被世俗的社會所湮沒。

因爲雙方就阿波羅住處的爭執不下，最終鬧上法庭，其實美貞並沒有賴着不走的意圖，這也不是她做人的原則，祇是她認爲該財團的作爲有失風度，希望能公平辦

理。但是法律訴訟並沒有給美貞帶來希望，反而給她增添不少心靈上的負擔，一直到 1981 年 5 月 31 日判決她敗訴。該財團在二月份就已經將那層樓出售給臺灣享有盛譽的文化人士，當然美貞在遷出後就離開了臺灣。綜觀從欣喜創辦臺北愛交響樂團開始，到對簿公堂的遺憾結束，歸根結底是雙方思維的文化差異所導致。而不是一個誰對誰錯的單純評論。美貞出生在越南法國殖民時代，接受了法國教育的啓蒙，隨後長期生活在澳大利亞，她的舉止言行完全是西方的，因此她的思維方式，也就是西方的直言不諱。換言之就是率真，直爽，不善掩飾，更不懂察言觀色。而東方的文化是“面子”第一，爲了維持自身的面子，即便有錯，也要想方設法將一切的負面責任推諉給對方。

美貞和該財團的關係顯然處于一個劣勢一個優勢的懸殊地位。美貞專心于音樂，她要求的僅僅是對下一代的培養和發展，對於社會中的冷酷和奸詐全然不懂。因此在即使是非常細微的打擊，她都有無法承受的痛苦。而該財團既然是商業巨子，以利益爲出發點也是理所當然。支持文化事業祇不過是商業界作爲自我宣傳，提高知名度的手段而已。所以當文化活動影響到他們的財政收支時，解散或結束就是必然的結局。這在中外都是屢見不稀的現象。所以當該財團解散臺北愛樂交響樂團時，在他們的眼裏採取果斷手段是名正言順的，而對美貞和她的團員們就是無情的打擊。爲什麼美貞從一開始就沒有正式合同的簽署也就不足爲奇了。一邊是飽含感激的“依賴”，而另一面却是

商業界裏認為是合情合理的“利用”。這樣的合作關係，最後走上各奔東西的結局也就不足為奇了。

美貞在情緒低落的那段歲月裏，臺灣還是有人在支持她，1980年她前往臺中拜會了林洋港先生，臺灣省交響樂團有意聘請她擔任客座指揮，甚至考慮請她出掌交響樂團團長一職。鑒于和該財團的前車之鑒，省交響樂團也對此舉棋不定。當時擔任臺灣省主席的李登輝先生還親自過問，希望能請美貞留下，為臺灣省交響樂團出把力。美貞最初也接受了省交響樂團的聘請。然而當地音樂人士的度量及工作方式，和美貞的處事態度格格不入，雖然臺灣有識之士仍然認同美貞對臺灣音樂的貢獻。臺灣省音樂協進會于1981年4月5日在臺北中山堂舉行音樂界的時候，向十一位音樂界杰出人物頒發“音樂獎章”，其中包括馬思聰和郭美貞。此時的美貞已經感到，臺灣不是她長久之地。而在1982年，她雙親在澳大利亞因患大腸癌先後去世，更加速了她離開臺灣的步伐。

由于當時的通訊聯絡沒有現在如此便捷，她在臺灣的這段尷尬往事，直到她去世，我從未風聞，即使在和她聯系時她也從不提及。2013年7月我在澳大利亞她弟弟家裏整理她的遺物中，有一套臺灣僑務委員會贈送給美貞有關她在臺灣的新聞報道，時間從1964年跨越到2005年，共有一千多頁。我好奇地翻閱，才發現其中有很多對她和臺灣財團之間不愉快合作關係的報道。接着我又找到她在中央日報發表的文章。

看完後，我的第一反應是她的任性造成了這樣的合作

後果。2014年9月24日，臺北輔仁大學音樂系頒發郭美貞紀念獎學金的時候，前救國團主任李鐘桂博士應邀出席并致辭。因爲在美貞到臺灣後不久，李博士和美貞都膺選爲臺灣十大女青年的稱號。後來美貞率領臺灣青少年交響樂團訪問美國的時候，李博士也是負責人之一。所以她們之間也有過一段共事的淵源。李博士在致辭的時候，特地提到美貞的率真個性。當他們在美國訪問期間，美貞因爲和團員中的一位成員有不同意見而發生爭執。美貞立即展露出她的任性，將指揮棒一扔表示不指揮了。經過李博士的規勸并曉以大義和後果的嚴重性，美貞才平心靜氣地將指揮棒收回。

同年7月份我訪問菲律賓的時候，當地對美貞倍極關注的華僑，也很了解美貞的率真個性，但他們僅以幽默的口吻一筆帶過，而不妄加非議，這是海外僑胞待人接物的風度。他們認識到藝術家都有他們以理想主義爲主導的個性。他們連日常生活所需都無法安排得有條不紊，更妄論和重利輕義的社會交流。‘理想’和‘現實’是對立的兩面，在現實面前，理想的實現也就是‘蜀道上青天’了。從而出現了美貞的理想主義和財團的現實主義之間的憾恨！

無可諱言的是，任何的財團即使有億萬資產，也無法長期獨力支持一個龐大而衆所周知必然虧損的音樂團體。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交響樂團裏都設有一個專門爲籌募款項的支薪經理，他的工作就是每年爲交響樂團向社會各界籌募維系全團的經費，而籌募資金的計劃必須在事前提交

給董事會討論甚至修改後才能執行，所有籌募到的資金和稍後的支配都在年終報告時提交給董事會，并有政府部門的審計。大陸的音樂團體也在朝這個方向前行。惟獨臺灣似乎仍然循着老路在艱辛的發展。如享譽國際的長榮航空公司贊助一個龐大的交響樂團。長此以往，就極有可能重蹈美貞和當地財團合作破裂的覆轍，而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從 1983 年離開臺灣後，她繼續在海外各地指揮大型交響樂團，先後去了挪威，新加坡，和香港，并且在 1984 年飛赴南非應邀為南非大學舉辦的第二屆國際鋼琴大賽擔任國際裁判之一，受到與臺灣截然不同的待遇和歡迎。

一直到 1989 年她才再度回到臺灣停留兩周，期間曾希望拜訪該財團有關人士就一些私人財產及樂團的未盡事宜做個了斷，但是沒有得到正面答復。

1990 年臺北一群音樂愛好人士，以國際著名作曲家聖桑原作“動物狂歡節”改編的大型歌舞劇于 4 月 23 和 24 兩天在國家大劇院公演。由張中炎導演，曾明生編舞。新臺北管弦樂團擔任伴奏，邀請美貞指揮這三場演出。這也是郭美貞有生以來在臺灣的最後一場指揮。

她曾對人說：“我一生是以女人做男人的事，以中國人在做外國人的音樂”。其實她在國際音樂界裏做了許多連男人都無法完成的貢獻。由于她對臺灣的熱愛，遭遇了許多始料未及的誤會和中傷，她痛苦，傷心，悲哀。尤其是和該財團的合作後受到的絕情令她寒心，她不在乎生活上的待遇，但她計較一個商業機構用狹窄的心胸在她靈魂

上烙下無法磨滅的傷疤。還不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爲。臺灣，在她心中曾經過的‘祖國’，竟然最後成爲她心中的夢魘。

2013年，當我接到她弟弟從澳大利亞發來的噩耗後，我第一時間通知了臺北，希望有關部門給她舉行一臺追思彌撒。但結果是如她生前一樣的冷漠。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筆者在臺灣的好友和教會聯系的時候，得到的答復是舉行追思彌撒必須要死者的親屬申請。當臺灣好友將這一似是而非的道理告知時，筆者的反應是‘啼笑皆非’。

而在菲律賓馬尼拉，當美貞的好友許先生得到噩耗後，即自動安排于八月十三日，在他經營的保險公司大堂裏，爲美貞舉行了莊嚴的追思彌撒，來緬懷這位在音樂上有卓越貢獻的國際女指揮。

諷刺的是，臺灣和菲律賓兩位支持美貞的社會人士，都是商業巨子，在她心目中始終是祖國的臺灣，給于她的是無法忘却的痛苦和無法癒合的傷疤，而菲律賓却讓美貞選擇成爲她的第二故鄉。美貞生前每當在馬尼拉指揮音樂會時，許先生都會不遺餘力給以支持，讓美貞有賓至如歸的感受。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兩位商業巨子都是中國人，却給予我們兩個截然不同的人格表現。

就在該財團解散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社會上引起沸沸揚揚的正反兩面議論後不久，中央日報在1980年1月3日到5日的中央副刊上連續刊登了郭美貞的文章“放下指揮棒嗎？”這是一篇她的英文口述，由張淑惠和李念平負責翻譯成這篇文章。刊出後引起社會的震動。

遂即在 1 月 12 日，中央日報副刊上，出現了一篇署名李家撰寫的“‘放下指揮棒嗎？’讀後”短文，特先將原文附錄如下：

‘一篇文章能否感動讀者激起共鳴？不在它處理上的技巧而在 他的情真。郭美貞女士口述的‘放下指揮棒嗎？’平鋪直叙，沒有華麗的詞彙，也不見曲折的情節，却娓娓道出海外游子堅毅奮鬥的孤苦歷程。

我對郭美貞的了解，祇限于知道她是享譽國際樂壇的第一位中國女指揮家，其他，我就很陌生了。今天讀了她的文章，才曉得她非但有音樂長才，更令人敬佩的，該是她那腔對祖國忠愛的赤子之誠。

醉後方知酒濃，愛過才識情深。浪跡天涯的游子方能體會出孤寂滋味。郭美貞生于西貢，長于澳洲，活躍在義大利，二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使她對祖國的溫馨有迫切的渴盼，這份渴盼使她放棄了在義國辛勤努力扎下的基礎與垂手可得的深造機會，她向往祖國似慈母般的，親切展開雙臂，擁抱這不在身邊長大的孩子，給她更多的愛與關懷。所以夢寐中都看見自己向臺灣飛奔。

郭美貞的每一聲：‘我是中國人！’皆是那麼堅實有力，正義凜然。您瞧！‘在澳洲時無法拿到當地政府的留義獎學金，祇因為我是中國人，我有權向于大使抗議處理音樂獎學金不當，也就因為我是中國人。’這種不卑不亢的心理反映出留學生在異邦不平等待遇下對‘中國人’的權利的重視和珍惜。

第一次毛遂自薦代表中國參加比賽，經過幾番爭取，

政府接納了她，但并不熱烈；理由是她和所有中國人一樣，都可以代表中國，而不因為她在音樂上的表現。當然那時政府對她的陌生，是無法對任何未知的事實作任何肯定的。這場四十二人比賽的結果，得了十五名，成績雖非斐然，亦屬可佳，而自覺身負重任的郭美貞却語重心長的自我譴責：‘我愧對國家！’光宗耀祖的愛國情操躍然紙上，與那些受國家一手栽培而現今在海外搗毀我使館機構，高唱臺灣獨立，不顧國家命運的暴力份子，相形之下其情何等可貴。

再度參加的美國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賽中，郭美貞為中國奪到首獎，贏得殊榮。那天，她身穿中國旗袍，內心感到無比榮耀與興奮，因為：‘這一次是正正式式的由中華民國政府賦予我的特定代表權。’這份赤子心，就好像一株青青榕樹，當它有朝一日嶄露頭角時，總不忘炫耀它的根。

如今，郭美貞在祖國同胞的歡迎聲中回來了，償了她多年的宿願。她看到尚在萌芽的臺灣樂壇，立志要為祖國的音樂扎根；於是南來北往，發掘了多少天才讓中國的交響樂蓬勃起來，也帶動整個音樂界向前邁進。更令人興奮的是：商業鉅子蔡辰南先生自動斥資籌組愛樂交響樂團，有計劃長期地訓練培植人才。這是樂壇的一粒種子，這粒種子埋進泥中已經五百五十個晝夜，經過悉心的培養，孕育出一棵健康挺直的小樹，樹雖不高，但已有朵朵含苞的蓓蕾。眼見它發芽，成長，茁壯，最是開心播種者，如果此

時停止灌溉，讓那待放的蓓蕾枯萎，扼殺了希望，豈不十分可惜？

藝術本是一種性靈的享受，它使人們在其陶冶下保持人性的至真至善與至美，它具有綿久的歷史價值而非經濟價值，它是不折不扣的消費品，但是，西方先進國家已領悟到物質生活超越精神生活所造成的罪惡。對人類精神生活不遺餘力的加強，大企業家也本着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公義，拿出龐大的資金籌辦藝術體育活動；如美國政府對體育運動的提倡，日本民間繪畫市場的興旺，在在顯示精神文明已受到各國政府的鼓勵與民間財團的支持。在我國籃球和棒球運動已引發了工商企業界的興趣，音樂藝術方面，却還是一片有待開拓的荒漠，這位拓荒者，要排除多少困難才能走出一條小徑？尤其一位女子，想要攀頡成功的果實，其付出的心血又何止常人的十倍？

藝術家有她的執着，她追求的是完美，也許那是超現實的，以現代經濟眼光來看是不切需要的，但那就是藝術，醫護是可塑的，而藝術家是不可塑的，一位藝術家應該受到社會的尊重，因為她犧牲自己去美化人類的性靈，而一位愛國的藝術家更應該獲得祖國的關懷，社會的支持與同胞的敬愛，我們不願聽到愛樂就此奏出休止符，也不忍再聞那淒楚的流浪者之歌，我們期盼有遠見的企業家拿出經營企業的魄力來支持愛樂，我們要欣賞一曲真善美的大合奏，一支安和樂利的交響樂。”

接着在 1980 年 2 月 5 日同一報紙第四版出現了另一篇字字帶淚，句句含情署名‘保真’的文章：“中國的郭美

貞，不要走”，全文爲：

“在一月初的中副上，读到郭美贞小姐的自传式长文——‘放下指挥棒吗？’我读这篇文章时极为感动，也倍觉惊叹。我摺起报纸，仍然无法把文中的一句话排除在外：

‘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承受音乐带给你的一切痛苦。’

從郭小姐的文章中，我第一次了解她的出身背景，以及她在成名前後的奮鬥經過。

給我的深刻感想是：如果郭小姐真的離開臺灣，在情感上我們固有無比的惋惜；但從理智出發着想，又有誰能責怪她，批評她？國人有負于郭美貞，而郭美貞何嘗有負國人？

我說‘郭美貞何嘗有負國人’，這話一點也不誇張，也非濫情之詞。

在今天，‘中國人’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名詞，它的意義極其複雜，這種複雜是由于‘華人’已不再是‘中國人’的同義語。

郭小姐如同海外萬千的華人一樣，早已與遙遠的中國可以發生關係，也可以絲毫不發生關係。他們可能講一種中國方言，可能用筷子吃米飯，可能……但畢竟因另有一重身份可以狠下心說自己不是‘中國人’。這種現象之形成，是由于近百年來，中國始終處於長期的動亂和貧窮的環境中，中華民族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自然而然的有許多人離開

這片土地。這種現象是自然的，我們要承認它的實存性，更不應當以本位主義的眼光去看它。甚至在今天，每年仍有大批的中國人決定在‘中國人’和‘華人’兩種身份間選擇‘華人’，何況是那些一出身就是‘華人’的呢？

但究竟誰是‘中國人’呢？我試着爲它下定義，中國人乃是一種人，他對‘中國’有一份榮辱與共的情感，並且他與中國的命運是共同一致的。我所下的界定也許還不周全，也有待歷史的考驗。但我自信這個定義是嚴肅的，是顧及了今日的實在情形。我相信僅憑血統未足以證實是中國人。就如同用筷子吃米飯的人未必都是華人一樣。我在定義中強調‘與中國的命運是共同一致的’，我認爲這是極重要的。

郭小姐的偉大，既在於她毅然決定，從華人的身份回歸爲‘中國人’。以郭小姐在國際樂壇上的聲譽，做這種抉擇更不簡單，是需要極大的毅力和勇氣的。我并不崇洋輕土，但我相信在世界各地，想找一個比‘臺北愛樂’更具規模，水準更高的交響樂團，恐怕不下一百個之多，（熟悉世界樂壇動態的人可能會說何止一百個）。而在這一百個樂團當中，郭小姐即使僅爲稻梁謀，找一個指揮的‘差事’也是不難的。

她很可以留在國外，而國內的大眾傳播媒介還是會繼續報道她的事跡動態，贊揚她在海外‘爲國爭光’。但郭美貞就不再是中國的郭美貞了，而是“華裔指揮家 Miss Guo”。這世界上確有不少華裔人才，但負盛名的中國人可能不多。我們可能生出很多音樂神童，但未必能育成國

際聞名的音樂家。郭小姐‘回到人事關係復雜的臺灣’，指揮兼行政來組織樂團，我相信這真如她所說，是‘爲了祖國的下一代，爲了祖國的音樂前途’。我相信這也是紀政和楊傳廣的理想。要在自己國家的跑道上，訓練出破世界紀錄的運動選手。可惜這種精神和意願，却是不大容易被國人了解接納的。

也許這樣的限例實在不多——至少是與潮流相反的，所以我們并不敢相信郭美貞真會留下來。在中國人離開中國的時候，她——一位華人竟然回歸中國，太不可思議了。

在我們的想法中，郭小姐也許祇是蜻蜓點水式的轉一趟，然後又‘回’到澳洲，歐洲或美洲。隔一陣子報紙刊出海外通訊員的訪問稿，郭小姐禮貌客氣地說：‘祖國的音樂水準一年比一年進步。’僅如此，已够使我們滿足，安慰和陶醉的了。但令人詫異的，‘郭美貞回來了!’並且站在中國的土地上說：‘我要求五十餘位團員都要有杰出的表現，我們若無法成爲世界第一流的交響樂團，最少也應該做一個有水準有素養的樂團。環境愈艱困，我們成功的機會愈大。這必須我們大家刻苦，同心協力，攜手奮鬥。’

而國人給予她什麼?我實在不忍心細說。我祇能說，今天，我們這個富有的的社會，而竟然無法支持郭小姐指揮一個樂團。

這一切都是够諷刺的。

所以我說，國人有負于郭美貞，郭美貞無負國人。

我對音樂并不內行，亦不敢自詡爲本’樂迷’。但我

記得高三那年，某晚前往國父紀念館，欣賞李抱忱先生指揮的中國藝術歌曲演唱會，散場出來時正值傾盆大雨，我站在臺階上注視着那麼多音樂的愛好者涌出紀念館，在雨中也令我有無比的感動與激奮。我讀完郭小姐的長文，深覺我們實在沒有資格說什麼話挽留她。但我突然憶起國父紀念館那一幕，想到或許至少我們有足夠的熱情，誠懇地說：

中國的郭美貞，不要走。

郭小姐一定能體會，中國是屬於中國人的，一個熱愛中國的人，是無法不分擔，不承受因愛中國而產生的痛苦的。

六十九 (1980) 年一月廿五日

這兩份剪報和中央日報美貞的口述文章，是我從美貞的遺物中找到的，她將這幾篇文章妥善地保存着，足證美貞對臺灣感情之深，令人唏噓。

那時臺灣社會各界普遍認為該財團對郭美貞的背信，不僅反映出商界的市儈，也看出對藝術支持虎頭蛇尾的態度。一切是以利益為重，沒有利益，也就顧不得信義的敗落。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夭折的時候，美貞在 12 月 20 日對臺北聯合報記者這樣說：

“上帝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要为世人贡献自己—没有播种，那能发芽，成长！没有耕耘，那有收获？这与中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古语是相同的道理。”

她的人生哲學，和該財團的理念正好是南轅北轍。該財團的釜底抽薪也就不難理解了。但這都沒有令美貞感到挫折。她在三月份到南部去旅行散心，東勢地區七所中國小的二十多位音樂老師得悉美貞在南部的消息，臨時在和平鄉邀集了一個座談會，請美貞來講解合唱團的訓練方法，和有關音樂教育的問題。她自己感到這是在旅程中極有成效的額外收獲。她也感觸地表示：

**“理想不是伸手就可得的东西，而是要涉过千山万水，经过无数考验与挫折才能得到的。”**

從宗教中尋找心靈慰藉：

爲了在臺灣創辦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美貞投入了她全部心思和時間，在樂團被解散的打擊和疾病的雙重困擾下，她選擇了離開臺灣，先回到澳大利亞去。

幾乎所有凡選擇音樂或藝術作爲生命中的追求者，心靈是單純的，思維是超俗的。他們在追求音樂或藝術時，需要的僅僅是社會給他們以鼓勵和支撐。他們對金錢缺乏概念，對生活所需沒有恣意的要求。

然而他們的感情是極其脆弱的。因爲他們有無私的奉獻，也因此他們絲毫無法承受人類社會所給予的無情刺激和中傷，那對他們將是致命的沉重打擊。

她對臺灣那個來自不易的樂團寄托了無盡的厚望，目的很簡單，祇是爲臺灣創立一個能爲國際認可的樂團，然而當時給予她支持的財團突然的變臉，使美貞受到無法承受的伤害，如同跌入深淵，需要借助神的力量，使她能再

度攀升。然這難以治療的心靈創傷，她信奉多年的天主教似乎已無法助她給心底的謎團尋找答案。

她在臺灣處於最低潮的境遇中時，對他關心并認同她音樂造詣的人士仍然希望她能留在臺灣，為培養音樂人才繼續奉獻她的才幹。她也曾試圖在絕望痛苦深淵中重振，來癒合心靈中的創傷，為此她甚至在 1983 年到臺北近郊的汐止建造新居，準備繼續在臺北服務于有志音樂的青年人。等到落成的時候，發現還沒有入住的新房子竟然出現漏水的現象，此刻她真的感到心力交瘁，無意再去處理這些令她煩惱的生活瑣碎，乃離開了臺北。雖然後來再度踏上這個她留戀不捨的海島，但她對臺灣已經不存任何的依戀。

1990 年離開臺灣後，就沒有再回到那個曾經是她心中的‘祖國’，但她沒有放下指揮棒，仍然活躍在世界各地舞臺上展現她的才華。期間回到澳大利亞，試着在那個充滿大自然的安詳中，撫平因樂團被解散的打擊。在 1994 年被查出得了乳腺癌後，無形中又在她心靈上增添了一份因疾病帶來的困擾。美貞自幼即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是一位非常虔誠的教徒。在臺灣的遭遇和突如其來的醫生宣告，雖然沒有動搖伴隨她一生堅強的信心。但她的思潮裏如蜘蛛網似的被糾纏得理不出一個頭緒。

她兩個弟弟都在澳大利亞行醫，得悉姐姐罹患了凡人都會緊張而不安的絕癥，力主她接受現代醫學上被認為最有效的治療方法，那就是先接受手術，再用化療來穩固病情。但美貞拒絕了她們的建議。我在訪問澳大利亞時，和

她兩個弟弟談到這段爲她治病的經過時，他們對姐姐的固執很不以爲然，然而這都已經過去了。

她深知癌癥是不治之癥，即便接受了手術，即便接受了化療，最後仍然是走向死亡，而且死得非常痛苦。她回憶起父母在 1982 年先後因大腸癌在澳大利亞去世的過程，而不希望自己走同樣的路。她自幼就喜愛游泳和潛水，而過去二十多年來，曾經指揮過交響樂團的菲律賓擁有美麗的大自然和散布在海洋中的安寧小島，絕對能滿足她蕩漾在碧海藍天的環境，於是她決定前往菲律賓，嘗試着從大自然中獲取治療心靈和身體的疾病。

臺灣前行政院長俞鴻鈞先生的女兒，在菲律賓組成了家庭，她先生在當地金融界頗有影響力。得知美貞身患重病，於是給她安排在巴拉望群島中的公主島靜養。於是美貞怡然自得地陶衍在大自然中。

雖然有大自然相伴，却無法爲她打開心中的結，她需要更爲超越的力量來面對復雜的人生。她的摯友俞女士在當地創立了一個名爲‘內在平和基金會（Inner Peace Foundation），是在她家中聚會的一個精神團體，而俞女士本人也儼然是這個組織的精神領袖。這個組織是根據美國佛蘭希斯·柯爾博士（Dr. Francis Coll）所創導精神理論，尋找人類靈魂中的內在和平及自由。由于信徒日漸增多，俞女士在當地也就成爲淨化靈魂的精神領袖。美貞也參加了這個聚會，但並沒有爲她解決心靈上的苦惱。

不久通過有人的推介，美貞加入了美國一個名爲 Eckankar 的宗教組織在菲律賓的分支機構。總部設立在美

國明尼阿波裏斯州西南邊的明尼蘇達城查哈山 (Chanhassen) 鎮上。教會組織名稱的意思是“上帝的伙伴”，是對上帝的光與聲的信仰，也被形容為是“靈魂旅程的古老科學”。該宗教在 2011 年將它改為“上帝的光與聲的經驗”。

它最初是由一位名叫保羅·提特切爾 (Paul Twitchell) 于 1965 年在拉斯維加斯創立的一個宗教派別，被認為是新的宗教運動。後來遷移到加州。今天的明尼蘇達總部，是 1981 年哈羅特·克蘭普 (Harold Klemp) 繼承為教主後遷移過來的。瓦澤 (Wah Zee) 一詞是信徒們對他的精神稱呼，而他在教會裏的真正精神稱號是馬漢塔 (Mahanta)，換言之也就是教會裏的‘當家主’ (Living ECK Master)。宗教的主導原則是信徒們要對他們自己命運負責，而他們的決心就將決定他們的未來。理論上認為信徒們是“上帝的伙伴”。

這個宗教信仰‘夢’被認為是重要的指導工具，信徒們需要寫日記，從而用來學習。因為夢游是通向靈魂之旅的大門。所以教會每一位加入該教會的新會員，提供一本該組織印行的日記本。(The ECK Dream Diary)。我在澳大利亞的時候，從美貞的遺物中發現了她的日記本，徵得她弟弟的同意，我將日記本帶回到酒店，用一個晚上的時間讀了部分她寫的日記。從這本日記中了解到美貞最後歲月裏，通過夢來追憶和闡述她對社會的絕望和對生命的恐懼。滿以為在教會的鼓勵下，信徒們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通過上帝的光與聲。能決定自己的未來，所以 she 將自己的健康都依托給了對上體的祈求并期待夢中出現奇迹。

爲了進一步了解這個教會給予美貞的影響，我後來又給她弟弟發了郵件，希望他能將美貞的日記寄給我繼續閱讀，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這本日記。

爲了尋找心靈上的慰藉，她曾經到明尼蘇達的教會總部生活了一段時間。回到悉尼後她開始寫日記，在第一頁上端，她記錄着從查漢山回來後，先申請好了在悉尼 ECK 中心停車場的停車卡。這說明她從明尼蘇達回到澳大利亞後，仍然繼續和教會保持着密切聯系。

我在 2014 年 3 月份和妻子一同前往澳大利亞她弟弟家尋找有關她生前的資料時，在她小弟弟家晚餐，談到美貞加入到這個宗教組織時，兩個弟弟祇是無奈地搖頭說，那是一個邪教，我們祇是不理解，她怎麼會迷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簡直有些瘋了。然而從她的日記裏，不難看出，作爲國際上的知名女指揮家，她用一顆真誠的心去追求對人生的完美奉獻，其中沒有任何個人的世俗野心，當她始終如一地將臺灣看成自己的祖國時，却無從得到能施展她抱負的機會，甚至已經看到的希望却成爲泡沫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踪。

她失望了，在人生的環境裏，她一直用純真的態度去尋找夢想中的自我，得到的却是一連串的打擊和刺激，而且竟然發生在最熱愛的‘祖國’。於是她不僅傷心，更痛苦的是社會的冷酷無法讓她接受。於是她祇能到夢裏去追尋。她這本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日記是從 1996 年 5 月 4 日

開始寫的，一直記載到 2006 年 9 月 16 日。每一篇日記都記載着夢裏發生的情景。也可從她在夢的記錄裏，不止一次地反映出在現實生活中未能完成的音樂憧憬。

她在 1996 年 5 月 5 日寫道：“聆聽勃拉姆斯作品‘安魂彌撒曲’靈魂就出游了”。

可能是專心致志地沉迷在這個教會的宣教中，美貞在 5 月 10 日記錄下她的夢：

“梦见我的肉身和精神体分离开的不可思议的经验，我必须将它记录下来，只是不要忘掉而已”。

也许是接近母亲节，她在 5 月 14 日写下：

“梦见我和一位钢琴家一同面向乐团指挥演奏现代作品。

母亲握住我的手，我亲了她一下，意味着我们在寻找母爱……”

5 月 22 日她繼續寫道：

“我梦见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指挥一首曲子，听众看不到我，我的长礼服太小了，只是在做我想做的事”。

她對自己的病痛很擔憂，因此在 6 月 10 日記錄下：

“梦见我的肿瘤块很硬而且是正方形的，向上突出”。

6 月 21 日她記錄下夢裏的音樂會：

“我要指挥索思科维基作品第五号。没有指挥台，於是拿了个袋子想站在上面指挥，但是袋子是空的扁扁的，

所以我就将这空袋搁在装满了东西的袋子上 (手提袋), 就站在上面指挥”。

8月7日她記錄下一個有趣的夢:

“一位指挥要我指挥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将另一位女指挥的指挥棒交给了我。我没有时间准备, 但认为我能胜任。结果是我指挥演奏的是第三乐章, 而不是第一乐章。

节拍不是很清晰。六拍中断成两节, 实际上成了两个三拍。我没有时间去看乐谱, 我认为拍子太慢了。我用指挥棒在乐谱架上敲出较为清晰的节拍, 但是乐团根本不听。指挥棒随即裂成碎片”。

在以後的近十年中, 美貞所記錄的夢, 點點滴滴反映出她生命中所遭遇的不如意, 但又無法表達, 都在夢裏出現了。

她在記錄 2004 年 9 月 12 日的夢曾這樣寫道:

“我夢見在指揮中華民國的國歌, 我試着讓演出者有更杰出的表現”。

另外在 9 月 18 日對夢的描述是:

“我夢見正在和 ABC 樂團討論演出的四首樂曲, 其中包括 ‘三個橘子的故事’, 那位女節目負責人好像要我過去曾完成的一些東西”。

她在 2005 年 2 月 4 日寫道:

“我梦见在聆听老师和学生们，还有好几个室内乐团在不同房间里弹奏中国音乐。而我没有自己的乐团”。

回到澳大利亞不久，因在家不慎遭遇觸電，導致身體器官受到嚴重損傷，幾乎無法再從事指揮生涯，不久後又被檢查出乳腺癌的癥狀，可以想像她心靈上的壓力和痛苦，即便如此她還是拒絕了兩個弟弟的建議接受現代醫療醫治，却選擇了自然療法。甚至去夢中尋求人生答案。她從小就喜愛運動，舉凡騎馬，游泳潛水她都愛不釋手。所以她決定搬遷到菲律賓巴拉望附近的一個公主小島，生活在大自然裏，可以滿足她游泳潛水的愛好，也借此來鍛煉健康并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最終她還是回到澳大利亞去接受髖骨的手術，那是 2013 年的 2 月，也從此沒有再回到菲律賓。

## 郭美贞指挥的音乐会

綜觀美貞一生在世界各地所指揮過的音樂會，幾乎遍蓋世界五大洲，筆者從她留下的遺物中，以及後來到馬尼拉和她生前接觸過的好友和音樂界的溝通中，獲得不少珍貴資料，雖然經過整理梳理出一幅很清晰構圖，仍難免會出現謬錯，而且由于時間的流逝，很多她曾指揮過的音樂會記錄已無從查找，如她在新加坡，德國，挪威等國家的活動，雖然筆者努力和這些部門取得聯系，始終未能如願以償。還有美貞在美國，澳大利亞及臺灣等國家地區，為青年學生指揮過多場音樂會，也因為沒有記錄祇能在這裏一筆帶過。

盡管如此，美貞一生在音樂指揮事業上的成得到了國際樂團的公認，尤其在西方國家的音樂界，給予她的是一致的正面推崇。從她年僅二十歲，在地球上的南半球，第一次站在悉尼音樂廳的指揮臺上，指揮悉尼交響樂團開始，她以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女性指揮家，並且是第一個亞洲女性指揮家，以自己的奮鬥努力，開啓了以後四十年的指揮生涯，指揮了無數國際著名的交響樂團。

她震驚并徵服了國際樂壇，完成了她畢生從事音樂的夙願，也為亞洲女性奠定了國際音樂指揮的地位。更為中華民族在國際樂壇上爭得光輝的一席之地。自她在 1967 年

獲得國際榮譽後，迄今為止還沒有另一個中華女性，站上和她能并駕齊驅的國際樂壇地位，美貞作為‘空前’的國際音樂女指揮家是當之無愧的，但筆者憂慮的是，她又是否會成為國際樂壇上亞洲女性指揮家的‘絕後’呢？

1958年，美貞在澳大利亞悉尼參加國際指揮比賽，參賽者有來自英國，西班牙和新西蘭等四十多位18歲到28歲的青年指揮，她在比賽中的杰出指揮，得到了裁判的一致讚賞而獲得勝利。那時她才十八歲。在比賽中是年齡最小的。

1960年8月27日墨爾本的西澳新聞報首次在第17頁刊登一篇題為“girl as maestro”（大師般的小姑娘）的報道，讚揚美貞小小年紀站上了職業舞臺。

1960年9月19，20，21日 - 悉尼交響樂團舉辦ABC青年音樂活動，20歲的郭美貞是第一個學生首次在澳大利亞悉尼指揮悉尼交響樂團，指揮的樂曲是“三個橘子的愛”，鋼琴獨奏為美國鋼琴家 Grant Johannesen。

這是老師尼古拉·馬可特地為她安排的音樂會，是她生命中第一次指揮正式的交響樂團，而且是第一位女性指揮家在指揮澳大利亞的職業交響樂團。接着馬可先生和她共同指揮了其他的五場音樂會，開啓了她的指揮生涯。

Malko 和學生同臺登場後對郭美貞的評價是：“她和悉尼交響樂團一同登臺將會引起極大的關注”（“Her appearance with the Sydney Symphony Orchestra should be of great interest”。）

1961年8月19日，由世界難民年澳大利亞國家委員會（The Australia National Committee World Refugee Year）贊助在悉尼市 Ultimo 區 Turner Hall (Harris Street) 舉辦香港難民上訴音樂會（Hong Kong Refugee Appeal Concert），美貞擔任指揮。

1964 - 前往意大利西西裏島達奧明娜城獲得全額獎學金，在 Carlo Zecchi 及 Sir John Barbirolli 兩位世界著名指揮家教導下，獲得非凡的成就，特地安排她指揮西西裏島的交響樂團（Sinfonica Siciliana）

因為她的杰出指揮才能獲得兩位指揮家的贊賞，并推薦她

參加在紐約舉行的 1964 年德密特裏·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比賽 (1964 Dmitri Mitropoulos Competition for Conductor)，但僅進入半決賽。

1965 年春天，在老師巴托洛裏爵士的極力推薦，她前往丹麥參加當地指揮比賽，雖然沒有入圍，却膺選為十大杰出青年指揮。

1965 年 11 月，郭美貞首度訪問臺灣，24 日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了訪問臺灣的第一場音樂會，指揮國防部管樂團演出，這場音樂會是為紀念國父孫中山百年誕辰而舉行的。

（中山堂图片）

27日應臺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戴粹倫團長的邀請，在國際學捨指揮該團，排出的曲目有孟德爾遜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海頓的倫敦交響曲，貝多芬的愛格蒙特序曲，和韋伯的奧伯隆序曲，由到訪的小提琴家奧烈夫斯基擔任小提琴獨奏。接下來在30日應臺北市交響樂團的邀請，在國際學捨舉行了一場音樂會。

1966年2月23日－應韓國東亞日報邀請，前往漢城在漢城國民廳指揮漢城交響樂團。

1966年3月1日－從漢城抵達東京，3月6日為日本讀賣新聞交響樂團指揮一場。

1966年－美貞第一次應邀出席在美國密西根州英特洛根城(Interlochen)舉行的音樂夏令營。1969年再度被邀請。到1978年不僅被邀請出席第四十屆國家音樂夏令營，並擔任客座指揮，於7月16日指揮了一場擁有一百十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成員所組成的世界青年交響樂團，得到全場起立歡呼，並創造了五次謝幕的記錄。

這個活動是由美國音樂教育家約瑟夫·馬迪博士(Dr. Joseph Maddy 1891-1966)創立，每年全國各地自小學到高中及大學的青少年都積極參與活動中開設的各種課程和演出。至今美國大專院校及中學有數以萬計的各種音樂團體，直接受到該活動的影響。這也符合美貞一生中培養青少年音樂人才的理念，並成為美貞在1978年籌組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的動力。

1966 - 10 月 4 日，美國休斯敦紀事報（Houston Chronical）發布郭美貞指揮 One Dollar Symphony 的音樂會消息。

1967 再次參加德密特裏·密特羅波洛斯國際青年指揮比賽（Dmitri Mitropoulos Competition for Conductor）獲得金獎。即獲得音樂家伯恩斯坦的聘請擔任助理指揮，首先在林肯中心指揮了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又相繼在首都華盛頓肯尼迪中心指揮華盛頓國家交響樂團，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指揮美國交響樂團，舊金山歌劇院指揮舊金山交響樂團。

1967 - 1 月 20 日紐約 World Journal Tribune 發布了郭美貞獲獎的消息。

1967 年 1 月 23 日 - 在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大廳，指揮該樂團。

1967 - 1 月 25 日美國從紐約到愛荷華逾四十家報刊發布了美聯社有關郭美貞在紐約獲得國際青年指揮金獎的報道，並配有她和伯恩斯坦的合照。

### (郭美貞和伯恩斯坦的合照)

1967 年 2 月，應臺北市市長高玉樹之請，美貞從紐約飛赴休斯頓，參加臺北和休斯頓姐妹城市的活動。在休斯頓大公園露天音樂會指揮休斯頓交響樂團演出，並和其老

師約翰。巴比洛利爵士等同臺指揮，獲得極大成功。爲此 2 月 4 日美國休斯頓的報刊特別報道喻郭美貞爲 “The Lady with the fiery Baton” 。她并在當地國際音樂指揮比賽中獲得第一名。

1967 - 6 月 11 日由韓國東亞日報 (Dong-A Ilbo) 邀請在漢城市大會堂指揮 漢城愛樂交響樂團 ( The Seoul Philharmonic Orchestra)，韓國小提琴家姜東錫爲第一小提琴。

### (郭美贞在韩国指挥演出时图片)

1967 年 5 月 27 日 - 應日本讀賣新聞邀請，在東京上野文化會堂爲讀賣新聞交響樂團舉行首場指揮，并開始在日本十六個城市作十八場巡回演出，同時和日本 NHK 及讀賣新聞交響樂團合作。

1967 年 8 月 16 日 - 在東京上野文化會堂指揮讀賣新聞交響樂團，爲日本巡回演出的壓軸。

### ( 郭美贞在日本指挥时照片 )

1967 - 10 月 20 日應拉丁美洲國家哥倫比亞交響樂團邀請，代表伯恩斯坦前往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哥倫布劇院指揮國立交響樂團，哥倫比亞總統女公子教育部長等出

席。演出節目包括：韋伯的“奧伯龍序曲”，海登的“第一百零四號交響曲”，貝多芬的“第四段交響曲”和李斯特的“序曲”。是迄今為止唯一在南美洲指揮交響樂團的亞洲女指揮家。

1968年9月應菲律賓華僑界邀請，于9月抵達馬尼拉，先後在9月12，14及15日，在菲華人壽保險公司大禮堂指揮了馬尼拉交響樂團三場演出。這是為當地僑界因災害而舉辦的慈善演出。

1969年 - 9月26日，應菲律賓總統夫人伊美爾達·馬可斯邀請，率領臺灣華美青少年管弦樂團訪問馬尼拉，為當地文化中心開幕舉行的音樂會。在演出第三場時，總統夫人帶了三個孩子出席，并于音樂會後，向郭美貞贈送她的親筆簽名照片。她先後二十多次被邀請到菲律賓指揮馬尼拉交響樂團并于1974年應聘為該交響樂團音樂總監。

1969 - 4月28日在澳大利亞指揮 Tasmanian Orchestra Concert

(Tasmanian Concert program)

1969 - 應澳大利亞廣播委員會邀請，為悉尼1969年青年音樂會擔任指揮系列音樂會：

4月9日指揮西澳大利亞交響樂團

4月22日在墨爾本指揮全澳國家廣播公司樂團

5月8日在悉尼指揮澳國青年管弦樂團

1969年8月14日 - 在前往馬尼拉作友好訪問前，在臺北陽明山華興育幼院舉行一場臨別演出，蔣介石總統夫婦親臨觀賞。

1969年9月 - 應菲律賓總統夫人伊美爾達·馬可斯邀請，美貞率領臺灣的青少年管弦樂團，前往馬尼拉，為總統夫人主持的菲律賓文化中心舉行開幕式演出，並先後指揮演出六場。

1970年 - 美貞應邀前往馬尼拉，先後在3月13及15日，4月10日及12日和5月8日及10日，為馬尼拉交響樂團總共指揮六場。後來在6月再度增加三場指揮演出。

1970年11月30日 - 受韓國京鄉新聞社邀請，在漢城市民館，指揮國立韓國交響樂團。

1971年 - 日本NHK交響樂團訪問臺灣，一共演出四場，美貞應邀指揮了其中的第三場。

1971年2月20日抵達馬尼拉，展開在菲律賓南部巴克洛城市的巡回指揮演出。

1971年 - 為推動青少年音樂教育，她在澳大利亞悉尼市近郊衛星城庫琳卡成立了當地愛樂交響樂團，這個樂團迄今仍然蓬勃地開展青少年音樂教育活動。

1972 - 5月31日再度在澳大利亞指揮 Tasmanian Orchestra Concert。

1973 - 應法國外交部邀請，前往作兩個月的訪問。第一個節目是8月21-25日為法國斯特拉思堡由96位團員組成的電視廣播室內交響樂團指揮；第二個節目是指揮法國巴黎七十號交響樂團的演奏，和李爾電臺交響樂團。先

後指揮了六個交響樂團。成爲第一位指揮法國無線電臺室內管弦樂團的女性指揮。

1973年11月13日 - 在菲律賓爲馬尼拉交響樂團指揮一場演出。

1974年8月30日及9月27日，在馬尼拉文化中心，爲馬尼拉交響樂團指揮了兩場演出。

1975年6月14日在法國指揮 3e Festival du Jeune Soliste, 1976年 - 在臺灣教育部支持下，美貞組織華美青少年室內樂團，前往美國參加開國兩百周年活動，先後在十八個州指揮了二十六場音樂會。

1976 - 11月10日應香港亞洲藝術節邀請在香港大會堂爲鄉幹部管弦樂團指揮 (演出節目包括: 西藏風光組曲和香港節組曲)。她在香港生活了三年，爲香港愛樂交響樂團在香港大會堂指揮五十六場系列音樂會，并擔任該樂團的音樂總監。

### ( 香港爱乐交响乐团提供图片 )

1976-1977 - 應美國鳳凰城邀請,爲1977年3月14-15兩天在鳳凰城交響樂團音樂大廳爲鳳凰交響樂團 (Phoenix Symphony Orchestra) 音樂會擔任指揮。

1978年 - 在臺灣創辦臺北市交響樂團，于1979年3月在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行首場音樂會，在以後的一年中，每個月舉行一場，共舉行了十餘場音樂會。

1982, 1984 和 1986 - 應南非洲邀請擔任 三屆波雷托利亞國際音樂比賽 (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Pretoria)國際裁判。

### (担任裁判音乐会说明书)

1983 - 2 月 4, 5 日 在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 ( Victoria Concert Hall) 指揮 新加坡交響樂團第一系列音樂會 ( The Concerts of the Singapore Orchestra) (First Series)

1983 年 - 美貞在澳大利亞指揮了一場有四千觀眾的聖誕音樂會。由她指揮四千人共同演唱韓德爾作品‘彌賽亞’，音樂會被命名為‘你自己唱彌賽亞’，創下了世界上演唱這個作品人數最多的一場音樂會。

1984 - 3 月 23, 27 指揮維洛交響樂團 ( Willoughey Symphony Orchestra) 1984 系列演出首場。

1986 - 7 月 11 日指揮悉尼大學本勒朗管弦樂團 ( Bennelong Winds and Brass Ensemble ) 演出。

1989- 5 月 28 日在悉尼市政大廳指揮演出。

1991 年 - 應邀在馬尼拉 MET 劇院上演以日本天皇為背景的歌劇，由馬尼拉交響樂團擔任伴奏，美貞指揮。

2007 年 4 月 22 日 - 闊別菲律賓近十六年後美貞重返舊地，在菲律賓馬尼拉聖.史科拉斯蒂卡音樂學院 ( St. Scholastica’ s College)的聖.契齊利亞音樂廳 (St. Cecilia’ s Hall) 指揮馬尼拉交響樂團演出。是晚定名為葛立埃音樂之夜，由許文哲先生的夫人許林韻文擔任鋼琴獨奏。

### (音乐会图片)

2007年4月26日 – 在菲律賓馬尼拉文化中心指揮馬尼拉交響樂團演出。是晚的演出前，美貞指揮全團演奏菲律賓國歌，其認真和全神投入的指揮，表現出來的民族文化韵味，令在場全體觀眾動容。

2007年9月5日在菲律賓巴科洛市(Bacolod City) 聖.拉.莎爾大學 (University of St. La Salle) 的聖.拉.莎爾教堂 (Santuario de St. La Salle) 指揮馬尼拉交響樂團演出。

### (马尼拉音乐学院音乐厅图片)

2007年9月6日及7日在菲律賓杜馬奎迪市 (Dumaguete City)的西利曼大學(Siliman University) 的露西音樂廳 (Luce Auditorium)指揮馬尼拉交響樂團演出。

2008年5月25日在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 (Victoria Concert Hall) 指揮波拉德高地交響樂團 (Braddell Height Symphony Orchestra),演出修曼作品，故稱之為修曼音樂會。

2008年9月27日在菲律賓帕西葛市 (Pasig City)奧爾狄卡中心 (Ortigas Centre)的梅拉爾多劇院 (Menaldo Theatre) 指揮菲律賓愛樂交響樂團演出，是為修曼作品之夜，由許文哲先生夫人許林韻如女士鋼琴獨奏，他們年僅14歲的女兒 Caitlin Coyiuto 擔任豎笛獨奏。這是一場為紀念許先生

先翁許有道的 85 誕辰郭美貞生命中指揮的最後一場音樂會。

( 最后一场音乐会照片 )

在這場音樂會之前，馬尼拉正在上演“波西米亞人”歌劇，由馬尼拉交響樂團伴奏，美貞指揮了這場歌劇的演出，也是她一生中指揮的最後一場歌劇。

在她多彩多姿的音樂生命中，曾和多位世界著名的鋼琴家或小提琴家合作過，在演奏會中擔任獨奏，筆者獲得資料中，清晰地記載着他們的姓名：

Daniel Adni

Paul Baduraskoda

Siegfried Behrend

Robert-Alexander Bohnke

Pina Carmirelli

Kyung-Hwa Chung

Kyoko Edo

Toshiya Eto

Endre Granat

Philipp Hirshhorn

Ulf Hoelscher

Stephen Kates

Jan Henrik Kayser  
Wolfram Konig  
Liu Hui-ying  
Takako Nishizaki  
Igor Oistrach  
Itzhak Perlman  
Michael Ponti  
Michael Roll  
Nathaniel Rosen  
Elinor Ross,  
Semyon Snitkovski  
Robert Szidon  
Erik Tawastjerna  
Roger Woodward  
George Zukerman

她指揮過的世界著名音樂作品應該超過百部，特點是  
很多時候她在指揮的時候不需要看樂譜，憑借她驚人的記  
憶力，使她在  
指揮的時候專心致志，將自己融入到音樂的境界裏，同時  
將作品  
的精神和意境直接傳送給每一位聽眾的心中。

這些作品大致可分復調音樂風格作品，音樂序曲，簡  
短作品，交響樂，管弦樂音樂會作品，其他作品等幾大部

分。要了解美貞在音樂指揮上的精湛造詣，就不能忽視她在作品選擇上的嚴謹態度，許多她選擇的作品對指揮的技巧要求極高，而她能運用自如地表現出作品的本質，稱呼她為上世紀偉大的女指揮家，一點都不為過。

下列就是美貞曾指揮過的世界著名音樂作品：

1) 復調音樂風格作品:

Bach: Brandenburg Concerti Nos. 1,2,3,4, & 5

Suite for Flute and Strings in B Minor

Concerto for Violin in A Minor

Concerto for 2 Violins in A Major

3 Violins

Handel: Concerto Grosso Op. 6 No.

Vivaldi: The Four Seasons

Concerto for two Violins in A Major

2) 序曲作品:

Beethoven: Egmont, Fidelio, Coriolan

Leonora No. 3

Berlioz: The Roman Carnival

Brahms: Academic Festival Overture

Mendelssohn: Fingal's Cave

Mozart: Magic Flute

Rimsky-Korsakov: Russian-Easter Overture

Rossini: William Tell

Barber of Seville

The Thieving Magpie

Italian in Algiers  
Semiramide  
Schubert: Overture in D Major  
Rosemunde  
Schumann: Genoveva  
Tchaikowsky: Romeo and Juliet  
Wagner: Tanhauser  
Mastersingers  
Flying Dutchman  
Weber: Oberon, Euryanthe, Der Freischutz

3) 簡短作品:

Aaron Copland: El Salon Mexico  
Barber: Adagio for Strings  
Borodin: In the Steppes of Central Asia  
Debussy: Afternoon of a Faun  
Enesco: Roumanian Rhapsody No. 1  
Grieg: Peer Gynt Suite No. 1 Holberg Suite (For strings)  
Josef Suk: Serenade Suite for Strings  
Liszt: Les Preludes,  
Orpheus  
Mozart: Divertimento No. 1,2,3, K136  
Moussorgsky: Night on a Bold Mountain  
Prokofiev: Love of Three Oranges (Concert Suite)  
Richard Strauss: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Don Juan

Burleske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Saint-Saens: Carnival of the Animals

Smetana: Moldau

Peter Warlock: Capriol Suite for Strings

4) 交響樂:

Beethoven: Symphonies Nos. 1,2,3,4,5,6,7, 8 & 9

Berlioz: Symphonie Fantastique

Brahms: Symphonies Nos. 1,2,3 & 4

Britten: Simple Symphony

Dvorak: Symphonies Nos. 7, 8 & 9

Franck: Symphony in D Minor

Haydn: London

La Poule

La Reine

Mendelssohn: Symphony No. 3 & No. 4

Mozart: Haffner, Prague, Linz, No. 39 Little A

Major,

G Minor No. 40

Schubert: Unfinished

Symphony No. 5 & No. 7

Schumann: Symphonies Nos. 2,3 & 4

Shostakovich: Symphony No. 5

Sibelius: Symphony No. 2

Tchaikowsky: Symphonies No. 4, 5 & 6

5) 其他主要作品:

Leonard Bertstein: Mass

Edgar: Enigma Variations

Hindemith: Symphonic Metamorphoses on themes by  
Weber

Moussorgsky: Pictures from an Exhibition (orchestrated  
by Ravel)

Mozart: Coronation Mass

Carl Orff: Carmina Burana

Rimsky-Korsakov: Symphony Suite Scheherazade

6) 管弦樂音樂會:

Beethoven: Violin Concerto

Piano Concerto 3, 4, & 5

Triple concerto

Brahms: Violin Concerto

Piano Concerto No. 2

Double Concerto

Chopin: Piano Concerto No 1 & 2

Dvorak: Cello Concerto

Haydn: Violin Concerto in D

Cello Concerto in D Major

Piano Concerto in D.  
 Trumpet Concerto  
 Ibert: Flute Concerto  
 Khachaturian: Violin Concerto  
 Lalo: Symphonie Espagnole  
 Liszt: Totentanz  
     Piano Concerto No. 1  
 Marcello–Bonelli: Oboe Concerto in C Major  
 Mendelssohn: Violin Concerto  
     Piano Concerto No. 1  
 Mozart: Violin Concertos Nos. 3, 4, & 5  
     Flute and Harp Concerto  
     French Horn Concerto No. 1 & 3  
     2 Piano Concerto K365  
     Piano Concertos in D Minor, in C Major in  
 A Major and  
     in E-flat Major K271, No. 28, No. 10 K265  
     Clarinet Concerto in A Major  
     Trumpet Concerto  
 Poulenc: 2 Piano Concerto  
 Prokofiev: Piano Concerto No. 1 & 3  
 Rachmaninov: Piano Concerto No. 2  
     Rhapsody on a Theme of Paganini  
 Ravel: Left Hand Concerto  
 Schumann: Piano Concerto

Saint-Saens: Piano Concerto No. 2

Cello Concerto

Sibelius: Violin Concerto

Tchaikowsky: Violin Concerto

Rococo Variations for Cello

Piano Concerto No. 1

在她足迹所到之處，無不給予最高的禮遇，媒體也都是給以正面的評價，並一致公認她打破了以男性為主的樂壇指揮地位。

美貞的自白：

当我在澳大利亚从她遗物中发现这篇中央日报连载了三天的文章时，我如获至宝地带回到酒店，并一口气读完。从这篇文章中我开始了解到她在台湾的遭遇所带给她的痛苦。为此我彻夜未眠。它令我思考虽然已经时隔近半个世纪，我不禁反问自己，而且带有几分自责，究竟我在 1950 年极力恳请于斌总主教和于竣吉大使协助美贞访问台湾的做法是否错了？假如她没有台湾之行，也许就不会出现 1950 年的那段不愉快，导致她伤心地离开台湾。

在该文章中美贞曾提到，她在海外的朋友不赞成她接受在台湾发展事业，原因是台湾的社会关系复杂，但更主要的是美贞的率直倔强任性而不妥协的个性，是台湾社会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其实从后来她在国际乐团上的成就来看，台湾在她音乐事业中并没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和影响

力。只是她受到家庭的影响，对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民族情结，但谁又能预料到，这民族情结最后竟然是她为之决裂的导火线。

我前思后想，结论是谁都没有错；我极力推荐她去台湾是正确的，她带着热烈的民族感情去台湾也是对的，台湾财团支持她组建交响乐团出发点也是正面的。错就在于彼此的思维方式有着差之千里的矛盾，台湾社会在美贞和财团间发生矛盾后，没有对一个国际知名的女性音乐指挥给以包容和爱护，却用社会新闻以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方式来描绘所发生的一切。折射出台湾狭窄的气度而无法容纳一个国际知名人物。我没有为美贞抱屈，却为台湾失去了一次拥有这百年一遇的国际知名音乐人物的难得机会而感到遗憾。

臺灣中央日報於 1980 年 1 月 3, 4, 5 日連續三天，在中央副刊第四版刊登了郭美貞的口述文章 “放下指揮棒嗎？” 該文由張淑惠和李念平記錄整理。這篇口述文章基本上闡述了郭美貞在越南西貢出生，稍後接受了母親的親自教誨學習鋼琴，到負笈澳大利亞，在自我鞭策，努力刻苦學習，獲得國際名師栽培，克服困難最終登上國際指揮舞臺，成爲二十世紀國際上杰出的知名女指揮家。但她從沒有爲自己而沽名釣譽，却將臺灣當成自己的家園和祖國，從第一天到臺灣，以至後來爲臺灣發展交響樂團，其中的艱辛和委屈，都因爲她的赤子之心轉而成爲她奮鬥的動力。她對臺灣有失望，有灰心，但没有抱怨，没有責備。

祇是以平常心態對待一切加諸于她心靈上的打擊和不公平。她最後回到僑居地澳大利亞，但她沒有放下指揮棒。這就是她的心聲。

# 放下指揮棒嗎？

郭美貞

在有仇恨的地方，讓我播撒愛情  
在有罪過的地方，讓我播撒寬恕  
在有懷疑的地方，讓我播撒信心  
在有失望的地方，讓我播撒希望

——摘自聖方濟和平禱詞

放下指揮棒嗎？

不，我不會放下這已溶入了我全部生命的指揮棒。

十五年前，當我第一次回到自由祖國，在同胞熱情的鼓舞下，指揮了國防部示範樂隊，省市交響樂團，我就願望有一天能在國內為祖國的音樂獻身，使祖國的交響樂團逐漸提高水平。直到去年六月，終於在國泰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蔡辰南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臺北愛樂交響樂團，並聘我為指揮兼團長，給了我一個實現夙願的機會。我和五十餘位團員們，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自今年三月起的十個月之內，共舉辦了十二場公開演奏會。我們正為演奏水準日益提升而高興時，國泰突然宣布將臺北愛樂交響樂團解散了。

有人問我：“你是否因而灰心，從此放下你的指揮棒呢？”

我斬釘截鐵的答道：

“不，我不會放下我的指揮棒！”

“你是否打算現在離開這裏，再到國外去呢？”

“不，我不能因為我現在的離去，讓團員們更加傷心。”

我是中國人！

我于一九四零年七月四日出生于越南西貢。父親是廣東人，母親是福建人。他們時時告訴我，‘你是中國人’。

我們在西貢有一棟大房子，有一個大院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人回到西貢，先強迫我們讓給他們居住，祇準我們全家包括兩個弟弟五口人，在院邊搭蓋一間小屋藏身。

那時我祇五歲，父母告訴我們姐弟：

“我們是中國人，祇有中國強大了，外國人才不敢欺侮我們。”

母親愛好音樂，自幼就願望成爲一位鋼琴家。但外祖父去世太早，家境困難，她祇做了一位幼稚園老師。後來母親將她未實現的理想寄托于我，讓我一生下來就接觸音樂，培養我的興趣。她發現我有音樂的秉賦，就希望我能真正成爲一個音樂家。她告誡我，鼓勵我。她說：

“你是一個女孩子，在不重視女人的中國社會裏，想要出人頭地，非常困難，除非你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全力以赴。”她又說：“你是一個中國人，如果不特別努力，外國人將會看不起你。”

我十歲的時候，父親遇到一位好心的外國太太安妮麥克道娜女士，建議我遠赴澳洲雪梨去就讀有‘音樂家搖籃’之稱的布麗吉丹學校，她在澳洲的姐姐和姐夫可以做我的監護人。母親決定陪我去，三個月後，她再回越南。在啓程前一天，舅舅開了一輛敞車帶我穿越叢林玩，忽然一條小蛇從樹上掉到我的右手上，咬了我的小手指。我忍着痛，不敢呼叫，怕讓舅舅知道，因而毀掉了我去澳洲學音樂的機會。回到家裏，我偷偷的用酒精搽拭紅腫的傷口。以後長大了才知道，幸而那不是一條毒蛇，否則，不僅毀掉了我去澳洲的機會，也毀掉了我的生命。

我在布麗吉丹讀了五年，由開始不懂英語，到純熟了英語。那是一所教會學校，修女管教嚴格，但充滿愛心，塑造了我以後對人處事的模式。

我是第一個中國學生，由于我接受母親的音樂教育很早，表露了音樂的才華，修女們特別看重我。我在越南讀的是法國學校，法文較有基礎，修女們便特準我不上每一周有五堂的法文課，祇另外抽空爲我補課一小時。將挪出的時間，讓我加強練習音樂。晚上如有音樂會，修女祇帶我一人去欣賞。

那時我很調皮，修女知道一時無法改變我，在勸導我時，總是說：“有一天，你會知道的。”學校規定學生一周犯過失六次，周末便不準看電影。我却祇犯五次，就小心不犯第六次了。上課不準吃東西，我常偷偷的吃。有一次偷吃，我以爲老師沒有發現，其實她已看到了，祇是當

着同學大家的面，裝着沒有看見。下課後，她獨自勸導我，仍說：“有一天，你會知道的。”

一天，一位年紀大的同學，欺負一個年紀小的同學，我衝上去抱不平，幫助打那年紀大的同學。許多同學圍着看熱鬧。修女將我們三個和那些看熱鬧的同學們，全部處罰禁看電影一次——不可助長仇恨，要付出愛心；不可分裂，要團結。

畢業後，我得到了聲望甚高的雪梨音樂院的入學許可。我一意想做鋼琴家，主修鋼琴兼習作曲。但漸漸對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豎琴，簧管，長笛，三角鐵等樂器，都發生了興趣，甚至對指揮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常常擔任同學樂團及合唱團的指揮。老師和同學們都稱贊我有出色的音感和天才。聽到這些話，我總為我有一位偉大的母親而自豪。

正在緊張的準備畢業考試時，聽說雪梨交響樂團的指揮尼古拉·馬可要招收弟子，引起了我的入門的動機。他是俄國人，是當代的大指揮家，曾受俄國音樂家林姆斯基·柯薩克夫和德國大指揮家莫扎特的教導，因不滿共產制度，一九二九年到英國演奏後就不再回俄國。招生廣告說明不收女弟子，朋友們勸我不要去碰釘子。我却毅然寫了一封情詞懇切的信給他，出乎眾人所料，經過嚴格的考驗後，竟收下了我這個女弟子。自那年以後，他沒有再招生，我有幸成為他最後教成的三個弟子之一。在我們正在學習的兩年半後，他驟然逝世了。師恩浩瀚，令我沒齒難忘。他那對藝術的真誠，他那追求完美的意志，以及他那天人合

一的技巧，一直引導我向音樂的旅程踏實邁進。當我還祇二十歲時，他在三個弟子中，特地讓我首次登臺指揮了雪梨交響樂團。

三年以後，即一九六四年，我獲得獎學金，免費進入了在義大利西西利島的達奧明納。由卡洛·切齊與約翰·巴比洛利爵士聯合主持的指揮研究，經過這兩位著名指揮大師的推薦，參加了在紐約舉行的美國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比賽。國際比賽必須代表國家。我拒絕了澳洲要我代表的邀請，我要代表中華民國。我寫信給教育部，請求準許我代表我的國家。教育部對我全然陌生，久未答復。情急之下，我直接打電話給教育部，更詳細地說明了我自己。教育部才回信說，我和所有中國人一樣，都可以代表中國；也就是說，我可以代表國家，但政府并不特別指定我。

在四十二人比賽中，有六位同獲首獎，我落後他們九名，愧對國家。第二年春天，我仍然代表中華民國飛往丹麥，參加在那裏的國際指揮比賽。我指揮丹麥廣播交響樂團，演奏西貝留斯的第二交響曲時，得到很大好評，但仍未獲獎，祇膺選為十位杰出青年指揮之一。我必須再努力。我到義大利西埃納考進了當代大指揮家修登的指揮研究班，接受了為期一個月的訓練。然後回到羅馬，準備考入當地的聖齊芝利亞音樂學院再深造。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却讓我第一次回到了自由祖國。

一九六七年初春，我再度參加了美國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

比賽。評審委員特別欣賞我指揮的美國名作曲家柯布藍的“墨西哥酒店”，因為那是一個極複雜極難討好的樂章。在四十一人中，我與西德的司必匹林格，法國的卡波哥朗，西班牙的亞善斯歐同獲首獎，各得五千元美金，一塊金牌。我同時得到了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副指揮聘書，成為名指揮家伯恩斯坦的助手，記得那一天，我穿的是一身黑色緞子旗袍，我以一個純粹中國少女的姿態，登上音樂舞臺，內心感到了無比的榮耀與興奮；也因為這一次，是正式式的由中華民國政府委于了我的特定代表權。

我能第一次回到自由祖國，的確是一個極偶的機會。

我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回到臺灣的，而那一天却正是我苦苦準備，時時盼望的聖齊芝利亞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日。我必須要果斷的在回國與參加考試之間作一抉擇，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大約在九月間，于斌總主教到羅馬一所修道院去探望一位中國女學生的病，却不期然的遇到了另一個中國女孩子，那就是我。我是天主教徒，立刻跪吻了他的戒子。他問我：

“你是誰？”

“我叫郭美貞。”我恭敬的回答。

“你做什麼工作？”

“交響樂團指揮。”

總主教高興的笑着說：“你是指揮家，太好了，臺灣幼獅交響樂團正要我幫他們找一位指揮家，你應該回臺灣。”

我這時祇一心一意想投考音樂學院，實在不容考慮其他問題。這事也就過去了。

不料總主教竟向我國駐義大利大使于焯吉先生推薦了我。我和于大使曾經打過一次不愉快的交道，他對我印象深刻。義大利政府以往曾有一筆音樂獎學金贈與中國學生，但大使館送給了一家中國餐館老板的妻子和女兒，因而義大利政府取消了這項獎學金。這對我以及真正學習音樂的中國貧苦學生，有着極不利的影響，我曾因此向他提出抗議。

十一月十一日，就在考試前一天，大使館秘書突然來電話邀我去大使官邸晚餐。于大使要我參加第二天就要啓程的中義經濟文化訪問團回臺灣。事出倉促，我以要參加明天的考試，予以婉謝。于大使在餐桌上和藹的對我說：“聖齊芝利亞音樂學院的考試，報考每年都有；而這個去臺灣的機會，是稍縱即逝的。訪問團正巧有兩位義大利團員臨時因事不能去，騰出了空額，你應該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

於是我的血液沸騰了！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輕易放棄這個明天就可以回到日夕向往的祖國機會？我想到在澳洲時無法拿到當地政府的留義音樂獎學金，祇因為我是中國人！想到我有權向于大使抗議處理音樂獎學金不當，也就因為我是中國人！中國，中國！祇要我放棄明天的考試，明天就可以回到我自幼就聽到父母時時講述的中國！我心中突然抽搐了一下，握緊了拳頭，說：

“我去!”

我匆忙塞滿了一個皮箱，第二天到飛機場拿到了簽證，就這樣回到了祖國。

在訪問團十五位團員中，除了團長于大使和義大利工商界認識以外，還有義大利指揮兼鋼琴家貝塔裏尼，女高音瑪利亞采麗，男中音巴德裏，留義女高音沈愷之，男高音伍伯就教授和他的女兒伍敏德，中國指揮就祇我一個女孩子，那時候我祇有二十四歲。

我們被熱情的接待住在園山飯店，後來遷到國賓大飯店。那時候，我祇會英語，法語，和少數義大利語。我是一個中國人，但不會講一句國語，也不認識一個中國字，祇會講父親的廣東話。我所得到的中國聖賢經典和哲學的系統知識，都是從英文譯本中讀來的。(1980年1月3日中央日報，中央副刊，第四版上篇)

因此，我無法和所接觸到的每一位祖國同胞溝通。但當我一個人溜到國賓後巷的夜市，聽到吵鬧喧嘩，看到擁擠的人群，一波一波的流動在小食攤間，小販吆喝聲，鍋鏟翻動作響，腳踏車叮叮噹噹，多麼熟悉和親切啊！突然間，我好像又回復到了小女孩的時代，騎在父親肩上逛西貢市。這證明了東南亞的文化風俗，都源于我們偉大的中國。

企業家辜偉甫先生，陪我去參觀榮星兒童合唱團，他們練習的地點，在淡水河邊一棟老屋中，土灰色的牆，四壁斑剝。孩子們面帶菜色，他們不像我所見到的西方孩子健康。

可是孩子們一開口，一切都改變了，他們變成了天使，唱出和諧的歌聲，天籟飄蕩于空際。室內的氣氛變了，牆壁不再灰色斑剝，却像刻意安排的舞臺布景，是那樣自然協調。孩子們臉上隨着散發着美麗的光彩，眼睛個個發亮。我佩服他們的指揮呂泉生先生，也了解了中國兒童所具有的音樂天賦。辜先生和呂先生正在協力開掘一座無盡的金礦。

十一月二十四日，國防部示範樂隊在中山堂演奏，隊長兼指揮樊燮華上校，請我和他分擔上下場指揮。雖然軍樂隊祇有管樂，不算正宗的交響樂，我仍欣然的爲他指揮了貝多芬的“愛格蒙特”序曲，莫扎特的“魔笛”，與韋伯的“奧勃隆”序曲。不意因此引發了我以後參加一連串的音乐活動。

二十八日晚間，臺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與名小提琴家奧列夫斯基，在國際學捨聯合舉行的音樂會中，我擔任了客座指揮。隨後又擔任了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演出的客座指揮。臺北市長高玉樹極力支持我，他後來請我代表臺北市，于一九六七年二月由紐約赴姐妹市休士頓客串指揮。得到機會與我的老師約翰·巴比洛利爵士，和另一位大指揮家安德裏·普雷溫分別指揮了休士頓交響樂團，使我得到殊榮。

臺南三 B (Best)兒童管弦樂團團員們的父母們，不斷的到臺北來要求我南下指導他們。一天，辜振甫先生的女公子說要陪我到臺南玩玩；到了臺南，又要我順便去參觀三 B 兒童管弦樂團。想不到全體團員正在爲第二天的演出作練

習，他們請我擔任明天的指揮。一天之內，是不可能訓練達到某種標準的，我無法答應。但看到了這些可愛的孩子，祇好接棒臨時指導了一陣。這使我又想起了可愛的榮星合唱團，此外不知道還有多少具有音樂天賦的中國兒童們，需要大家去培育呢！我答應了團長楊麗雲女士，以後回國，如有機會，當南下訓練他們。我太喜歡祖國的兒童了，我不拘國外成人樂團指揮，與兒童樂團指揮截然劃分的成規，我是基于培育中國音樂人才的動機，願意盡我所能，為國效力。

一九六六年初春，我到韓國擔任了較我國水準為高的漢城愛樂交響樂團，然後回國指揮了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和榮星合唱團，也去臺南指揮了三 B 兒童管弦樂團。第二年八月去日本指揮了水準更高的讀賣新聞交響樂團，回來指揮了市立交響樂團，就到臺南去訓練三 B 兒童管弦樂團。現在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兼任第一小提琴的陳恒先生，就是當時三 B 團員。愛樂宣布解散後，他正在辦理出國手續，決定去美國攻讀企業管理，立志將來有了錢，要為我國交響樂團效力。

此後，我在美國，歐洲，澳洲，南美洲，菲律賓，日本，韓國，香港等地擔任指揮之餘，祇要抽得出時間，幾乎每年都要回到祖國來。有時我特意選購了可以經過臺灣的飛機票，回來看看我這有如母親一樣親切的祖國。

一九六九年九月，教育部文化局長王洪鈞先生，函請我回祖國組織一個中華兒童交響樂團，十月去參加菲律賓文化中心落成音樂季。我欣然答應了這個毫無頭緒的任

務，立即回國來，就臺南三 B 兒童管弦樂團，光仁小學，以及李淑德教授指導的學生中，挑選了五十六名團員，經過三個星期的練習，由兩個孩子扛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翠綠色的“中華民國訪菲兒童交響樂團”團旗，匆匆到菲律賓演奏。

那次演出，受到了轟動的歡迎，原定兩場，結果延期加演了四場。但不能耽擱團員們太多的學業，祇有謝絕再加演的要求。最後一場，在菲律賓大學演奏時，座位二千，來了三千人，竟有一千人自始至終站着欣賞。

最讓我難忘和遺憾的，是在專為華僑演奏之後，他們送給我一本紅緞子封面簽名簿，上面簽滿了他們的名字，并在扉頁上寫着：

“你的天才好像万丈的烈焰，  
您的藝術有如燦爛的火花，  
你的名，更似那隆隆的春雷，  
不但震撼了中外樂壇，  
而且挑動了萬千游子的心弦！  
在這裡，我們有一個要求，請為旅菲僑胞再作一次演奏，  
讓我們一聽祖國之音吧！”

一九七六年一月，教育部長蔣彥士先生，國際文教處長鮑幼玉先生，和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執行長李鐘桂女士，邀請我回國組織一個少年管弦樂團前往美國演奏，以慶祝美國開國二百周年紀念。我回國在李淑德教授等人士的協助下，大體就七年前參加中華兒童交響樂團的團員，甄選

了三十名予以訓練，命名爲“中華民國華美青少年管弦樂團”於六月底到達美國。

我們在美國十八個州，兩個月共演出二十六場。每場都受到熱烈的歡迎。美國聽衆和僑胞都起立鼓掌致敬，他們表示從不知道中華民國有這麼高水準的少年樂團。這使我萬分感動，極盼能再有一個成人交響樂團到國外演奏，以偉大的音樂，向外國人顯示我中華民族的心靈與國魂，并以此宣慰僑胞。

一九七七年三月，我結束了香港愛樂交響樂團兩年指揮四十五場的工作，赴澳洲去探視我的父母，和兩個已做醫生的弟弟。然後再應聘去菲律賓擔任指揮。

經過臺灣，我與老友們作了短暫相聚。他們都希望我能留在這裏，做些對年輕人的音樂教育工作，比如擔任大學教職等等。我不願放下我的指揮棒，而且這些年來，我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在各國擔任指揮，常被問及我們的國家交響樂團如何，我總很難答復；因此我表示每一年最好能有一千萬元的經費，成立一個交響樂團。一九七三年，我在澳洲雪梨曾創辦了一個歌斯佳愛樂交響樂團，迄今七年，仍在不斷的成長進步，水準日高。當初我花了兩年時間經營，以後每年都去指揮演奏。

那次待我去澳洲後，王惕吾先生熱心奔走，希望促成組織交響樂團。當時臺塑願意出五百萬元，但不能組成。王先生再與國泰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蔡辰男先生商量，他一口氣答應每年以一千萬元以上單獨組織。

翌年回國，慶祝總統副總統就職，與鋼琴家王青雲先生同臺，我指揮市立交響樂團。蔡辰男先生曾去欣賞，非常興奮，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我。我自南部旅行回來，與王惕吾先生，蔡辰男先生伉儷，還有一位曾小姐等共餐。蔡先生表示每年願出一千二百萬元成立交響樂團，並要我在一天之內提出書面計劃。後來寫信給我，表示第一個會計年度另以五百萬元購買樂器及作辦公設備之用，我的年薪在外。這是出乎我意外的，在此之前，王先生并未向我透露過他與蔡先生的商洽。蔡先生對我說：“我不會給人一塊錢去買花生，如果他不合適；但我要你做這個計劃的主持人，因為祇有你才最合適。”

在這之前，我曾請教樞機主教于斌先生，因為我不懂中文，不會說國語，文字，如果打算留在臺灣，是否適宜。他說：

“你一直都在各國奔波，現在是你安頓下來的時候了。給臺灣兩年吧！”

是的，我為吸取各種不同的經驗，以充實我的指揮藝術，在各地停留的時間，長則三年，五年，短則一年，兩年，確實沒有較長期的安頓在一個地方。在長年飄泊異國，浪迹天涯之後，游子也該落葉歸根了，我要回到祖國，奉獻所學。

現在真的要我籌組一個交響樂團了，我料想將會遭遇許多困難，尤其以一個女孩子來主持這工作，必有更多障礙。我在美國一位相知的中國朋友，就曾告訴我，國內人事關係復雜，以我一個不懂中國“人情世故”的表演藝術

家，是很難處下去的。他不贊成我的打算。然而我寧可耽擱我的婚事，爲了祖國的下一代，爲了祖國的音樂前途，我毅然決定接受蔡辰男先生的邀請。我憧憬這個交響樂團，在兩年後參加中正紀念堂的揭幕典禮活動；我憧憬這個交響樂團，將來能代表中華民國赴各國演奏。……

於是“財團法人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基金會”在六月成立了，由蔡辰男先生擔任董事長；由蔡夫人陳保枝女士，郭辰洲，蔡萬春，陳土根，吳憲藏，曹永坤五位先生和我擔任董事。董事會聘我爲交響樂團永久指揮兼團長，另設經理負責行政工作。但第一年未派任經理，業務由我兼辦。我建議聘請國內音樂界前輩們擔任樂團顧問，蔡先生或許認爲在愛樂尚未達到某種水準以前，不便麻煩別人，未獲贊同。

我當時飛到美國指揮了世界青年交響樂團，和芝加哥訓練交響樂團，順便買回樂譜；到韓國指揮了漢城交響樂團回來，立即借用國泰人壽保險公司辦公，並辦理甄試團員的工作。九月份正式開始排練。當時祇有一位年輕秘書，我每天必須工作十小時，緊張忙碌，十分焦急，朋友們勸我要有耐性，才多少磨掉了當年在澳洲養成的任性。我們終于以非正式的方式，成立了臺北愛樂交響樂團。

在西方，組織一個交響樂團，必須先有通盤預算，完備人員編制和合約，才能展開工作，我則是由一位秘書，從一間四壁空空的辦公室做起。(1980年1月4日中央日報，中央副刊第四版中篇)

我學會了中國人的耐性。親眼看到許多人在面臨困境時，所表現的忍耐工夫，中國人能忍人所不能忍，能以不變應萬變。我們的團員在這方面，表現得令人感動。剛成立時，排練場所在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飯廳，嘈雜不堪，他們忍下了；我要求完美心切，指摘很多，他們忍下了；在國父紀念館排演時，沒有供應理想的照明，時間也受限制，這在國外樂團一定罷奏，他們也忍下了。他們固然爲了興趣參加樂團，有些人爲了家庭生計，還必須奔趕于家教與練習之間，他們竟忍得住如此長期的勞累和困頓。我感覺到了中國人在平凡中的偉大。

我要求五十位團員都要有杰出的表現，我們若無法成爲世界第一流的交響樂團，最少也應該做一個有水準有素養的樂團。環境愈艱困，我們成功的機會愈大。這必須我們大家刻苦，同心協力，攜手奮鬥，他們真做到了。我告訴他們，我們要有永遠追求完美的精神，單有錢和設備，是不足以造就一個偉大音樂家的。看到他們專注于練習，發光，進步，我特別高興，這群年輕人顯示了他們高貴的氣質。

我的構想是，臺北愛樂交響樂團，不僅是一個演奏性質的樂團，而且應該賦有音樂教育的任務。因此，我從美國物色了十四位年輕音樂家，希望由他們帶動，並促進國內交響樂團水準的提升。這些人盡管不是第一流的，但他們比我們國內的一般演奏水準仍高。他們的出現，使我們原來表現平凡的團員們，緊張萬分，甚至妒忌，開始大排特排。後來因爲生活條件和音樂環境不理想，有六人在卡

特宣布中美斷交，國內激起反美浪潮時，不告而別。然而由于這十四位美國團員和大家合作，在此後不多天的耶誕節，使我們終能于國泰人壽二樓，為蔡辰男先生邀請的特定人士，作了一場對內的理想演出。以後演員們受到對外一連串演出的壓力，反而希望那些美國年輕音樂家仍然回來。

許多人不諒解，我與其選用外國年輕音樂家，為什麼不訓練更多的中國團員。其實除了這些外國人可以作為我的助教，幫助訓練中國團員外，主要也因為我們還很難物色到適當的團員。我們甄試團員時，在二百五十人中選了八十人，並做了一次嘗試性的練習，情況很好。但他們認為由民間支持的樂團，不像省市交響樂團有保障，有些人不願意簽約，心存觀望，我不得不借重外國年輕音樂家。至于年紀較大，已有聲望的音樂家，更不是我們的待遇所能羅致的。我曾和國立藝專校長張志良先生研究建教合一的問題，希望他們音樂科的學生，每周六和周日參加愛樂練習，使他們在訓練和演出中成長，將來再吸收到團裏來，成為新一代。張校長十分同意，教育部也很支持。蔡先生觀點不同，未能贊成。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歐洲的音樂王國也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我們祇有慢慢向前走呀！

一九七三年，國防部曾有意以一千六百萬，請我籌組國防部交響樂團。我當時認為國內條件不夠，工作推展不易，未敢承當。現在看到在經濟起飛之下，許多父母都買得起樂器，有了更多學習音樂的孩子，在這些孩子中，不

僅將來會產生一些音樂家，而且他們也是未來够水準的音樂聽眾。這使國內的音樂環境和條件日益改善了。

在指定樂團分部首席任務和調配席位時，可能有些較年長的團員，不太滿意屈居于晚生之後。但音樂領域是祇尊重才能的。許多人有家累，兼課，不能專精于音樂工作，因而祇能成爲兼任業餘團員，待遇較少；祇有二十四位專任職業團員，他們必須全力以赴，勤練精進。

在耶誕對內演出後，我積極準備于三月二十四日在國父紀念館對外首次公演。但董事會十分穩健，唯恐水平不够，主張必須有了高水準，才宜公開。我則認爲樂團要在不斷勤練，和不斷對外演出中，才會成長進步。音樂家必須永遠追求完美，而完美又是沒有止境的。人的失敗，是在先天就有失敗主義，由于自己的天性阻礙了成功。一個有毅力有信心永遠追求完美和成功的人，至少不會太失敗。

董事會遲遲未決定三月二十四日是否演出，我和團員們則以三月二十四日爲目標加緊勤練。看看時間已迫促，如果董事會一旦決定演出，將趕不及印票，賣票，和印海報等準備工作。在焦急之下，我不得不私自將準備的票樣，海報，和說明書託朋友先行交付印刷，在聽候董事會決定。等到董事會接受我的建議，決定演出時，票和海報已及時印好，可以向市面推出了。我才深深的舒了一口氣。

我們的演出是成功的，轟動的，座無虛席的。以後每月的演出，也是場場客滿，全部售票所得，除了應付場租

等等演出費用外，基金會尚有一百餘萬的收入。我看到團員們在臺上聚精會神的認真演奏，感到了最大的滿足。團員們也從我指揮時欣快的面部表情，得到了一些安慰。

朋友們對愛樂交響樂團的存在和發展，缺乏信心，多半種因于外界對國泰機構的疑慮，他們不明了一個營利事業，是否會源源不斷的來支援一個所費不貲的交響樂團。

我對蔡辰男先生深具信心。他是這個環境裏，最具社會意識的企業家之一，很少人能有膽識和氣魄，將一筆本可以再投資的雄大財力，投入一個非營利的新事物的。蔡先生祇是覺得錢要進來也要出去，多做些事情對社會和國家總有好處。我知道國外的著名交響樂團，都是由許多企業機構與個人多方面贊助的；像蔡先生這般獨自肩挑愛樂這付重擔，是很少見的。大家爲什麼硬要問：“國泰創辦愛樂的真正目的何在？”

我承認任何人作任何事情，動機都不一樣；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的本身。蔡先生夫婦說到就做到了。交響樂團的出現與存在，對推展社會文化總是有貢獻的。交響樂團可以促進一般音樂水準，交響樂團的水準也代表了一個國家的音樂水準和文化水準。我們都有決心和信心，將愛樂辦好。蔡先生曾說過：“錢不是問題，事情要做好，做成功。”比如第二會計年度，我僅要一千萬元經費，蔡先生則慨然允給了一千二百萬。

有人懷疑我：“郭美貞真有心留下來嗎？她打算待多舊？能待多久？”

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將愛樂辦好，使它能夠進步并維持水準于不墜。讓任何人隨時都可以來接替我的指揮棒。能如此，我即無愧于國泰，無愧于蔡先生，也無愧于國家。

堅毅的蔡先生也有困擾。他告訴我，常接到別人的電話，論東議西。我猜他開始憂慮了，花了很多錢，得來的却是煩惱。所以我回答他說：“我一點也不擔憂。我很高興，因為事情進行的很理想，我們都在盡力而為，做得很好。”我看到蔡先生的面部表情頓時開朗起來，確實感到十分高興。

蔡先生讓國泰人壽和關係企業投入了愛樂一千九百萬元。據說其中有三百萬是在阿波羅大廈購買和裝修六十八坪的基金會址并供我居住；(其中裝修購置費為一百萬元，我設計盡量儉省，基金會僅付七十五萬元。)有六百萬元是在萬城通商大樓地下裝修廣達二百八十坪的練習場所和辦公地點，再用樂團名義每月交付十萬元租金；另有一百餘萬元系購置樂器。這是具有氣魄的大手筆。教育部六月份曾打算補助愛樂交響樂團五十五萬元，亦為蔡先生所婉謝。蔡先生是以獨資經營企業的精神，來經營愛樂的。

也許由于蔡先生太忙，後來請董事會的曹永坤先生擔任執行董事，代表處理基金會業務。但曹先生也很忙，六月份才偶有接觸，到十二月八日最後演出一場，團員尚不認識曹先生。蔡先生也派了一位職員陳振基先生擔任樂團經理，并由國泰人壽的一位王協理代表蔡先生在上面管事。所不同的是過去蔡先生直接負責，可以自己作主，放

手由我做。而曹，陳，王三位先生要對蔡先生負責，也就多所顧慮了。曹先生喜歡音樂和聽唱片，但到底不是音樂工作者，王協理和陳經理對音樂更是隔行。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溝通和默契。然而這些對於我們並沒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仍然勤于練習，認真演出。

自從陳經理來後，我就專心音樂工作，對於行政不再過問，樂團所有開支，我和陳經理都不經手，必須簽請基金會核準直接支付。樂團每月僅有三千元左右零用金，由陳經理支配。我不論是在澳洲成立樂團，和在臺灣成立樂團，從不經手錢。即使前兩次組團去菲律賓和美國演奏，經費也由別人支配，我也從未經手。我祇負責訓練和指揮工作。

專任團員的合約，九月期延，應該簽訂新的一年合約，但遲遲未見行動。團員們依舊照常聯系和演出。直到十一月底，陳經理署名分別函寄各專任團員一份和約，并附有四十一條管理規則，限三天之內簽訂。後來有五位團員如期簽訂了，但大家認為規則條文尚有商討餘地，要求和陳經理研究。當時我們正準備于十二月八日在國父紀念館演出，忙不開交，陳經理表示可俟演出後再談。演出後，陳經理又表示等董事開會後再說。至于我，在蔡先生當初給我信上說：最近即簽合約，但一年多來，迄未簽訂，我信賴蔡先生，也從未催促他。

當時傳聞，國泰財產分了家，國泰機構已改組，蔡先生也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轉任為另一國泰機構的董事長

了。我們沒有想到這些改變，會對國泰及其關係企業所支持的愛樂交響樂團有何基本上的影響。

十二月十八日舉行董事會，事前沒有照例要我提出議案。會議開始時，曹執行秘書報告了演出等情況，并贊美愛樂演出水準

很高，說我確實全心全力在為愛樂工作，表示感謝。然後他突然表示辭職。等到蔡先生問到各關係企業最近資助的情形如何時，有人答復說不太好。蔡先生接着說：“那麼我們就將愛樂解散吧！”我當時要求延長三個月，作為商討的緩衝期，但未為接受。

我實在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這太戲劇化了。

我立即想起那相知的朋友，當初不贊成我回到人事關係複雜的臺灣來工作。是他錯了？還是我錯了？不，我沒有錯，回到自己祖國，將自己所學奉獻于社會和國家，總不會錯的。

每天有人打電話來慰問和鼓勵我們，并要求我們仍能如預告所說，在元月十三日照常演出。有人說國泰既然將樂器鎖起來，他願意將自己心愛的小提琴捐給我們。也有團員將領到的薪金全部捐給團裏。團員沒有了練習場所，但仍如期到我的居所練習。錢復先生也來電話說，如果我的居所有問題，可以住在他的府上。我對這些真情摯意，非常感謝。

如果你喜歡音樂，就要承受音樂帶給你的一切痛苦！我想。

現在，我對一切仍無從決定。祇有幾點是確定了的：我不會因而放下我的指揮棒；我也不會拋棄團員們立刻到國外去；即使連菲律賓邀請我元月去指揮交響樂團的演出，我決定不去了。

(1980年1月5日中央日報，中央副刊，第四版下篇)

## 张淑惠,李念平附记

“放下指揮棒嗎？”一文，是由郭美貞小姐口述，我們記錄的。我們很驚訝她的國語竟如此之純熟，表達能力竟如此之高强。她的講述，充滿了哲學意味，和表現了極爲高的文學素養，這自然源于她用功廣獵英文和法文書籍的結果。可惜爲了精簡文字，我們不能完全記錄下來。但由此，我們才知道她不僅僅止于對音樂的高深造詣。她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敘述中，也常提及神的意志和神的啓示等等。我們也都省略了。

我們原不認識郭小姐，祇因愛樂交響樂團于三月二十四日，首次在國父紀念館公開演奏前，入場券在市面立即售空，我們遍購不着，最後才冒昧到練習場所去找郭小姐幫助。她非常熱心的設法讓我們買到了樂團僅剩的幾張票。以後每次演奏會，我們都爭取時間，盡先買票前往欣賞。看到這位享譽國際的‘女暴君’。她那具有千鈞氣質的巧妙指揮，聽到愛樂美妙而光彩的音樂旋律，使滿座聽衆都沉醉，都興奮，都狂歡。愛樂是國內具有高水準的交響樂團，每次演奏的樂章都不相同，郭美貞敢于挑選一般人所陌生的，最艱難的曲子，讓國人欣賞。

最近突見報載，愛樂解散了，原定元月十三日的演奏會也取消了。那以往曾經飄漾于國父紀念館的美妙旋律，將成絕響。我們感到了對她的虧歉，以萬分歉疚的心情，

又冒昧的找到郭小姐的居所去安慰她，希望她能諒解這祇是個別事件，不能看作祖國對他的報嘗。祖國的同胞對她仍如當初一樣的敬愛和仰慕。

我們試行要求她能由這件事談起，將她自己和她的音樂生活，向祖國同胞作一個簡略的介紹，讓大家對這位令我們依依難捨的音樂天才和偉大的愛國者，有着更充分的了解。郭美貞就是那麼純潔爽朗，出乎意料的，她竟然同意了我們的要求。向我們口述了這篇文章。有些詞匯，她尚不能運用過當的國語表達，就用英語說明。

第一次口述，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去年的今天，她正在興奮的準備耶誕演出)，她一直講到凌晨五點鐘，才困極而眠。我們這兩個與她素昧平生學建築的女孩子，也就有幸在她的居所睡了兩小時。

她說：“我不冀求國家爲我做些什麼，祇希望盡我所能爲國家多做點事。”現在，我們——爲她所關愛的國人，特別是聽衆，該爲她做些什麼呢？

# 为祖国祈祷

郭美贞作 尹玉立译

這篇文章，是郭美貞以祈禱詞的方式，向同胞傾訴她對祖國的心懷，其關愛之情，溢于字裏行間。譯者為便于一般閱讀，特將空靈部分予以刪節。郭美貞現在澳洲，歸期尚未定。她已接受挪威明年三月前前往指揮三場之約。謹將此文譯出，以作為對我所敬愛的這位友人的祝福。

——译者

感謝上蒼讓我又多活了一天，讓我善用時間，內心充滿喜悅，看到我周遭的奇迹：

壯偉的天空，太陽，雲彩，美麗的樹和花朵。我非常感謝上蒼保佑我的家人和朋友們，他們和我攜手共同為理想而奮鬥。我們都渴望中國的強大，使中國人的天份發展到本世紀末極致；渴望在中國各地建造有美麗的城市，學校，教堂，音樂廳，住宅，公園，購物中心等等。我們也渴望海內，海外，大陸和臺灣的中國人加深手足之情，這必須將上蒼的愛跟力量置于自由中國，讓它成長和擴展到每個中國人的心中。

上蒼目睹中國人生活在五千年文化中，知道我們所有的美德和弱點，必定會幫助我們超越自我，尋求和平及與眾人平等的尊嚴；幫助我們挾着偉大的過去，甚至更光輝的

卓立于衆國之中。我相信中國將成爲二十一世紀最富強的國家的預言，終會成爲事實。

由于這些信心，我做我欲做的事，更由於發展我的秉賦去追尋完美，有了勇氣做我所欲做的事，當我想當的人。我相信一切，能够忍耐，并且期望對所有事物的愛心。

今天我之所以有這份熱望，要見到中國的音樂天才，有機會發展他們的潛能，而獲致最高得不償失成就，一定是植根于我的中國血統，我的中國音樂遺傳基因，或是我父母不斷地教導我要出人頭地，好讓白種人看得起我們。我訓練中國年輕音樂家的經驗，始自一九六五年，其中包括了率領中國兒童弦樂團到菲律賓，華美室內管弦樂團到美國十八州巡回演出，舉辦華岡音樂營及組織臺北愛樂交響樂團。這些經驗使我明白，這裏的人要成爲一個音樂家，會要遭受到許多痛苦與困難，如與家人意見的衝突；與就學的學校衝突；而職業音樂生活祇在賺錢，一般人祇爲了掙一點錢與名氣，而非爲了了解自我，以個人的標準及內心的深處的超我才學習音樂。若說學習音樂能讓人邁向完美，則由于對藝術的熱愛，一定能引發我們尋找真正自我的勇氣。我們將體認到自己的弱點，但同時也看到自己的堅強和獨特，以及每個人內心的靈性。若我們祇是隨便彈奏樂器，將會錯過音樂訓練上最重要的階段，不能發揮潛力至極限。

我們每個人都有權享有自由，并選擇自己的方式學習和體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歷與價值。對於那些性靈平

常的人，我們必須有耐性去鼓舞他們，但是應該避免與他們共事。因為性靈愈低，愈喜歡控制別人或被別人控制。而那些性靈愈高的人，愈能接受自己，並給別人自由。自由的基本意義是：我們能體認到本身的善，並勇于作決定；我們也見到別人的善，並且相信別人有自決的自由。我們深信，善必能勝，天理必昭。因此我們祇能與性靈程度相同或更高的人共事，尋求他們的指引，而不致受到操縱。中國社會，一向有過多的親戚與社會牽制，不過在自由中國，現在人們都在追求自由民主了。為了維護我們所擁有的國家，我們都必須竭盡所能協助政府與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並像韓非子所說，一法律保障人民權益，使每個人都能發揮所長，貢獻給國家與同胞。

中國人已不再受農業社會的影響，農業社會的人鐘愛大自然，於是喜愛和平，且有耐性和毅力。今日的中國人局限於混凝土的叢林和公寓之間，受到外國勢力，大集團，太空船，人造衛星，氫彈，超音速飛機的影響，兒童看電視的時間，遠超過面對父母的時間。白種人有力量登陸月球，擁有毀滅數百萬人于瞬間的武器，他們撕毀條約，制造戰爭。他們享受到了什麼？高度的離婚率，老年人和孩子的寂寞！漢堡店鋪！無味的電視晚餐！我們能讓這些人來控制我們的經濟，我們的國防和我們的未來嗎？現在該是尋求中國人光輝的時刻了！否則我們還要屈辱多久，才能發現自己的力量和偉大的天賦，用我們數千年積累下來的智慧，把愛好和平的美德，分享給不同膚色的全人類？

研究我的國家，我發現大自然蘊育中國人的思想，藏

使真理與生命合而為一。中國人就像竹子一樣苗條有緻，表皮光滑，散發着清香，隨風搖曳，歷經各種氣候，忍受一切橫逆。竹子的一切都有用。筍可食，莖幹和葉子可做很多東西。它們成叢生長，若扎成網，更加强堅韌。喜歡群聚的中國人，不喜歡自喻為大樹，因為樹大招風，容易被孤立。這種寧為小樹的心態，加上較保守的行為，可以確保生活的寧靜無波，日子愉快而少煩惱。中國人以愛心耕種田地，閒暇時享受些生活樂趣，比如兒孫承歡，美酒佳肴，或是村人的尊敬。因此也產生了‘面子’這種傳統心態。一個中國人可能弄到傾家蕩產，或筋疲力竭，目的祇是為維護面子和得到面子。長輩教導大家要和平相處，因此確定忍讓是一種美德。幾千年來，中國人就生活在這種道德行為的規劃中，甚至包括要面子的拘束中。這種忍讓的哲學產生不了強者。

藝術工作者，在宇宙和性靈世界裏，看到了不同層面的真理。這些宇宙的真理恒久長存，每個時代的大聖哲都明了這些，并曾予以教導。比如，中國人有許多哲理，諸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四海之內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善最樂’，‘仁民愛物’等等。

科學家研究宇宙的自然法則，原子的規律，人體的遺傳基因等，已經到了可以進一步控制大自然的地步，他們將可以預測地震，控制水災，造雨，造試管嬰兒，選定子女的性別等。人類在這個世紀，變得越來越自由，因而創造了最偉大的奇迹。

現在是科學時代，我們討論能與電波和音波的振蕩。即令在思想的這一刻，我們都在散發‘能’到大氣裏，若散發出去的是積極的能，吸引的振蕩必定是正面的；反之則是消極的。如果你自認病了，你終于會生病；如果你自認失敗，你終必會失敗；因此，我們一言一行都會散發出不同的能，引起振蕩，而得到相似的回饋。我們的感覺也會散發能，如果這感覺是恐懼，我們害怕的事情就會發生；若我們覺得悲傷，想唱一首歌開心，唱完以後，不但自己會歡笑，也會帶給別人歡笑。道理就在我們可以用自己的行動來左右自己的情緒；祇有弱者的情緒，是受制于他人，或是受制于當時和過去的心情。當中國人要別人給他面子的時候，實際就是讓別人控制他；假設能體認和肯定自己的真正價值和能力，就絕對不會爲了面子而決定取捨了。

有人相信命運是可以自己決定的，而中國人則是宿命論與認命論者，在那裏順應命運。我相信命運實際上是由人自己選擇的，雖然我們可能不自覺，但事實上在人生旅程中，我們隨時都在辨別，隨時都在選擇。

每當我見到白種人藉着狂熱，藥物性或酒精來麻醉自己，我明白了中國老人的臉上盡管滿佈皺紋，雙眼迷朦，爲什麼還是那麼美麗，安詳——因爲他們受過無數的折磨，吃過無盡的苦，堅強的忍受着煎熬，而他們并不試圖用化妝品或假發來掩飾年齡。祈望上蒼賦予我勇氣，去改變我能力所及的事物，再給我智慧來判斷其間的差別。

中國人花了很多時間和金錢禮尚往來，而經常爲了得不到預期的回報而感到失望灰心。許多談成功之道的書籍

都指出一個守則；即使老板和契約祇要求工作做到百分之百，我們至少應該做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五以保證未來的成功。根據宇宙法則，你所收回的能，將完全等于你透過思想行動和感情所散發出來的能。一個人汲汲營生，却不去想發財，就不會有滾滾而來的財源。如果你想致富而辛勤工作，即使得到了財富，而你未能合理支配或使用它，你也等于沒有金錢。事實上，人若祇想不斷地賺更多的錢，他將花上所有的時間去賺錢，賠錢，賺錢，賠錢；永遠也不能滿足賺錢的欲望。而那些立下誓言要先賺錢再捐錢給慈善事業的人，也祇是空想，永遠都辦不到，因為他們永遠也不認為他們賺了足夠的錢。一位身無分文的天主教修女和幾位姊妹，希望能夠建造學校，醫院，教堂和孤兒院，她們吸引了有同樣願望的人。大家開始捐錢，贈送東西，甚至奉獻，有時捐款是遠自海外來的，漸漸的所需金錢就湊足了。有人把錢比喻為陽光，那些關起窗子的人，永遠得不到它；有些人祇要有足夠的陽光使生活正常，有些人則使金錢變成了沉重的負擔。金錢完全看你是否能聰明的善用它，若能，它會不斷平穩地回到你面前；若是單祇用于滿足個人貪欲上，它終將會爆炸，造成毀滅性的連鎖反應。

中國人還是生活在紳權轉型期中，法律的執行，還不能完全避免受到現實的影響。雖然這種現象在逐漸改變中，但是目前仍有必要重新審視我們的思想，生活，和運作方式。在這個大眾傳播時代，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擴大自我的生存意義，認識自己的重要性，增加組織的效率，節省時間和金錢。並且最應該制定法律，來幫助人人竭盡

所能，創造發明，以求取多數人而非本人及其家族的最大福祉。現在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殫精竭智，每一棵竹子都抖擻掙扎着向高峰生長的時候了。

宇宙另有一種定律，地球層面不能容忍真空狀態。一旦我們的心靈空虛，就會有東西將它填滿。或許中國人應該拋棄對西方的物質，汽車，鑽石，洋房的渴求，讓自己的心像竹心一樣空靈，不攙雜一絲忌妒，恐懼，懷恨，祇允許用愛心來填滿它。如果竹子願意當風得當樂器，讓大自然在它身上吹奏美麗的頌歌，它必須能忍受被連根拔起，然後被鑽洞，被火燒的痛苦。中國人是不是也應該斬除一些錯綜的根結，捐棄矜飾虛榮？我們需要規律的生活，良好的習慣，並不斷求取身心的長進，才能提昇自己至最高的境界。讓自己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隨時記得自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你的內心具備一切成爲頂天立地的人的條件；如果達不到時，祇是由于自己的努力或際遇不夠，並非由于父母，社會或政府的錯，不能責怪任何人。

一般人的心理狀態通常可分爲兩種：一種人缺乏安全感，祇有在控制別人或受制于別人的時候，才覺得安全。另外一種人不怕自己自由，也讓別人自由。我們身在自由中國，更可以享受這種自由，並且應該幫助每一個同胞獲得這種自由來發展自我，共同建立偉大的中國。當你孤獨的時候，請一充滿寧靜跟感激之情，相信我們是上蒼最偉大的奇迹。相信真理，放寬你的心懷。當你工作的時候，竭盡你的智能去追求完美。無論那一種職務，砌磁磚也

好，執教鞭也好，我們都必須付出較世俗所期望為多的勞力和智慧，才能尋求完美，才能發現自己內心的靈性。朋友們，時光一去不復返，如果你有閒暇，可用以培養興趣，發展你的天才，千萬不要孕育消極或邪惡的思想。我們應該祇想，祇說，或做積極的事情。

若他人需要你的幫助和意見，你當盡你所能幫助他們，但是不要期望他們必然依隨你的思考方式，因為每一個人性靈的程度都不同，讓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行事—吸取經驗；我們祇能從旁鼓舞和祝福他們，而任由他們去邁着不同的步伐。

讓我們為祖國祈禱吧！我們的一切思想，行為，快樂和苦難，也都為着我們這個古老而可愛的祖國。

(1980年5月26日中央日報，中央副刊，第四版)

## 斯人已去，怀念依旧！

美貞走了，沒有為友朋及親人留下任何的囑托。就如同她一生那的瀟灑，無牽無挂地離開了我們。作為國際音樂指揮，她一生的生活飄忽無踪，很難和朋友有相聚的機會。我們往往以‘忙碌’為借口而經常失去朋友間的交往，更因為現代科技發達的時代，電子郵件往來的增多而友人之間面對面的相聚也就相對的減少。我夫婦和美貞間也無法背離現實中的‘現代化’，僅能用這個先進的交往媒介互通思念，却剝奪了我們往日曾經在羅馬時帶着年輕人的親切相聚和純真歡笑。

在美貞最後的歲月裏，我們互通電子郵件的頻率突然變得密集，似乎象徵或預感着最不願意看到的人生軌迹的變化可能出現。這也許是因為她的病痛給我帶來一些不祥的聯想，也或許是我們彼此間的長年友情而自然流露對她的關切。

記得在 2010 年 4 月 7 日，由于偶發對她的思念，而從網站上搜尋她的信息，得知她不久前曾在新加坡指揮演出。我迫不及待地給她發了郵件，想了解她近來的生活情況，但更急切地希望知道她在音樂事業上的發展。

果然長年的友情心靈相通，隔一天即收到她回電，告訴我她在菲律賓的巴拉望島群中公主港小島 (Puerto Princesa)

的珊娃海灣 (Sandwa Bay) 生活了相當一段時間。也是在那封郵電中得知她罹患乳腺癌近十六年。她選擇了菲律賓的小島生活，主要是為舒緩她病情，希望能通過與大自然的接觸來醫治她的病痛。游泳和潛水是她平時最喜愛的運動，所以她每天帶着兩祇心愛的小狗婷卡 (Tinca) 和索羅 (Zoro) 左右相伴着潛水戲水。大自然的生活似乎對她的病痛有所舒緩。她還告訴我準備在 10 月 28 日回澳大利亞悉尼，2011 年 1 月再回到菲律賓。

然而病痛的折磨並沒有削減她對音樂指揮的熱衷。在往返的郵件裏，她興奮地告訴我在菲律賓各地指揮馬尼拉交響樂團，從字裏行間可以體會出她對菲律賓的鐘愛和對音樂始終如一的執着。

美貞去世後，為了解她在菲律賓最後歲月的音樂生活，作為撰寫她傳記的材料，我和妻子在 2014 年 7 月去了馬尼拉。美貞一生中曾經受到菲方二十多次的邀請，在菲律賓指揮馬尼拉交響樂團和菲律賓國家交響樂團，菲律賓的華僑對她倍極尊重，並給以親如家人的照顧和關懷，使美貞視菲律賓猶如她的第二故鄉。

行前我先和馬尼拉交響樂團互通郵件，除了得到他們的支持提供一些美貞在菲律賓活動的相關資料外，還特別推薦我聯系馬尼拉保險業鉅子許文自聰先生，美貞生前的最後一場音樂會，就是和許夫人合作，在 2008 年 5 月由美貞指揮馬尼拉交響樂團，他夫人擔任鋼琴獨奏，演奏修曼的作品。許先生收到我的郵件後，也給予了感人的支持，

還將那場音樂會的 DVD 以快遞相贈，使我有機會帶著憂傷和懷念，看完了美貞在菲律賓極富紀念價值的音樂會。

(2008 年音樂會圖片)

許文聰先生得知我有赴菲搜尋資料的願望後，主動為我在馬尼拉訪問期間，安排和美貞生前所接觸過的人物及機構會晤，並邀請我夫婦出席他夫人在 7 月 11 日馬尼拉交響樂團演奏會中擔任鋼琴獨奏的音樂會。徵得妻子的同意後我們欣然前往馬尼拉。

(2014 年許夫人音樂會圖片)

7 月 11 日晚上，馬尼拉突然雷電交加傾盆大雨，許先生安排車輛接我們去音樂會場。音樂廳裡並沒有受到天氣影響，仍然是高朋滿座，氣氛熱烈。當許夫人風姿卓越地走上舞臺開始彈奏時，指揮臺上的男指揮在我視線裡突然轉化為美貞的身影，在那裡揮動著指揮棒，我不爭氣的雙眼瞬間噙滿感懷深切的淚水，思緒頓時跌回 1965 年在羅馬那段很值得回憶的時光。

在義大利的餐館裏，我們品嚐羅馬的烹調，酌飲着義大利的葡萄酒，聽她對音樂的追求和未來的憧憬。對她的

第一印象時隔已近五十年，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腦海中。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反映出她在音樂方面的才氣、智慧和充沛毅力。從彼此交談中，又體會出她的執著精神和倔強個性，但又絲毫不會造成他人不悅，反而會贏得賞識才情者寬諒、尊重並留下深刻印象。

某日，我邀請伍教授女兒單獨在餐廳會面時，伍小姐突然提出要為我和美貞牽紅線，而我已有盤算，於是放膽告白：‘個性溫婉的妳，就是我此生唯一的理想對象。’1969年即與伍小姐在瑞士喜結連理。

事實上，我的確很喜歡美貞，但愛的是她那份不同尋常的天份和音樂上的造詣，以及她那倔強不服輸的個性。以二十歲才出頭的年紀就隻身從澳大利亞遠涉重洋，到羅馬追尋她的夢想。我很敬佩她的毅力和果斷精神。在這些方面我們有共同的相似點。

那就是我們都是在個人的奮鬥中獲得成功。

從我多年和藝術家的接觸，深切了解到，包括音樂在內的藝術家，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擁有豐富的感情而生活在理想中。帶着他們的感情，追求的不是物質的享受，而是藝術的完美，他們有個性有夢想，向社會索求的祇是對他們藝術工作的認可并得到呵護。因此他們的感情很脆弱而極其容易受到傷害。尤其是在文化背景思維不同且極其現實的功利主義社會中，使得他們的思維和作為顯得格格不入。

從美貞二十歲那年，馬可將指揮棒交給她，讓她登臺指揮了她一生中的第一場大型演奏會，她 1964 年第一次到義大利，獲得義大利塔奧明娜，英國著名指揮約翰·巴比洛蒂爵士，和義大利國際指揮卡洛·切齊聯合舉辦的國際指揮培訓班全額獎學金。就在培訓班期間，美貞憑藉天份，兩位大指揮家欣然安排她指揮了「西西裏交響樂團」，首次在「音樂王國」義大利展現了男指揮亦難企及的耀眼才華。

她努力奮鬥的精神感動了我，產生助其前往臺灣發展的構思。在於斌總主教和于竣吉大使兩位長者慨然協助下，完成美貞訪臺夙願。到達臺灣後又得到聯合報創刊人王惕吾的不懈支持，為美貞開啓音樂事業的道路。

從 1965 到 1978 年，應該是她音樂事業的巔峰，那段時光她也確實為臺灣盡心盡力地推動音樂發展，尤其在培養青少年音樂人才方面，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67 年是她音樂事業的重要轉捩點。她鼓起勇氣，再度前往紐約參加「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競賽」，這次不負眾望，一舉拿下金獎，受到裁判委員會主席世界著名音樂指揮伯恩斯坦的高度讚賞，和她簽下在紐約交響樂團擔任助理指揮的一年合約。從此，美貞更上層樓，登上了國際樂壇。

邀請合約如雪片飛來，她先后前往德國、挪威、丹麥、法國、哥倫比亞、澳大利亞、新加坡、香港等地，指揮各個世界著名的交響樂團，還應南非共和國政府邀請，擔任國際鋼琴比賽的國際裁判。

日本《讀賣新聞》特地為她安排了十八場巡迴指揮演出，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指揮家公開指揮全為男性的日本交響樂團，在高度‘大男人主義’的東瀛，此一紀錄何止是空前的盛譽。

儘管美貞足跡踏遍了世界五大洲，她心靈中仍記掛著視同今生使命的中華民國音樂的發展，尤其重視青少年音樂人才的長期扎根和培養

2008年九月在菲律賓指揮的一場音樂會，為她的音樂生涯畫下句號。她在1994年被診斷罹患乳腺癌後，決定前往菲律賓巴拉望島，每天游泳潛水，用大自然舒緩身心壓力。那段讓大自然療傷止痛的日子。期間得到好友，前中華民國行政院長俞鴻鈞先生的女兒俞蓀璉曾就近提供照料。筆者在訪菲前，原本希望能自俞女士口中獲悉一些美貞最後歲月中的點滴。遺憾的是這位目擊美貞凋謝的俞女士，在2013年12月去世。

俞女士在馬尼拉還創辦了一個取名為“內在平安基金會”（Inner Peace Foundation）教會組織，是一個非常小的組織，聚會場所就設在俞女士家中。那時候美貞在美國加入了另一個位在明尼蘇達的教會組織，回到菲律賓後，她也經常到俞女士創辦的教會組織參加活動。她特地為教會用英文譜寫了會歌，曲名為 My Deepest Longing（我最深切的渴望），這首會歌很可能是為俞女士創辦的教會組織譜寫的。

諷刺的是，美貞一生將臺灣寶島視為自己的祖國，萬萬沒料到，竟然還是黯然地離開了，最後選擇菲律賓作為

情感依託，成為心目中的‘第二故鄉’。

美貞的死訊是 2013 年 8 月她在澳大利亞的弟弟郭建平發給我的電子郵件中得知的，他告訴我美貞在 7 月 31 日去世了。雖然早知她身患絕癥，來日無多，但因我們夫婦仍然期待和她相聚，這一噩耗有如晴天霹靂，不僅令人神傷，而且是個永難彌補的大憾。

我回憶起，應該是在 1990 年前後，因為很久沒有和美貞聯系，妻子正在準備晚餐，我隨即給她撥通了長途電話，寒暄了一會，由于我長期從事美國，加拿大和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工作，於是問她是否願意去北京指揮樂團。令我吃驚的是，我話還沒有講完，却得到她挂我電話的尷尬，一時間我手握話筒，無奈地向正在炒菜的妻子說：“海倫挂斷我電話。”晚餐過後我坐在客廳裏為美貞挂斷一事耿耿于懷，經過左思右想，我忽然悟出美貞的難言之苦。長久以來大陸和臺灣之間因為政治因素沒有往來，彼此互不信任，國際長途電話是被監聽的。美貞一聽我要她前往北京訪問，肯定會擔憂她和我的通話被臺灣方面錄音，所以急速地將電話掛了。

想到這裏我也就釋然了，並沒有對她產生任何的誤會。當我得知她罹患絕癥時，已經時隔近二十年，大陸和臺灣之間的關係有所改善，於是為她計劃去北京的衝動再度產生。我始終認為她在國際上的音樂指揮成就和榮耀應該讓十三億同胞共享，於是我在給她的郵件中，較為婉轉地向她提出訪問北京的建議，她在第一封給我的回電中似乎還帶有幾分猶豫。但接着在 4 月 11 日給我發的郵件中，

她改變了初衷，文字中表達了考慮訪問北京的意願，並同意我將她的電子郵址交給在北京的朋友。收到這份郵件時，我極其興奮，希望她在音樂上的成就不受政治的幹擾。於是我準備和北京的好友籌劃如何安排她的行程。然而她在 2103 年因為病情的急劇惡化而驟然去世，讓這個願望成了她生命中未完成的交響曲。

上世紀八十年代，臺灣的通俗歌手鄧麗君，雖然有大陸的誠意邀請，也是因為政治考量而沒有成行。不同的是鄧麗君雖然沒有踏上故土，她的歌聲卻響徹大陸迄今不衰。而郭美貞的名字至今在大陸卻無人知曉。這已經不是用曲高寡和可以解釋的了。主要原因是當美貞在國際上攀登巔峰的時候，大陸却在進行殘酷的政治鬥爭，又有誰會有心去了解大陸以外被視為陽春白雪的古典音樂指揮。兩位中華民族的現代通俗歌手和國際著名的女指揮未能在故土獻藝，將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永恆的遺憾。

2013 年的 3 月，美貞發來郵件告知二月份剛在澳大利亞接受髖骨手術。而且訂好九月返菲的機位。我當下和妻子商量，要不就先去澳大利亞看望她，或等九月再去菲律賓也不遲。沒料到這一遲疑，就成了天人永隔的遺恨。

既然生不能再重逢，我和妻子決定到澳大利亞她的墓地獻上哀思。與郭家小弟建平連絡后陸續得悉：兩兄弟一直保存著美貞的大量遺物，其中必能找出可作我為她作傳的重要資料。

2014 年年 3 月 5 日抵達悉尼再轉飛坎培拉，建平親自接機並送我們到酒店。在車裡，我迫不及待提出是否次日

上午即去墓上獻花？他邊開車邊說，姐姐根本沒有墓，美貞的遺願交代：火化后將骨灰灑在悉尼海灣邊生前寓所花園內即可，因為她非常喜歡此處面海的景致。

退而求其次，我又問可否去憑弔灑了骨灰的花園呢？建平淡淡地答道：那座美貞最喜愛的私宅已讓售給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買家。

這可能是當地遺產處理的必然過程，我祇得沉默地在想，美貞奮鬥了一生，最終未能在紛亂的人世留下一絲痕跡。

7月7日到12日訪問馬尼拉時，感謝美貞生前好友許文聰明先生費心安排，見到了美貞的幾位好友，他們對美貞的去世不僅惋惜，也感歎失去了一位一生為中國人爭光的女性。我見到其中一位年近八旬的李惠秀女士，就是美貞在獲得國際金獎後，她央請父親與一位從事演藝經紀的店中常客商議，成功邀請美貞到菲律賓演出，數十年裏，她們成爲莫逆之交，在她妹妹繼承父親繼續經營的炸雞餐廳裏，談論着美貞在菲律賓和當地認識結爲不解之緣的經過。在言談中對美貞的去世也感到無比憂傷。

（李惠秀父親經營餐館圖片）

我們抵達的第二天（7月8日），許先生邀請我到他辦公室宴會廳，和李惠秀及幾位美貞生前好友共餐，席間，一位名叫柯美智女士是許先生夫人在聖伊莎貝爾學院音樂系

的前後同窗，也是當地頗負盛名的鋼琴家。她在席間講了一則美貞在音樂會上摔斷指揮棒的趣聞。

（聚餐照片）

因為樂團中一位團員的接連不斷的錯誤，導致美貞用指揮棒在樂譜架上猛擊，因用力過度，指揮棒折斷的那一段，飛到了聽眾席，正好落在當地音樂評論家 Aida Sanz Gonzales 的座位前，她不聲不響地撿了起來，放在手提包裏一直珍藏着。當時我還希望能從她那裏看到這段被折斷的指揮棒并拍照留存，當她聞悉美貞去世的噩耗後，竟然將這段頗有戲劇性和歷史性的指揮棒給扔了。美貞一生摔過好多次指揮棒，但摔斷指揮棒這還是前所未有的趣事，也反映出她對音樂事業的認真。

離開馬尼拉時，體驗了當地華僑醇樸厚道的濃烈人情，和待人接物的無私熱情和關愛，難怪美貞視菲律賓為她的第二故鄉。「菲律賓交響樂團」對美貞離世所表達的哀思，如她在天之靈有知，亦當感到欣慰。

在得悉美貞仙逝的信息那一刻，我曾在第一時間和臺北一位摯友聯繫，請他設法和臺北有關方面溝通，是否能為她舉行一臺追思彌撒，作為對美貞生前為臺灣音樂界的付出表達追思之意。但得到的卻是一個無法理解的回覆：這件事必須由美貞的家屬提出申請。菲律賓的許先生，和美貞也祇是朋友關係，得知噩耗后毫無條件的為美貞舉行

了彌撒儀式。兩相對比，美貞將菲律賓視為「第二故鄉」也就不足為奇了。

值得欣慰的是，臺灣並未完全遺忘美貞。輔仁大學肯定並感念其生前的成就和對臺灣音樂事業發展的貢獻，在大學傳媒系習賢德教授和音樂系系主任徐玫玲教授共同推動下，於2014年6月為音樂系博士班設立了「郭美貞紀念獎學金」，9月24日舉行頒獎典禮，獲獎的兩位研究生分別專攻聲樂和小提琴。輔大校長江漢聲、藝術學院長康臺生及救國團前主任李鍾桂博士均到場見證。

#### （音樂會海報及有關圖片）

在舉行頒獎典禮之前，傳媒系的二年級同學集體前來參加，並在採訪中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他們問我夫婦和美貞在近半個世紀的交往中，有無發生過爭執或口角？我坦誠地告訴這群充滿理想和好奇的學生，和美貞之間我們維系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真誠友情，從沒有說過一句重話，原因很簡單，我們之間除了友情，沒有絲毫的利益關係。

更重要的是彼此將要包容，要理解，要尊重。因為人是社會中的個體，每一個體都有其正面和負面的特性，我們不能視人為模具中生產出來的千篇一律的復制品。因此

人與人之間要尊重和欣賞對方的優點，包容和理解對方的缺點。

學生們之所以會問我夫婦這個問題，是因為從資料中他們看到美貞在臺灣的短短的時間裏，飽受社會的一些負面批評。而我夫婦能和她維持這樣長時期的友情是不可思議的。我笑了笑告訴這些純真的學生。當我夫婦在菲律賓訪問期間，曾經支持過照顧過美貞的朋友，從談話中也會對美貞作一些無關痛癢的批評，但都是用諷諧的語氣一筆帶過，不僅對美貞沒有絲毫的不滿或輕視，表露出的是對她事業成功的尊重和逝去後的惋惜。這就是西方社會和東方社會因文化背景不同而產生出來的表達差異。在西方社會一個人的事業成就和他個性表露之間是不會劃等號的。然而在東方，往往對一個事業有成人士，由于他的個性不合社會要求往往而因而受到極盡污蔑或否定甚至無情打擊。我祇是告訴那些學生相信他們有智慧持公平的立場分析并評價美貞，不要隨便接受那些遺留下來的道聽途說。對美貞我沒有任何的偏袒，祇是真誠地愛護着這位中華民族絕無僅有的音樂指揮奇才，用民族的瑰寶來形容她絕對是當之無愧的。

同時我祇是提醒他們，為什麼美貞以一個女性，能站立在國際指揮舞臺上，僅僅憑藉她自身的努力和奮鬥是不夠的。就因為是女性，在以男性為中心的樂壇，美貞要付出較之男性更多的精力來獲得他在指揮壇上的一席，為此她個性上表現的倔強，剛毅，任性甚至高傲也就不足為奇了。而她這些

個性上的特徵，也正是男性社會中的最大忌諱，尤其在東方社會。

頒獎儀式結束後，我和妻子走出輔仁大學校園，看到園中豎立的校訓：‘聖，真，善，美’正是美貞一生在音樂事業上的追求。

輔仁大學舉行的這個頒獎典禮，能讓於樞機與美貞在天之靈，皆能頷首；更盼美貞自天堂俯瞰這些由衷的推崇與感念之后，漸漸撫平曾在靈魂上烙下的那道疤痕。

(2014年10月31日完稿)

